2025年7月
第10号

斯巴达克派

如何
保卫新中国？

本刊包含：致中共中央公开信、中国：等死就会死、民族压迫、妇女解放、南海冲突、伊朗问题等内容

iclfi.org/zh
JP¥400 A$4 £3 CDN$4 €3 US$3

编者按

本期《斯巴达克派》刊物出版之际，正值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动。随着美国帝国主义撕毁先前的自由主义秩序，企图挽救其日益衰败的霸权地位，特朗普已经明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其战略打击的主要目标——因为中国是帝国主义图谋面前最强大的障碍。这使得保卫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反革命，成为无产阶级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紧迫任务。

在本期刊物中，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提出了一套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来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心是动员中国强大的无产阶级，与全世界工人和受压迫群众结成战斗联盟。正如我们在《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见第4页）中明确指出的，这一国际主义战略同中国共产党所奉行的路线完全对立。中共政权不是通过把帝国主义的预定受害者结起来共同斗争以推进社会主义运动，反而"**保卫**正在衰败的全球自由主义秩序"，并且"（正在）加倍推行旧的经济模式，而同时美国却在把这个模式逼下悬崖"（《中国：等死，就会死》，见第3页）。这是一条通向灾难的道路。

要对中共的纲领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第一步是理解后苏联时代的历史时期。对此有所贡献的，是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在2023年第八次国际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主要文件《美国霸权的衰落与争取工人权力的斗争》（见第9页），以及关于特朗普再当选的简短评论《自由主义之死》（见第25页）。

在中国，大多数人错误地将托洛茨基主义与那些**拒绝**保卫中国的组织联系在一起，这些组织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就是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刊载在本刊封底的文章《既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国家：中国的阶级性质》全面驳斥了这种观点，而这种立场最终会导致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领袖等反革命势力。全世界的工人都必须把保卫新中国视为自身利益的关键。然而，中共的官僚领导者却是这一事业的障碍。只有彻底清除这些官僚压迫者，开辟通向革命的国际主义中国的道路，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才能挽救工人国家免于毁灭。

一些左翼分子认为，要动员中国工人，就应当只把重心局限在职场斗争，反对任何"旁枝末节"。这种看法没有看到关键：如果中共的政策继续下去，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正威胁着沿着民族、性别等各种裂痕撕裂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的压迫。颇具争议的文章《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民族压迫：托洛茨基主义的应对之道》（见第30页）以支持少数民族的民族解放、推动中国革命向外扩展，来对抗中共的汉族沙文主义，主张少数民族与汉族劳苦大众的联合斗争。文章《中国妇女：家庭的奴隶或是革命的斗士？》（见第26页）也正是从这一根本立场出发，着手推进妇女彻底解放的斗争。

抗击美帝国主义的斗争需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视角。在南海冲突中，斗争的关键在于把中国的工人和士兵与菲律宾的劳动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见《美军基地滚出菲律宾！》，第38页）。在中东地区同样需要国际主义视角（见《工人们：与伊朗和巴勒斯坦站在一起！》，第8页）。

本期刊物的目的，是帮助澄清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问题，并指明前进道路。这绝不是一场抽象的理论演习。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在中国以及在世界各地的目标，是把社会主义战士重新凝聚在一套革命纲领下，使我们能够共同在即将到来的空前激烈的斗争中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目录

中国：等死，就会死 3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 4
工人们：与伊朗和巴勒斯坦站在一起！ 8
美国霸权的衰落与争取工人权力的斗争 9
特朗普卷土重来：自由主义之死 25
中国妇女：家庭的奴隶，或是革命的斗士？ 26
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民族压迫：托洛茨基主义的应对之道 30
美军基地滚出菲律宾！建立反帝阵线！ 38
中国的阶级性质 56

封面设计：Lay

斯巴达克派

革命马克思主义机关刊物

由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国际执委会出版

编辑：启民

印制主管：Jeff Thomas

发行主管：Miguel Acevedo

SPARTACIST PUBLISHING COMPANY
Box 1377 GPO, New York, NY 10116, 美国
spartacist@spartacist.org

署名文章或来信中所表达的观点不一定代表本刊编辑部的立场。

本期截稿日期：7月19日。

第10号 2025年7月

中国 等死，就会死

Lintao Zhang/Getty; Tom Williams/CQ-Roll Call

“面对外部不确定性，中国将坚持‘握手’而非‘挥拳’、‘拆墙’而非‘筑垒’……”——2025年4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

下列备忘录由启民同志起草，并经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国际执委会四月全体会议通过。

从爱丽舍宫的自由派到中南海的斯大林主义者，反特朗普的愤怒临时形成了一个统一战线。面对这位“关税狂人”，习近平政权高调宣称将会“奉陪到底”。但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场斗争，其目的实则是为了维护其整个经济增长模式。而这一模式，却是依赖并屈从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之基础上的。正如马丁·沃尔夫在《金融时报》（4月1日）中所指出的：“在当今世界，美国是一股革命性力量——更准确地说，是一股反动的力量，而所谓的共产主义中国，却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力量。”的确，中国迅速实施的反制关税，目的正是**为了保卫**正在衰败的全球自由主义秩序。

在所谓的“解放日”之后，中共所活在的幻想世界暴露无遗：他们幻想特朗普制造的乱局将逐渐而和平地把其他国家推入中国的怀抱。短期内或许会有一些国家在外交场合上发出支持中国的声音，甚至更加接近中国的轨道。但特朗普的帝国主义打压最终将迫使绝大多数受美国支配的国家向他打算构建的反华联盟俯首称臣。

左翼中有两种常见观点：一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崛起为新的帝国主义强国，另一种则把它看作反帝斗争的先锋。但这两种看法都犯了同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即假设中国共产党有意推翻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但问题在于，中国统治集团的本质特征，乃是**保守的官僚主义**。帝国主义的压力确实迫使中共以其独特的、畸形的方式保卫这个工人国家，但它的总体目标并不是打破或取代美国的世界秩序，而是固守在“世界第二”的位置。

用葛兰西的话来说，旧世界垂死，新世界未生，于此明暗交错之际，怪物浮现。当下正是如此。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出现了权力真空，而中共那群年近古稀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却无意填补它。他们拒绝为推动建立全球社会主义秩序而斗争，使得中国及整个全球南方更深陷于动荡与危机之中。今天，除了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构成对美帝国体系的实际替代力量。也正因如此，尽管美国本土工业正在腐烂，世界其他国家仍不得不继续屈从于华盛顿与华尔街的法令。

中国过去那种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发展模式，随着特朗普集团加速瓦解全球化，已经难以为继。无论习近平再召集多少亿万富豪进京磋商，帝国主义国家如今都下定决心要扼杀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便这意味着他们也将失去继续压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机会。而中共在做什么？依然沿着那条以出口为中心的老路狂奔，导致工人和青年被迫接受工资削减与失业率暴涨的现实。中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

下列信函已于2025年5月1日递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亲爱的同志们：

在特朗普政府持续发起经济、政治与军事全面施压的攻势之际，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坚定地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攻击不仅是一把指向中国人民的刀，更是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经济与社会条件的严重威胁。

作为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我们坚信：凡共产主义者，皆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挺身反对美帝针对中国的攻击，无条件捍卫1949年革命的成果。尽管我们的力量尚小，但从帝国主义核心地带到全球南方国家，我们都矢志不渝地为这一事业奋斗。

今日我们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正如当年我们曾竭尽全力抵御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联与东欧的反革命浪潮一般。苏维埃联盟所经历的劫难，绝不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演，这乃是当下的头等大事。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并结合我们自身的经验教训，我们写下此信。我们最深切的忧虑在于：中国共产党当前所奉行的政策，正在重蹈昔日苏联共产党之覆辙。

一、只有国际工人阶级能够保卫中国

我们坚定地相信，要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可靠的盟友是国际工人阶级和世界被压迫人民。我们认为，把哪怕一丝希望寄托在由美国建立、永远服务于资本主义利益的多边国际机构上，都是极其危险的。欧洲列强、日本及其他美国的亲密盟友，今日或许会对特朗普政府表示不满，但当美国"老大"发号施令时，他们仍会立即立正听令。

至于俄罗斯以及全球南方国家，他们或许出于自身物质利益愿与中国加强经济联系，但他们无一不被资本主义或官僚集团所统治，这些集团将永远把自己的反动利益置于工人阶级之上。当他们必须在美国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作出选择时，他们会选择前者。中国切不可对这些靠不住的"朋友"抱有幻想，必须把目光投向工人阶级。

在太平洋地区，帝国主义者正图谋对中国进行包围，并借台湾问题煽风点火，挑起事端。我们必须号召太平洋地区的工人和农民组成反帝统一战线。东亚人民在反对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若能成为民族与社会解放的灯塔，将是从根源上动摇美国反动图谋的最佳方式。

在中东地区，我们认为，中国不应诉诸于"国际法"——这本质上一直是强盗的法律；相反，中国应主动支持各国人民的斗争，帮助他们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中国应紧急向巴勒斯坦解放斗争提供广泛而全面的物质援助。如此具体的国际主义行动，必将在整个穆斯林世界赢得千百万群众的广泛支持。此外，在西亚击退美国的图谋，削弱其"重返亚太"战略之根基。

我们提出以上建议，但我们并不自诩独创。相反，我

华人民共和国仍然主要依赖美元进行国际贸易，使其经济被华尔街和美联储"挟持"为人质。由于官僚内部为了蝇头小利争权夺势，导致经济中的巨大失衡长期得不到解决，工厂工人被拖欠工资数月之久。同时，他们为了取悦帝国主义，允许国内资本家在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基本民生领域攫取巨额利润。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重申了中共的教条："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新华社，2月24日）。这是一种**客观主义**史观，认为全球分工与生产只会随着时间推移自然扩展。繁荣与和平被假定为这种理性结构的自然结果。而中共所否认的是，美国霸权曾是全球经济扩张的基本前提，而该霸权依赖于美国军舰对全球海洋的控制。中共的这种观点掩盖了这样一个现实：帝国主义的衰落阻碍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国际化。从而，中共也拒绝了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中共拒不承认全球化是由美国主导的这一现实。这对中国战略判断造成了严重后果。例如，中共至今仍执迷于一种幻想，认为欧盟能够成为一个地缘政治上的自主极。中共寄希望于通过与欧洲大陆的贸易来缓解美国加征关税带来的经济困境——仿佛欧洲并不依赖美国，且并未与之结盟似的。实际上，一旦经济衰退，欧洲的所谓"大国"仍需依赖美国的救助，而它们的军队如果缺少美国支援，甚至无法持续作战超过数周。此外，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并不希望看到一个工人国家成为替代性秩序的缔造者（事实上，全球南方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同样不愿意）。

中共对现存世界秩序之所以抱有和平主义幻想，正是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习近平帮派的目标，是维护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国家控制的经济体制之上的寄生统治。由于缺乏以阶级斗争为指引的行动纲领，并宣扬"一国社会主义"，这一官僚集团只能寻求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妥协。即使在被迫卷入对抗时，他们狭隘的民族立场也只会引向以牺牲全球反帝斗争为代价来与帝国主义势力达成交易。归根结底，在未将国际社会主义纳入其战略视野的前提下，他们所能依赖的唯有"和平共处"的幻想。而问题的核心在于，资本主义世界并**不**认为可以与一个工人国家实现和平共处。

毫无疑问，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正在被迫采取与美帝国主义更为对抗的姿态。但驱动他们这样做的，是对自身特权的保护。这种"左转"，将以一种压制性的、

们不过是力图将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所采取的政策运用于当今现实。面对帝国主义包围与反革命威胁时，列宁的回应是建立共产国际，团结全世界工人，为无产阶级的国际解放伟大事业而奋斗。

二、最大的危险来自国内

我们绝不能忘记，苏联的失败并非败于外敌的枪杆子，而是其体制内在缺陷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科技、工业与军事上已取得巨大进步，使之已具备了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能力。然而在国内战线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面临的形势则显得愈加脆弱。在这一点上，我们赞同毛泽东曾发出的警告：

>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
>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 年 9 月 21 日）

今天，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掌握巨大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这一阶级的壮大，直接威胁着新中国的持续存在。他们口中的“忠诚”话语，不应使我们忽视**他们将试图东山再起**。更为严重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加剧了中国社会中的不公、剥削与腐败，这极大地疏远了支撑着新中国的基石与脊梁——无产阶级。

针对这一如癌症扩散般日益加剧、正在撕裂新中国与其阶级基础的内部裂痕，我们主张采取以下措施：

- 对国内资本家实行财产剥夺，将所有产业置于国家控制之下；
- 党内官员薪酬不得高于普通工人；
- 工人必须拥有对国家与产业的民主控制权，并享有充分表达意见与分歧的自由。

要使这些措施取得成效，不能依赖于国内的自力更生，而必须纳入国际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规划之中。中国应当使其经济计划与全球南方工人阶级的需要与愿景相协调。它必须直接挑战美元体系对世界经济的扼制。同时，中国应主动向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伸出援手，支持他们同我们共同的敌人进行斗争。将上述政策结合起来，就能有力削弱国内反革命力量，增强国际工人阶级团结，并推动共同的经济繁荣。

最后，我们必须触及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毫无疑问，帝国主义者历来试图操弄民族主义与地方主义，以此作为钳制与奴役中华民族之手段。然而，对于维吾尔与藏族人民的民族诉求，绝不能采取压制与收编的方式来回应。这样的政策只会将他们推向反革命阵营。我们必须回归中国共产党早期立场，彼时，党曾坚定捍卫民族自决权。列宁教导我们，人民之间的团结，唯有通过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才能实现。只有真正赋予民族自决的权利，方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团结。

当然，我们的主张将需要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场斗争。但只要根植于工人阶级的斗争与愿望，这场斗争就必将胜利。这是正确的道路，也是唯一的出路。

打倒美帝国主义！
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此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G · Perrault
代表国际书记处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

官僚主义的方式进行，从而削弱对工人国家的保卫。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会将中国的工农群众视为必须监管与控制的潜在敌人，而是应致力于释放群众的革命潜力，成为反帝斗争的力量。

缺乏一个国际社会主义的战略视野，中国将面临孤立。而民族主义的毛派却认为，这无关紧要，因为今天的中国已不同于“大跃进”时期那个科技落后的中国。但即便是军事力量可与美国抗衡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也未能冲破帝国主义的包围。从勃列日涅夫的苏联到习近平的中国，在缺乏苏维埃民主指导的计划下，官僚命令体系必然扼杀科技进步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使在今天，中共推动生产自动化的计划也正在威胁着数以百万计制造业工人的生计。

现状已经难以维系。对抗帝国主义势力，必然也意味着必须打击中国本国的资产阶级。这一过程本身可能在中共官僚体系内部引发爆炸性危机，因为许多官僚与资产阶级有着物质上的利益勾结。要彻底改变路线，也势必引发剧烈的震荡，进而激起大规模群众性动荡的幽灵。归根结底，无论中共斯大林主义者以何种面貌示人，都无法为中国指明出路。对于一个遭到围困的工人国家来说，唯一出路是采取革命的国际主义纲领。这是苏联解体所带来的惨痛教训。中国最终面临的选择，只有两条道路：要么政治革命，要么社会反革命。斯大林主义的自给自足政策只不过是在延缓这一不可避免的选择而已。

世界冲突

今天，中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其造船能力是美国的232倍。然而，与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相比，中国对全球事务的实际影响力却很小。世界主要冲突地区看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身影。

北约指责中国通过“军民两用”技术援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事实上，中国没有向俄方提供过哪怕一发子弹或炮弹。中国确实趁着俄罗斯被西方制裁之机，以低价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并向莫斯科大量出口汽车），在经济上支撑了俄罗斯。但贸易并不等同于直接军事援助，而美国却为泽连斯基的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支持。正如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在就战争进程发表意见时所说：“如果中国真的向俄罗斯提供了军事补给，战场局势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un.china-mission.gov.cn，1月16日）

加沙的种族灭绝屠杀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与当年苏联向巴勒斯坦人提供军事援助不同，今天哈马斯或真主党手中并没有解放军的导弹。相反，中国仅仅发出呼吁，要求恢复所谓的“国际法”。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置身事外，证伪了两种相反的说法：一种是将中国描绘为帝国主义国家，另一种是将中共描绘为反帝力量。如果这两种说法有其一成立，中国早该强势介入以打击美国了。在革命国际主义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致力于与全球南方的工人和被压迫者结成反帝同盟。设想一下：巴勒斯坦战士操纵东风导弹，遥控无人机集群，在中东把帝国主义势力打得落花流水，这不仅能推进他们自身的解放斗争，也将削弱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在第一岛链的军事扩张来扼杀中国的能力。

台湾

再来说台湾。帝国主义者已经做出了无数关于台海战争时间与方式的预测。对美国来说，台湾是一颗无法轻易放弃的棋子。军事上，台湾是大陆沿岸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经济上，台湾是全球大部分先进半导体的生产地。更重要的是，台湾具有巨大的政治用途：既可以作为“中国自由民主”的样板，用来攻击斯大林主义者，又可以作为一个陷阱，诱使解放军出兵，从而可能击碎脆弱的中共官僚体制，为反革命开辟道路。

至于中共，只要他们仍希望在美国主导的秩序中发展中国经济，就不愿意在台湾问题上越过红线。但如果北京被踢出美国秩序之外（无论中共是否情愿），那么台海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严重的经济下滑同样可能使战争成为政权眼中一个优选方案。然而，如果按照“一国两制”的框架进行武力统一，则意味着用一个**疏远**工人阶级、**保留**资本主义的纲领去征服台湾，这必然加剧岛上群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对情绪。相反，托洛茨基主义者主张通过革命统一，将社会革命扩展到台湾，扩大工人阶级的民主自由，同时在大陆发起政治革命，使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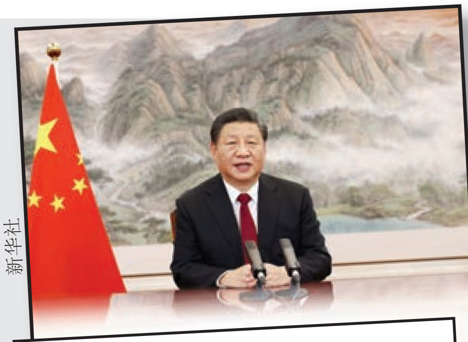
随着特朗普式好战政策的推进，台湾的走狗资产阶级也在加码挑衅，比如驱逐统派的网红，并同意在美国本土建设多座台积电芯片工厂。台湾的工人群众显然害怕战争，因此倾向于希望维持现状。然而，现状正被岛上的帝国主义主子亲手撕碎。这使得反对美帝国主义成为燃眉之急——而这既不能由台湾的资本主义政党领导，也不能由希望保留资本主义、试图与岛上资产阶级结盟的斯大林主义者领导。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反对美国霸权，才能真正动员广大劳动群众。这也将是保障台海和平最有效的方法——赶走美帝，解放军武力攻台的理由也就随之削减了。

全球贸易

中共的整个发展战略始终建立在出口基础之上——无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耐克鞋，还是今天的国产电动车。这种战略意味着通过美元体系融入并参与全球贸易。数十年来，中国出口商赚取的美元不断被回流到美国财政部，通过榨取中国工人阶级的血汗，支撑起了美国以债务为驱动的经济扩张。同时，这也使得美国资本家得以掏空本国工业、削弱美国无产阶级——而生活水平并未同步崩溃。

与习近平所声称的不同，中美贸易从来不是“互利共赢”。在中国，大量经济资源被投入到出口领域，而非国内消费，致使九亿人每月收入在不足三千元人民币的水平上。即使转向高科技产品，这种模式的持续深化仍意味着，中国经济比美国经济更容易受到关税的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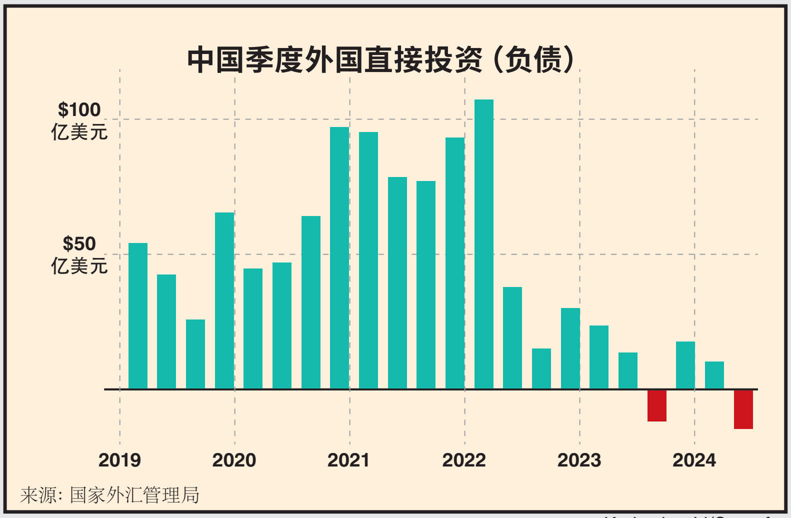
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官僚集团有意识地试图摆脱对美元的依赖，由此提出了“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中国不再购买更多美债，转而使用美元在海外建设基础设施，并推动他国以人民币进行贸易。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在政治和经济上同帝国主义彻底**决裂**，这种做法实际上只是增加了几个步骤的美元交易而已。



新华社

“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大江奔腾向海，总会遇到逆流，但任何逆流都阻挡不了大江东去。”

习近平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 2022年1月17日



Katherine Li/Semafor

不，习同志。随着中共坚持已崩溃的全球化模式，外资在中国大幅下滑。

Imago/Alamy

北京，2019年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东风核导弹在阅兵式上展示。

国家对人民币的控制，虽然是中国保护自身经济的重要工具，但也意味着以人民币在国际上进行贸易，本质上仍是双边易货式交易。为了维持出口畅通并确保中国在美国主导的秩序中充当稳定因素，人民币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元挂钩。事实上，尽管金砖国家大谈“去美元化”，但它们的货币体系依然依赖美元。人民共和国真正需要建立的，是一种以真实价值（如黄金）为支撑、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从而实现全球流通。为了防止潜在的资本外逃，必须将国内资本家的财富在工人阶级控制下予以剥夺。只有建立以国际无产阶级利益为基础、并使全球贸易脱离美元体系的替代性世界贸易体系，才能直接削弱美国霸权。

要与美国霸权实现这样的决裂，就必须击败中共官僚集团推行的“一国社会主义”纲领。我们要提出的，并不是要回到毛主义时期那种自给自足的贫困状态，而是要为推动社会革命的国际扩展而斗争。这里我们所说的并不是要求中国必须以军事手段输出革命，而是指中国的贸易政策和对外政策应当服务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这才是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佳方式。

但现实与此相反，许多“一带一路”项目是通过输送外派中国工人来建设的，往往损害了当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在没有完全排除本地工人的“一带一路”海外项目中，中方也打压工会的建立。这激化了全球南方国家中**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这些国家的工人难以理解保卫中国如何符合其自身利益。

发展规划应当以**全球**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导向制定。当前，中国的大规模出口正在引发全球南方国家的去工业化。数千名南非钢铁工人正面临裁员威胁，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关税威胁，也是中国产能过剩所造成的。正确的解决方案应是，在两国工人共同控制下确定生产配额。中国制造业走向海外时，不应排斥当地工人，而应保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之下，并在有工会组织保障的条件下雇佣工人。向这些工人支付能够维持生活的工资，将彻底打破帝国主义者的剥削模式（他们的常规做法就是支付极低的饥饿工资），同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赢得数以百万计坚定的捍卫者。

如果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掌握领导权，中国海外工厂的工人会接受政治培训，目的是培养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精神。随着帝国主义者试图将中国排挤出全球南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依靠工人阶级，而不是那些摇摆不定、软弱无能的本地资产阶级来保卫自身在海外的工厂。此外，推进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不仅能使数十亿人摆脱贫困，也将提升中国国内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标准。

经济停滞

中国社会中的强烈危机感源自于，这个政权正在加倍推行旧的经济模式，而同时美国却在把这个模式逼下悬崖。这也解释了中共中央内部愈演愈烈的像“抢凳子”游戏般频繁的走马换将，国防、农业和科技等部门的部长们纷纷遭到“纪律处分”。而且，全球经济衰退会给美帝国主义提供大规模加码对华制裁的良机。切断从中国的廉价产品进口，正是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西方推进“再工业化”战略彼此呼应的配套举措。

全球经济若大幅放缓，将对中国造成巨大冲击。但官僚集团无法承受数百万工人失业的后果——那可能引发另一次类似1989年天安门的政治危机。为了维持就业，经济很可能被维持在一种类似僵尸般的状态：一些没有效益的工厂将被强行运转。正如那句经典的苏联笑话所说：“他们假装付工资，我们假装工作”（只不过在中国，这是每周假装工作72个小时）。即便在当前建筑行业大幅萎缩的情况下，生产低质量钢材的国企依然被勉强维持运转。这种类似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停滞，将使中国在与西方的技术竞赛中被远远甩在后面。实际上，这种现象在疲软的房地产领域已经出现——在那里，房价之所以被稳定，是因为**国有**地产公司正在持续买入土地——来自谁呢？来自……**国家自己资助**的土地拍卖会。年轻人已经开始用“历史的垃圾时间”来形容如今的政权状态。

经济越来越依赖国家部门。外资投资急剧下滑，而海量的国家信贷则被投入到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车工厂

工人们：与伊朗和巴勒斯坦站在一起！

Workers Hammer

2025年6月21日，伦敦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群众示威。斯巴达克派呼吁工人采取行动，保卫巴勒斯坦人民，并抵抗美以对伊朗的攻击。

译自 *Workers: Stand with Iran and Palestine!* (英语), *Spartacist* 增刊，2025年6月13日

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为这个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种族灭绝狂热开启了新的战线。这一新攻势旨在将美国拖入冲突，并摧毁伊朗作为区域制衡力量的作用。一旦这一计划得逞，以色列将放手进一步消灭巴勒斯坦人，并对整个中东实施恐怖活动。**全世界的工人们：动员起来，反对以色列和美国！保卫伊朗！保卫巴勒斯坦！**

这不仅是为了拯救面临着前所未有屠杀威胁的中东人民，更是**为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得以向前发展**。如果任由以色列和美国继续升级冲突，全球将深陷野蛮、流血与经济恶化的漩涡。

如果西方和以色列的工人不立即行动起来反对本国政府的罪恶行径，他们就**将被这些政府动员**起来成为更大规模罪行的帮凶。如果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人允许本国政府向美国和以色列妥协，**他们将成为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的下一个牺牲品**。

那些自由主义机构——无论是联合国、欧盟还是国际刑事法院——都无法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它们要么与以色列的罪行**同流合污**，要么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唯有全世界的工人和受压迫人民，才能终结这不断升级的野蛮循环。**发起示威！发动罢工！阻止美以武器运输！**我们不能再让美国和以色列逃脱罪责！■

的建设中。毫无疑问，这其中包含了极其进步的因素。大规模电气化与自动化，可带来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并迅速缩短劳动时间。如果资源可以集中投入到满足社会需求上，将能够攻克医疗、教育，乃至日益严峻的养老这“三座大山”。

然而，中共寄生集团的统治却扭曲了经济计划体制，阻碍了工人阶级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大量太阳能发电厂建成后却多年未能接入电网，而小官僚们更偏好建造能烧本地煤炭的发电厂。每年可以生产两千万辆电动汽车，但普通工人却几乎买不起一辆。国家经济必须置于工人政权之下，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非继续服务于官僚集团。

官僚特权阶层通过消除或篡改经济数据，扼杀了自身的计划能力。这场对统计工作的“大清洗”，正是为了让各级投机分子可以伪造数据、骗取升迁、并掩盖被他们中饱私囊的生产成果。与此同时，北京仍然要求维持极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统治权威与正当性的来源之一。这就导致，为了完成一个GDP指标，整个社会不得不继续维持严重的产能过剩与浪费性生产。出口导向型投资的节奏必须放缓；而现有的过剩产能，应当转向其他社会必需品的生产，并且大幅降低商品价格，让工人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若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挺过美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瓦解，就必须**彻底清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过去四十年来，这种与魔鬼的交易表面上看似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但实际上却支撑了美国日益衰落的霸权体系，使帝国主义者能够通过奴役世界无产阶级入不敷出却照样挥霍。如今，华盛顿的魔鬼们正在撕毁这份交易。然而，北京的官僚们却顽固地相信，他们那种“什么都不做”的等死策略正在取得胜利（!!）。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经济远比美帝国主义更容易被绞杀，而不是相反。革命者的任务，是要通过在世界舞台上壮大社会主义斗争力量，使新中国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尽可能减少其脆弱性。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美国霸权的衰落
与
争取工人权力的斗争

Al Jazeera/ZUMA (上), Osan/AP (下)

上图：2021年8月美国从阿富汗混乱撤军。下图：马鲁蒂·铃木汽车工人罢工，印度马内萨尔，2011年10月。

为第四国际提供的纲领

前言

以下文件由国际共产主义同盟（ICL）第八次国际会议2023年通过。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苏联解体后的30年都是世界历史上的相对稳定时期。尽管这一时期也经历了危机和血腥冲突，但这些只是例外，而非常态，与20世纪的动荡相比也显得温和。武装冲突强度降低，数百万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世界许多地区见证了社会自由化。在苏联解体、国际工人阶级遭受灾难性失败之后，这怎么可能呢？

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及其献媚者宣称，这些发展明确证明了美国自由资本主义优于共产主义。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应是什么？中国共产党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旗手，紧跟世界贸易组织（WTO），将社会主义降格为纯粹的仪式性用途。许多亲莫斯科的斯大林主义者

彻底解体了。至于托洛茨基主义团体，他们追随自由派的反战、反紧缩和反种族主义运动，却无法证明革命党的必要性。尽管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继续宣扬社会主义的未来，但没有人对自由主义必胜主义发起革命性的反对。

如今，自由主义的风帆已经失去动力。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标志着世界局势的转折点。危机正在成为常态，稳定反而是例外。随着美国霸权受到威胁，曾经有利于稳定的所有因素正在瓦解，极少有人再幻想前方的道路会一帆风顺。尽管自由主义仍有其支持者——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但他们不再自信、不再主动进攻，而是歇斯底里、被动反应，因为他们感受到脚下的地基正在崩溃。如今，自由主义面临真正的挑战者，包括右翼和左翼的民粹主义、伊斯兰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且自由派们自己也在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的标准问题上互相争斗。但是，当乌云密布，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友试图夺回主动权时，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仍然处于组织混乱和迷失方向的状态。

由列宁发起、由托洛茨基延续的将工人运动同机会主义决裂的斗争，必须重新开始，并应用于当今世界的任务和局势。ICL的第八次国际会议及本文件旨在通过批判后苏联时期的自由主义必胜主义，并概述一些基本的分析要素和纲领，为这场斗争提供基础，适应以美国霸权衰落为特征的新时代。世界的工人阶级正面临着冲突与灾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一个能够领导工人阶级掌权的革命国际先锋党。

一、单极世界的起源

美国在二战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其国内经济占全球GDP的50%。它拥有全球80%的硬通货储备，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世界的主要债权国。它利用这种优势重塑国际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并创建了一系列机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北约）以庄严载入美国的主导地位，并为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奠定基础。

尽管美国拥有压倒性的经济实力，苏联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对抗力量。红军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其控制范围延伸到整个东欧。尽管斯大林试图与美国帝国主义达成长期协议，但未能成功。苏联的存在和实力本身就是对美国资本主义统治的挑战。世界各地的反殖民斗争如火如荼，反帝国主义力量寻求苏联的政治和军事支持。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进一步增加了非资本主义世界的分量，在美国引发了歇斯底里和惊慌。世界实际上分为两个竞争的势力范围，代表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

随着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自我重建，美国一次又一次地参与反共军事冒险，过度扩张的第一个明显迹象出现了。美国在越南的失败是一个转折点，开启了国内外经济和政治动荡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所谓的"美国世纪"正面临提前终结，然而，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革命契机——法国

Globe Photos

1957年美国主导的反共北约同盟巴黎峰会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魁北克（1972年）、智利（1970-73年）、葡萄牙（1974-75年）、西班牙（1975-76年）——均以失败告终。通过确保这些失败，工人阶级的机会主义领导为帝国主义提供了必要的稳定空间。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帝国主义重新进攻，标志着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开始。1981年，里根通过镇压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PATCO）罢工，给予美国工人阶级决定性打击。随后，国际工人阶级遭受了更多失败，特别是1985年英国矿工的失败。在这一时期，对苏联的压力不断增加，冷战被推向新的高度，美国通过与中国的反苏联盟，利用了中苏分裂。

到八十年代末，苏联和东方集团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困境。红军从阿富汗撤退以及团结工会在波兰的反革命胜利进一步打击了莫斯科当权官僚的士气。官僚在莫斯科出卖了东德并同意德国统一后，没过多久又出卖了苏联本身。世界帝国主义的压力加上几十年来斯大林主义的背叛导致工人阶级士气低落，导致十月革命的成果最终被清算。 到1991年，国际阶级力量的平衡已经决定性地转向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方向，而牺牲了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的利益。

二、后苏联时期的反动特征

产于美国的超帝国主义

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秩序不再由两种社会制度的冲突定义，而是由美国的霸权主导。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与美国匹敌。它的GDP几乎是其最接近竞争对手日本的两倍。它控制着全球资本流动。在军事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与之相媲美。美国的自由民主模式被宣称为进步的顶峰，每个国家都被期望向其靠拢。

在许多方面，新出现的秩序类似于"超帝国主义"，即大国同意共同掠夺世界的体系。这并不是考茨基所预测的金融资本的和平演变所带来的，而是二战后建立在

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废墟上的单一强国的霸权所带来的。美国重建了这些帝国的残骸，并在冷战期间将它们统一在反共联盟中。当冷战结束时，这个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并未解体，反而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加强。例如，德国的统一并没有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将导致欧洲紧张局势加剧，而是在美国和北约的支持下完成了。

后苏联时期的异常稳定可以解释为美国对其竞争对手的压倒性优势，再加上向金融资本开放了大量以前未开发的市场。1989年，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非资本主义国家。那年开始的反革命浪潮导致了许多工人国家的完全毁灭，或者——像中国一样——在保持集体化经济基础的同时向帝国主义资本开放。这些发展给帝国主义带来了新的生命。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不仅没有为市场份额而互相争斗，反而共同努力将东欧纳入西方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欧盟和北约同时扩展到俄罗斯边境。在亚洲，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美国和日本共同努力，推动和利用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自由化。

主要大国的联合战线让世界其他国家别无选择，只能遵守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指令。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根据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重写规则。这种“新自由主义”在80年代已经全面展开，但苏联的解体给它注入了新的动力。少数拒绝或被阻止走美国指明道路的国家（伊朗、委内瑞拉、朝鲜、古巴、伊拉克、阿富汗）对全球秩序没有构成重大威胁。

这种有利的力量平衡不仅为帝国主义提供了丰厚的投资机会，还降低了与对外贸易相关的风险。资本家可以投资和贸易海外，知道美国的政治和军事主导地位为他们提供了抵御重大冲突或过于敌对政府的保险。这些因素导致国际贸易的显著增长，生产大规模离岸外包和国际资本流通的爆炸式增长，即全球化。

对全球化的马克思主义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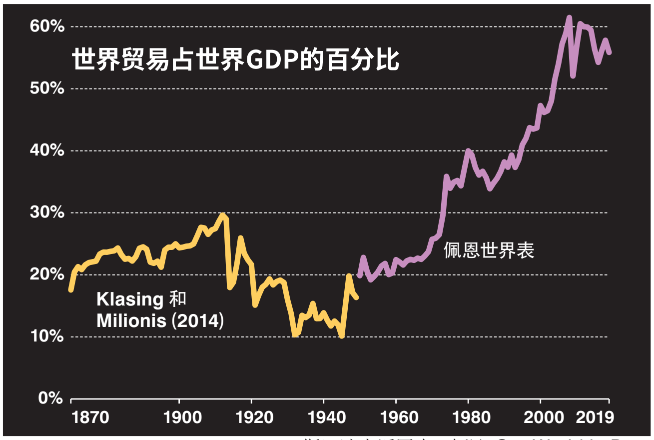
自由帝国主义的倡导者将全球化归功于许多地区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和消费品价格普遍降低。不可否认，过去30年全球劳动分工的扩展导致了生产力的国际发展。例如，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费翻了一番多，世界识字率提高到近90%，汽车生产翻了一番多，钢铁生产也翻了一番多。乍一看，这些进步似乎与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相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即垄断资本统治导致的寄生和长期衰退。然而，事件的发展不仅没有与马克思主义分析相矛盾，反而只有马克思主义分析能够完全解释这些事件，并在此过程中展示自由世界秩序为什么导致的不是逐渐的社会和经济进步，而是社会灾难。

首先，完全没有必要赋予金融资本以进步角色来解释生产力的持续增长。苏联解体后——军事威胁减少，劳工运动削弱，对外投资风险降低，普遍自由化——这些条件使帝国主义在一段时间内克服了其衰退的趋势。事实上，托洛茨基本人曾预见到这种可能性：

> “确实，理论上，甚至并不排除资本主义有可能在最强大的、居于统治和主要地位的国家内取得新的普遍进展。但要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必须首先扫除一个巨大的阶级障碍，和具有国家与国家之间性质的障碍，它必须绞杀无产阶级革命使其长期不再发生；它必须完全奴役中国，推翻苏维埃共和国，等等”
>
>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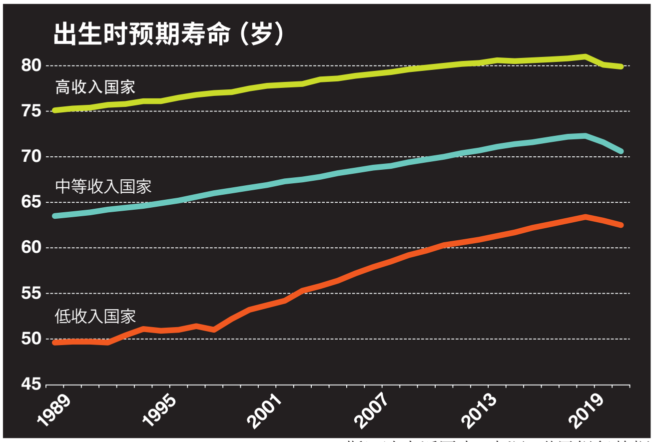
这正是所发生的情况。随着阶级力量关系发生巨大变化，无产阶级受到损害，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但这只能是帝国主义整体衰退趋势中的暂时喘息，而如今这种趋势又回到了常态。

其次，对于资本主义的捍卫者来说，自由市场优于计划经济的优势通过比较东欧畸形工人国家与今天的生活水平得以证明（波兰是典型例子）。事实上，即使不考虑某些衡量标准下情况恶化的事实——如不平等、女性地位、大规模人口外流等，这一说法也可以被反驳。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即托洛茨基主义者，始终认为，孤立的工人国家的计划经济尽管具有巨大优势，但无法战胜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后者的高生产率和国际分工。斯大林主义者声称苏联自己（后来与其盟友一起）可以通过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方式超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和平共处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斯巴达克派图表。来源: Our World in Data

苏联解体后，世界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全球化浪潮。



斯巴达克派图表。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

在后苏联时期，低收入国家的预期寿命增幅最大，疫情前增长了近14年；但在疫情期间，这一趋势在所有收入阶层中都发生了逆转。

帝国主义列强始终对苏联和华约其他国家保持极端的经济和军事压力，这些攻击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表现。 除此之外，在孤立和贫困的条件下试图“建设社会主义”必然伴随着官僚管理不善。 资本主义波兰的持续经济增长得益于其全面融入全球商业——而波兰人民共和国战后遭受重创的经济则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人们无法公平地将被围困城堡的生活水平与未被围困城堡的生活水平进行比较。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在于**无论**处于如何敌对和孤立的国际环境中，这些经济体**依然**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这对于波兰、苏联、古巴、中国和越南都是如此。

第三，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捍卫者认为，由于二战以来战争的强度和数量有所下降，并且自苏联解体以来进一步下降，这证明自由主义和全球化逐渐导致和平。虽然这种说法的某些事实方面可能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去75年里没有任何一场冲突能够与两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工业屠杀相媲美。至今，“维护欧洲和平”仍然是为欧盟辩护的主要理由。而事实是，缺乏新的世界大战只是美国凌驾于其竞争对手之上的结果——这是一个必然的暂时力量对比。正如列宁所解释的：

>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瓜分势力范围、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实力**，也就是以整个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有其它的根据。而这些瓜分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
>
> “所以，资本主义现实中的（而不是英国牧师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庸俗的小市民幻想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
>
>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

承认后苏联时期是相对和平的并不能抹去以下事实：已经发生了无数场战争，这些战争相当残酷。美国军队几乎一直在进行低强度战争，以维护其军事实力，并通过金融资本的扩张来确保其“和平”征服无数数百万人的权利。这种动态不仅不能带来世界和平，而且是为新的难以想象的残酷战争做好准备，从而重新瓜分世界。

第四，生产力的增长并非由于某种神话般的自由贸易，而是在垄断资本的枷锁下，根据少数大国的利益发生的。这意味着，无论某些地区在短期到中期取得了什么进步，都是增加以对帝国主义大国（主要是美国）的金融依赖为代价。例如，我们可以查看各种社会经济指标，观察到自1990年代以来墨西哥生活水平的改善。但这的代价是在经济上对美国的更加深刻的从属地位以及对某些人口阶层，特别是农民的毁灭。这种情况意味着，在增长时期，帝国主义者从其附庸国中获得巨额利润，而在危机时期，他们可以要求苛刻的政治和经济让步，进一步加深他们的民族压迫。这一切表明，短期的经济增长抵不上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代价。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苏联的解体并未宣告人类进步的更高阶段，而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胜利，这无非是美国金融食利者对世界的统治。正是这一阶级的统治限制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社会衰退。这首先对美国本身而言是正确的。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解释道：

> “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

这完美地描述了美国经济的特征。其国际金融利益的空前增长掏空了美国全球力量的真正源泉，即曾经强大的工业基础。离岸外包、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不足、天价房价、吸血的医疗产业、昂贵且质量低下的教育：这些都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日益寄生性而产生的。甚至美国的军事实力也因工业空心化而受到削弱。

美国统治阶级试图通过疯狂的投机、廉价信贷和印钞来弥补国家的经济衰退。正如托洛茨基所观察到的，“国家越穷，就显得越发富有。这就是最近的经济形势即投机生意的真实写照。”（《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1921年6月）。这预示着经济灾难。国家的整个社会结构正在腐烂，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阶层陷入贫困。

这种内部腐烂与世界经济影响力的下降相匹配。1970年，美国占世界GDP的36%，而如今占不到24%。这一趋势同样适用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1970年，前五大强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共占世界GDP的60%，而今天这一数字为40%。一方面，国际资本输出的显著增加导致了衰退；另一方面，它进一步将许多国家纳入现代资本主义关系中，在东亚和世界其他地方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无产阶级。

正是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增加。尽管这些国家经济上有所进步，但它们依然受制于国际金融资本。在金融权力方面，美国仍然无可匹敌：美元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控制着主要国际机构，前20大资产管理公司中有14家是美国公司，控制着相当于世界GDP一半的45万亿美元资本（其他6家公司分别是瑞士、法国、德国和英国公司。在前60名中，没有一家来自中国、韩国或其他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美国所持的霸权地位与其实际经济力量的减少之间的日益矛盾不可持续，是世界经济和政治不稳定日益加剧的根本原因。

世界贸易的增长、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中国的发展——所有这些因素都在削弱美国的霸权。为了维持其地位，美国必须逆转当前的动态。这意味着通过对抗中国、施压半殖民地、提高关税壁垒和减少给予盟友的一点油水来撕裂全球化的基础。从根本上说，对全球化最具决定性的反驳是，生产力的发展违背了全球化所依赖的阶级，即美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仅此一点就证明，试图维持或“修复”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只不过是一种反动幻想。

这并不是说美国不可能像1989年那样成功巩固其地位。 但这只能以国际工人阶级遭受灾难性失败为代价，并且无助于阻止帝国主义的不可避免的腐朽。唯一能结束帝国主义暴政并迎来真正更高发展阶段的力量是工人阶级。事实上，全球化增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

Brauchli/Reuters

Reinstein/Corbis

最左图：柏林墙倒塌，1989年11月。左图：帝国主义头目老布什在海湾战争屠杀后宣布美国霸权无可匹敌的“新世界秩序”，1991年3月。

使其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更加国际化和更加受到民族压迫。但这一潜力尚未转化为更强的政治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后苏联时期的工人运动确实已经落后了很多。

三、自由主义与后苏联世界

自由主义必胜主义

苏联的解体不仅导致国际力量的经济、政治、军事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导致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冷战期间，西方统治阶级将自己描绘成民主和个人权利的捍卫者，反对“极权共产主义”的暴政。归根结底，这是对畸形工人国家和反殖民斗争的敌意的意识形态借口。随着苏联集团的崩溃，共产主义被宣告死亡，自由主义必胜主义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反映出帝国主义的优先事项从对抗“共产主义”转向渗透东欧和亚洲新开放的市场。

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1992年）体现了后苏联初期的狂妄和胜利主义。自由资本主义被宣称为人类文明的顶峰，注定要遍布全球。当然，在这种幻想背后，是帝国主义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实际扩展。自由主义必胜主义是这一过程的意识形态辩护。美国及其盟友以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名义统治世界——这是《白人的负担》的现代版。

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掩盖下，美国领导了后苏联时期的各种军事干预。第一次海湾战争和对塞尔维亚的干预是为了“保护小国”。对索马里的干预是为了“拯救饥饿的人”。这种意识形态被联合国确立为“国家保护责任”（R2P）。正如这一学说的名称所示，它宣称大国有责任进行军事干预，以保护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反对它的声音如此强烈，部分原因在于，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没有完全符合这一类别。然而，从根本上说，它与这一时期的其他美国干预并无不同。其目标首先是巩固美国对世界的霸权，而不是确保长期的经济或战略利益。反对干预类似伊拉克的美国盟友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们不认为值得投入大量资源再次表明美国可以摧毁一个小国。更好的是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享受美国秩序的利益。

比这一时期的武装冲突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对世界每个角落的经济渗透。全球化过程本身伴随并辅以一系列意识形态原则。一种帝国主义国际主义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成为共识。民族国家被认为是过去的事，自由贸易、开放资本市场和高水平的移民被视为走向进步和世界和平的道路。再一次，这些高尚的原则反映了统治阶级的特定利益，并被用来践踏被压迫国家的民族权利，使西方去工业化，引进廉价劳动力，并向帝国主义资本和商品开放市场。

后苏联时期的工人运动

二战后，工人阶级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有自觉的革命先锋队来领导。尽管如此，它仍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苏联、新的战后工人国家（后来加入的有中国、古巴、越南和老挝）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中强大的劳工运动。后者包括强大的工会和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机会主义、官僚领导不断削弱并掏空这些工人阶级权力的堡垒。当1980年代美国和英国的工会遭到集中和热烈的攻击时，尽管工人做出了英勇牺牲，但事实证明，他们的领导层无力击退这些攻势。东欧，苏联官僚机构不攻自破，一个接一个地放弃阵地，直到最终自行解体。这些失败共同动摇了国际无产阶级整个战后的地位。

这些灾难被资本家利用，他们利用这些机会，从被削弱和迷失方向的工人运动中攫取了越来越多的利益。几乎在世界各地，工会会员人数减少，国有工业和公共事业单位被私有化，工人政党（例如曾经强大的意大利共产党）被纷纷解散，而在西方，越来越多的工业被关闭。这些对工人阶级的客观打击导致了工人运动的士气低落和右翼转向。

在帝国主义国家，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斯大林主义残余分子和工会高层公开拥抱自由主义必胜主义。连老牌的改良主义和工会主义都在这个新时代被认为过于激进。阶级斗争被宣告结束，工会必须变得体

Ngwenya/Reuters

1994年5月：新当选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握着前种族隔离总统德克勒克的手。“权力分享”协议结束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但保留了民族和社会压迫。

面（即无能），社会主义被视为乌托邦（在最好的情况下）。在工人运动中，对私有化和自由贸易存在反对意见，但这种反对微不足道，并被认为这些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想法所削弱。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新工党计划（New Labour）象征着这一右翼转向。他试图将英国工党从一个基于工会的工人政党转变为类似于美国民主党的政党。在政府中，他推进了涂有现代主义和进步社会价值观的激进新自由主义改革。随着这些新“工人领袖”在英国及其他地方，拒绝承认工人运动的存在及其建立的所有原则，传统组织进一步被削弱和掏空。自由主义在工会和工人政党中的主导地位基本上等于工人运动自断双腿，陷入今天的衰弱状态。

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

在西方和日本，工人阶级的地位因工业外迁而下降。然而，在许多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即使工业蓬勃发展，但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也会在后苏联时期大幅显著下降。如何解释在工人阶级客观上增强的情况下，政治上的弱势？尽管各国情况差异很大，但可以确定一个总体趋势。80年代和90年代的国际环境导致帝国主义加强了对“发展中”和“新兴”国家的控制。这反过来又有利于自由主义的加强，牺牲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和激进的工人阶级政治。虽然在性别、种族和宗教等社会问题上的自由主义通常没有取得很大进展，但经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在某种程度上政治自由主义（形式上的民主）却变得占主导地位。

在政治层面上，国际上向自由民主的趋同部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结果，美国越来越认为民主改革是遏制社会动荡的最佳途径。但是，新殖民地国家的内部政权也受到了国际工人运动弱化的严重影响。精英阶层对自己的地位更有信心，这给了他们让步的空间，而被压迫者的力量较弱，增加了使他们放弃激进变革的压力。这减弱了国内矛盾的尖锐性，使韩国、台湾、巴西和南非等国家和地区能够用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民主取代准极权主义独裁。对于更多依赖阶级合作而非压迫的政权，变化的环境减少了对工人运动做出让步的必要性。例如，在墨西哥，持续70年的旧法团主义一党统治逐渐瓦解，工会的影响也随之大大削弱。

在经济层面上，苏联的存在使新殖民地国家能够在两个大国之间保持平衡。许多政权国有化了经济的重要部门，并对资本流动有一定控制。这些模式效率低下且腐败，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给这种模式的棺材上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新殖民地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完全依赖帝国主义的经济指令，并抛弃旧的法团主义和国家主义结构。

新殖民地世界的工人运动也在不同于西方的方式下屈服于加强的自由主义压力。在巴西和南非等某些情况下，之前受到压制的工人阶级政党——巴西劳工党（PT）和南非共产党——成为了新的新自由主义“民主”政权的执行者。在墨西哥，工人阶级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依附于民主革命党（PRD）——从执政党分裂出来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PRD本身并不反对美国资本进一步渗透墨西哥，而只是为这个掠夺寻求更好的条件。在许多国家，劳工运动与自由主义非政府组织世界混在一起，支持“人权”和“千年发展目标”而非阶级斗争。因此，我们看到，在许多国家，工人阶级的经济力量在增长，但由于领导层向强大的国内和国际自由主义和世界帝国主义的潮流妥协，而导致工人阶级在政治上陷入瘫痪。

中国特色新自由主义

在反革命浪潮从东德席卷苏联之后，中共似乎前景暗淡。对1989年的天安门起义的血腥镇压使该政权在世界舞台上被孤立。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中国步苏联的后尘，融入日益壮大的自由民主阵营只是时间问题。但中共并未走这条道路。它从天安门事件和东方集团的反革命中吸取的教训是：要想继续执政，就必须将高速的经济增长与严格的政治控制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共加倍坚持邓小平在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道路，其中包括农业和工业的市场自由化、私有化和吸引外资。目前，共产党对权力的控制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对于中共及其拥护者来说，中共领导人正以其“开明”政策引导中国迈入历史的洪流。然而，阶级斗争的汹涌潮流将证明：促成这种表面成功的更多是因为后苏联时代一潭死水的局面，而不是中共的掌舵能力。

随着“全球共产主义”的威胁似乎已经消失，以及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中重申欢迎外资的承诺，帝国主义的投资涌入中国。各个经济特区提供了放松管制的、配得上最好的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实践的环境，也提供了大量顺从性得到了中共保证的廉价劳动力，与此同时，国家主导的经济则调动了巨大的资源来建设基础设施和工厂。为垄断资本主义创造巨额利润的同时，这种组合也为中国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在2008年之后的三年里，中国使用的水泥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使用的都多。自1978年以来，其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8亿人摆脱了贫困。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融入，带

来了生产率的巨大飞跃，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新市场，成为经济增长和世界贸易增长的引擎。中国的崛起既是后苏联秩序的最大成功，也是这种秩序的最大威胁。

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道德家来说，中共的重商主义和压制性政策证明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甚至是帝国主义。但与苏联和东欧情况不同的是，中国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从未放弃过对经济和国家的控制，主要的经济杠杆始终是集体化的。在许多方面，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类似于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极端模式：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向资本主义剥削开放某些经济领域。

以马克思主义评价邓小平及其继任者的政策，不能简单地在原则上否定市场改革或对资本主义的任何妥协。相反，我们必须分析各种协议的条款和目标，以及它们是否加强了工人阶级的整体地位。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概述了他对于在苏联工人国家中对外租让的态度：

> “我们公开承认，我们决不隐讳，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租让是向资本主义交纳贡赋。但我们赢得了时间，而赢得时间就是赢得一切，特别是在均势时期，当我们的外国同志正在扎实地进行革命准备的时候。革命准备得愈充分，胜利就愈有把握。可是在这以前我们不得不交纳贡赋。”
>
> ——《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1921年7月）

Alamy

Zhuoming/视觉中国

上海浦东新区的巨变体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与国内外资本家紧密相连。

列宁试图吸引外国资本进入俄国，以此促进经济发展和赢得时间，直至革命能够扩展到国际上。他准备作出的妥协丝毫不意味着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将被搁置。相反，他坚持认为：

> “这场斗争的形式变了，但它仍然是一场斗争。所有的承租人仍然是资本家，他们力图破坏苏维埃政权，而我们则应当尽量利用他们的贪婪。”
>
> ——《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1921年4月）

相比之下，邓小平宣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985年）。对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来说，这绝不是为世界革命赢得时间的问题，而是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和谐中发展中国的白日梦。

尽管从原始经济数据来看，过去的30年取得了惊人的成果，但如果以阶级的标准来评估中国工人国家的实力，局面就大不相同了。中国的发展靠的是与世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这种基础像流沙一样极不牢靠。中国的崛起有一个基本矛盾：它越强大，就越会削弱使其能够崛起的条件——美国霸权下的经济全球化。然而，中共并没有团结国际工人阶级准备与美帝国主义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相反，过去几十年来，中共一直打造“经济相互依存”、“多边主义”和“合作共赢”的信心，以此作为避免冲突的手段。这种和平主义的幻想解除了工人阶级的武装，从而削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工人阶级是能够决定性地击败帝国主义的唯一力量。

中国大陆出现了强大的国内资产阶级，工人国家的毁灭直接有利于这个阶级，这进一步削弱了中国的地位。中共非但远远未能认识到这个对社会制度的致命威胁，反而公开鼓励这个阶级的发展，渲染其对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人们不需要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能明白：一个权力建立在对工人阶级剥削之上的阶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的国家权力。

对列宁来说，同外国资本主义租让的唯一原则是保留无产阶级的权力和改善无产阶级的条件，即使这意味着资本家“150%的利润”。他的整个战略是基于俄国和国

外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而这种观点与中共的官僚机构毫无关系，他们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革命，最重要的是追求政治稳定以维护自己的官僚特权。中共的政策远远没有实现“共同繁荣”，而是试图压制工人阶级的愿望，维持尽可能低下的工作条件以便与国外的工人竞争和获得资本投资。获利者不是“努力工作的人”，而是官僚和资本家的小集团。事实是，中共在国内外与资本家配合，反对中国和国外的工人。这种打着“社会主义”名义进行的背叛行为，在国际工人阶级眼中玷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削弱了1949年革命的保卫。

四、自由主义对抗自由主义

1991年后西方各地的强烈政治共识并不意味着没有来自左翼和右翼的异议。然而，总体而言，这些异议并未挑战自由世界秩序的基本意识形态前提，更没有挑战这一秩序的物质基础：美国金融资本的统治。左翼出现的各种运动基于自由主义道德批评现状，即从现状的基本意识形态基础内部进行批评。无论他们是反对自由贸易、战争、种族主义还是紧缩政策，左翼运动的前提都是遏制帝国主义的过度行为，保持整体系统的完整但去除其最残酷的方面。正如列宁所解释的那样，对于他那个时代对帝国主义的这种批评，无非是“天真的愿望”，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同托拉斯、也就是同资本主义的基础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帝国主义论》）。因此，后苏联时期的各种左翼运动谴责、请愿、示威、唱歌和牵手，但完全未能建立对自由帝国主义的真正反对力量。

反全球化运动

反全球化运动在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抗议活动中达到了高潮。随后在世界各地出现了各种类似的运动，最终催生了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该运动本身是一个由工会、环保主义者、非政府组织、土著团体、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混合体。这个大杂烩的组织没有一致性或共同的目标；它是全球化的失败者联盟，试图阻止资本主义的车轮转动，而自由主义的左翼则试图使资本主义周期变得不那么残酷。

在工会中，反对全球化的动机是工人阶级对工业离岸导致失业的抵抗。如果正确引导，这种正当的工人阶级愤怒本可以改变国际上的阶级力量平衡，并阻止金融资本的进攻。这需要强有力的防御性斗争，直接面对垄断资本的利益：占厂、罢工、工会化运动。但工会领导人却采取了相反的做法。

在美国，他们反对离岸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但积极庆祝美国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而这正是他们自己通过参与“反共斗争”帮助实现的。工会无法在支持导致离岸外包的根本因素，即美国帝国主义霸权的同时保卫就业。但他们从反墨西哥和反中国的保护主义运动到支持克林顿竞选总统，始终就是这么做的。在欧洲，甚至连只是形式上反对自由贸易的反对声音都弱得多，许多工会积极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欧盟竞选。那些没有这样做的工会，像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拒绝与推动经济自由化的统治阶级斗争，而是寻求在国家层面上劳资合作，共同对抗“外国利益”。在这两种情况下，结果都是对工人阶级的彻底打击，导致大规模失业和整个地区的衰退。

Frayer/Getty

2020年2月，北京：在中共铁腕“清零”政策下，一名女子透过封锁住宅的铁皮围挡接收包裹。

反全球化运动的另一面由各种非政府组织、无政府主义者、生态学家和社会主义团体组成。正如这些团体自己坚持的那样，他们并不反对全球化，而是寻求“更公平”、“民主”和“生态友好”的全球化。正如前面解释的那样，在帝国主义的枷锁下，全球化不可能是公平的，而只有加强国际工人阶级的地位才能阻止新自由主义的攻势。反全球化运动无法推动这一点，因为它接受了它声称在对抗的自由主义必胜主义的结果。它声称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民族国家已被国际公司取代……所以显然它没有组织阶级斗争反对支持全球化的帝国主义国家。

由于反全球化运动认为全球化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并认为工人阶级顶多也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它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阻止数百万工作岗位的流失。左翼谴责某些工会官僚和反动政客大肆宣扬的保护主义沙文主义，但没有提供捍卫就业和工作条件的纲领。这意味着成为布什和克林顿的左翼回声，他们也谴责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以利于美国的对外扩张。反全球化运动所拒绝的基本真理是，真正保卫美国和欧洲工人阶级的工作岗位并不会违背第三世界工人的利益，而会通过对帝国主义掠夺的遏制来加强他们的地位。要成为国际主义者，工人阶级就必须不能变得“自由”和“开明”；他们必须联合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任何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斗争都会客观上团结国际工人阶级，并使其摆脱民族主义的领导。

虽然反全球化运动成功引发了一些骚乱，但这些对自由帝国主义构不成威胁。由于对现状的基本忠诚，该运动瘫痪，并最终只是成为了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金融资本猛烈进攻中的一个脚注。最终，几乎整个劳工运动和左翼放弃了对NAFTA和欧盟的正式反对。正是反全

球化力量的无能将数百万西方工人推向特朗普、法国的勒庞和意大利的梅洛尼等煽动者。

2008年后美国和欧洲的反建制左翼

2007年的信贷泡沫标志着自由世界秩序的顶峰。随后的经济危机代表了一个重大转折点，因为促进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增加的世界贸易、生产率的提高、政治和地缘政治共识——崩溃并逆转了。虽然危机及其后果并未结束后苏联时代，但加速了破坏其的趋势。在西方世界的许多地方，数百万工作岗位的流失和房屋被收回，随之而来的是一波紧缩政策，引发了深刻的政治不满。这是自199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了攻击后苏联共识关键支柱的重大政治运动。右翼的保护主义方面，反对“多边主义”和公开的沙文主义成为主流。在左翼方面，是反对紧缩政策，呼吁国有化，某些地方反对北约。这些运动的特点各不相同，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虽然民粹右翼在2020年出现一定衰退后重新焕发活力，但反建制左翼运动大多已经崩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失败?

反建制左翼是在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攻势下被推向前台的，这些攻击在2008年后加剧，并且在美国和英国，反对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干预也是推动力之一。虽然这些运动反对现状，但它们并未与之彻底决裂。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同导致社会条件恶化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这一趋势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科尔宾，美国的桑德斯，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和西班牙的我们能（Podemos）。与他们相比，法国的梅朗雄尚未明显失败。尽管如此，他的运动包含了导致他的外国同行垮台的所有因素。

就桑德斯而言，他是美帝国主义两党之一民主党的代表。鉴于他效忠代表亿万富翁的政党，所以他关于针对“亿万富翁阶级”的“政治革命”的演讲毫无意义。此外，作为一名自由派改良主义政治家，桑德斯承诺的“全民医疗保险”这一重大改革始终服从于与“进步”民主党资本家的团结，反对更为反动的共和党资本家。以“打击右翼”的名义，桑德斯背叛了他所声称的原则。桑德斯越是践踏他所代表的运动的愿望，他在民主党内部的地位就越高。今天那些希望在民主党之外和没有桑德斯的情况下重建这一运动的人没有意识到，正是自由改良主义本身的纲领导致了向统治阶级的投降。任何试图调和工人阶级利益与维护美国资本主义的纲领都必然会在美国资本主义的两个翼之一中寻求支持。为了打破美国政治的反动循环并真正推进其利益，工人阶级需要建立自己的政党，完全反对自由派和保守派。

科尔宾运动与围绕桑德斯的运动类似，但在两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首先，工党与民主党不同，是一个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它的工人阶级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科尔宾能够赢得工党领导权，而桑德斯则被民主党建制派阻止。另一个显著差异是科尔宾在外交政策问题上越界了。他反对北约和欧盟，批评2014年北约支持的乌克兰政变，支持巴勒斯坦，反对核武器，这些都是统治阶级绝对不能接受的。

面对英国建制派的狂热敌意和党内的持续叛乱，科尔宾面临的选择是直接对抗统治阶级或屈服。但科尔宾的和平主义和工党改良主义纲领寻求缓和阶级战争，而不是赢得战争。因此，科尔宾在每一个转折点都试图安抚统治阶级和党内右翼，而不是动员工人阶级和青年反对他们。科尔宾在更新“三叉戟”核潜艇项目、苏格兰自决、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北约以及最关键的脱欧问题上都做出了让步。科尔宾的例子甚至比桑德斯更能体现改良主义在阶级斗争中完全无能为力。

激进左翼联盟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它在希腊因群众反对欧盟强加的紧缩政策而上台。其崛起的速度仅与其背叛的深度相匹配。2015年举行的公投中，希腊人民以压倒性多数拒绝欧盟的紧缩方案，但激进左翼联盟公然践踏民意，同意了帝国主义的要求，对希腊工人阶级进行更严厉攻击。这种背叛的原因在于激进左翼联盟的阶级性质和纲领。在希腊，唯一能对抗帝国主义的力量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但激进左翼联盟不是工人阶级政党。它声称可以同时为希腊资本家和工人及被压迫者服务……这一切的同时保持希腊在欧盟中的地位。这一神话在与现实的第一次接触中就被打破了。尽管大多数左翼在激进左翼联盟背叛之前一直为其欢呼，希腊共产党则站在一旁，甚至否认希腊受帝国主义压迫。这两种政策的结果都给希腊人民带来了沉重打击。这一惨败表明，在希腊，迫切需要一个将争取民族解放、阶级独立和工人权力结合起来的政党。

随着世界进入一个急剧危机时期，西方的工人运动发现自己在政治上组织涣散、士气低落，被其所信任的力量背叛。虽然这无疑会在短期内使右翼势力获益，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新一轮崛起将再次需要对自由主义现状的代表进行政治替代。汲取过去失败的教训至关重要，以避免新的失败和反动循环。

新冠疫情，自由主义灾难

在新冠疫情期间，左翼甚至没有对自由主义建制派提出温和反对。随着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将其人口封锁数月，同时对崩溃的医疗系统和糟糕的生活条件无所作为，左翼欢呼雀跃并呼吁更严格的封控。一切对工人阶级的攻击都以“遵循科学”的名义接受。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是中立的，而是用来为资产阶级服务，这一基本原理甚至被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抛弃了。

结果不言自明。数百万人死于病毒，数百万人失去工作，许多家庭被困在家中，女性、儿童和心理健康受到损害。由于科学被用来为一种反动政策辩护，数百万人转而反对“科学”，拒绝了救命的疫苗。医疗系统得到了拯救吗？没有，所有地方都比以前更糟糕。工人们免受病毒侵害了吗？没有，他们继续在危险条件下工作。老人得到了保护吗？许多人死在破旧的养老院里。那些没有死的人由于社会隔离和缺乏锻炼，他们的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下降。养老院和退休中心的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

以“拯救生命”的名义，自由主义者和左翼声称除了屈从于政府和“科学”之外别无选择。但有一个选择。工人阶级需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并确保做出符合**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的回应。工会需要为安全的工作场所而

斗争，而不是简单地关闭或在死亡陷阱中工作。只要工作场所的安全还在由老板和政府控制而不是工会控制，工人就会死于本可避免的死亡。医疗和学校的工会需要为更好的条件而斗争，而不是为虚幻的未来收益做出牺牲。那些牺牲没有拯救公共服务，但却允许统治阶级进一步压榨它们。只有在与统治阶级及其封控政策的斗争中，才能解决危机背后的任何社会弊病，无论是医疗保健、住房、工作条件、公共交通还是老年人护理。

工人运动在疫情期间对封锁的彻底屈服导致了任何对疫情灾难后果的反对都将被右翼和阴谋主义势力主导。许多参加大规模反封控示威或反对强制接种疫苗的抗议活动的人都是出于对疫情期间资本主义政策造成的社会后果的合理愤怒。左翼不仅没有抓住这些情绪并将其引导到改善工人阶级条件的斗争中，反而大多数都谴责他们，并为国家镇压当拉拉队。

左翼和工人运动在疫情期间的彻底背叛，其基础是在整个后苏联时期奠定的。当这场全球性危机来袭，资产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民族团结”时，工人运动却立正站好，忠实地将工人阶级动员在“科学”和“共同牺牲”旗帜下。虽然政府和大多数左翼试图淡化疫情的影响，但他们不会那么轻易脱身。这场灾难的后果在工人阶级和青年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促使他们寻找答案和替代方案。

五、腐朽的自由主义秩序

傲慢变得歇斯底里

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代初，世界政治的动态有利于美国力量的相对增强。美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地位越高，支撑自由世界秩序的向心力就越强。这种自我强化的动态在苏联反革命后的高峰时期达到了顶点。这使得广泛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化得以在美国相对有限的直接干预下实现。当时，历史潮流似乎在推动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向前发展。

但在政治上，正如在物理学中，每一个动作都有一个反作用力。不可避免地，美国霸权的后果促使了对抗力量的出现。美国越来越鲁莽的军事干预造成了地缘政治灾难，浪费了资源，并在国内外强化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反对。金融放松管制和去工业化掏空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增强了其竞争对手，同时也使整个世界经济更加不稳定和容易发生危机。美国统治阶级越是利用自由主义来进一步推进其反动利益，就越是培育对自由主义的抵抗。缓慢但可以肯定的是，有利于自由世界秩序的动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弱，而反对它的力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2008年金融危机、2014年乌克兰政变和冲突、2016年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都是这一趋势的重要标志。

随着美国感到自己的实力在减弱，它的傲慢已经转变为歇斯底里。它越来越强烈地试图巩固其力量，对抗中国和俄罗斯，压榨盟友，对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制裁。但这些努力的代价越来越高，回报却越来越少。远未阻止其衰退，美国的反应迄今只是在加剧这种衰退。如今，疫情和乌克兰战争开始之后，世界政治的动态明显已经发生了逆转。现在，它指向了自由世界秩序的加速解体。北约和俄罗斯正进行代理战争。美中关系处于永久敌对状态。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非帝国主义世界兴起，表现为左翼（墨西哥）和右翼（印度、土耳其）的不同形式。西方的政治日益两极化，有些人试图通过与传统自由主义决裂来巩固帝国主义主导地位（特朗普、德国选择党、勒庞、梅洛尼），而另一些人则试图通过加倍自由主义的十字军东征来巩固帝国主义主导地位（拜登、特鲁多、德国绿党）。

世界日益不稳定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争议在于冲突的性质。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是民主与专制的较量。对于自由意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这是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的较量。对于斯大林主义者和第三世界主义者来说，这是霸权主义与多极化的竞争。所有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答案在《共产党宣言》的简单而深刻的词句中：“迄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今天自由世界秩序的解体遵循阶级斗争的规律。塑造世界的根本冲突并不在于中共与美国资本家之间、特朗普与拜登之间、普京与北约之间，或墨西哥的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MLO）与美国帝国主义之间；而是在于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社会衰退与世界无产阶级利益之间。意识不到这个的人将无法在即将到来的动荡中找到方向，更不用说推进人类进步的斗争了。

全球经济：一场巨大的庞氏骗局

正如前面所解释的，美国霸权使帝国主义的增长潜力暂时得到改善。正是这种经济形势的改善使资本主义世界在过去三十年中得以长期稳定。然而，今天，不仅扩张的可能性已经耗尽，而且之前扩张的条件也正在逆转。其结果将是生产力的大规模破坏，以及由此带来的所有不稳定。正如托洛茨基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中所写：“各个国家——如同各个阶级一样——在争夺一个小得可怜而且越来越小的份额时，要比争夺一个很大而且越来越大的份额时斗争得更为激烈。”这一因素支撑了当前的世界局势，并将在未来继续如此，除非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八年到十年的盛衰周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波动。狂野的投机和生产过剩之后是崩溃和恐慌。后苏联时期也不例外。然而，随着实际增长的可能性下降，投机和信贷成为美国试图支撑其整个秩序的主要方式。2008年“大衰退”的后果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面对可能的经济萧条，美国协调了一次史无前例的信贷和货币扩张。这创造了微弱的实际增长，但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即使对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说，这显然也意味着为未来更严重的崩溃创造条件。十多年来，每当增长乏力的迹象出现时，策略都是一样的：通过增加信贷来推迟问题。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一策略再次推到历史新高。为了应对大范围关闭经济的后果，资本家们只是简单地印刷钞票。这对经济太过了，最终这种方法的可能性达到了极限，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回归”。

美国利率的急剧上升正从世界经济体系中吸走大量

流动性。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说："浪潮的上涨让所有船只……潮水退去时，才知道谁在裸泳。"在十五年的廉价资金之后，经济的巨大部分必定在"裸泳"。当最终结算时，结果必定是灾难性的。由于美国处于资本主义食物链的顶端，基本上控制着国际信贷条件，即使它成为危机的中心，也能利用其主导地位让世界其他地区为其后果买单。这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将特别具有毁灭性，其中许多国家已经陷入深重危机，如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黎巴嫩。但其后果将是全球性的，并必然对世界秩序造成进一步打击，包括那些美国今天认为是盟友的国家。

经济界的一大部分要么在撒谎，要么故意对世界经济的前景视而不见。某些社会民主主义左翼声称，高政府债务水平并无大碍，工人阶级从低利率和更多债务中获益比从当前的高利率政策中获益更多。这只是那些资产阶级成员的回声，他们希望再"踢一次皮球"，最好能撑过下次选举。事实上，所有的政策选择——无论是高债务、高通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会被用来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根本的根本问题在于纸面上的资本与世界经济的实际生产能力之间的巨大失衡。没有任何金融魔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出路是工人阶级掌握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并以合理的方式重组经济。

对于右翼经济学家来说，解决办法是让自由市场发挥作用：接受将会有毁灭性的危机，让弱者死亡，强者愈强。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时代早已过去。世界经济由少数巨型垄断企业主导，这些企业与其他国家的垄断企业竞争。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让其垄断企业倒闭。如果福特和通用破产，这不会复兴美国的自由企业，反而会加强丰田和大众的地位。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导致的不是自由市场，而是垄断。一方面，这反映了全球范围内集中计划生产的趋势。但另一方面，在帝国主义下，垄断阻碍了生产力的增长，导致衰退和寄生。

对于像经济学家迈克尔·哈德森这样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灵丹妙药是"混合经济"——资本主义与国家干预和监管的结合。尽管在过去几十年里，这在经济和政府圈子里被视为异端，但计划经济再次变得时髦起来。这并不是出于启蒙，而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需要支撑以避免破产并与中国竞争。虽然工人阶级可以通过阶级斗争从资本家那里争取到让步，但不可能通过调控来消除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个体系的非理性和寄生性根植于资本积累的动态。政府本身不是那小撮资本金融家的对立力量，而是充当他们的执行委员会。当政府干预经济事务时，最终是为了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利益。

俄乌战争：对美国霸权的军事挑战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是苏联解体以来对美国霸权的最大挑战。一个大国有信心如此直接地挑战美国——而且迄今为止已经成功——表明了局势真正的变化。这场战争与过去几十年的战争不同。它不是低级别的反叛乱战争，而是高强度的工业战争。其结果不仅将决定乌克兰的命运，还将对欧洲和国际上的力量平衡产生重大影响。

乌克兰战争的两个决定性角色是俄罗斯和美国。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几十年来北约东扩到俄罗斯认为是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俄罗斯认为乌克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并准备升级冲突，直到乌克兰进入其轨道或被击败。美国的立场更加复杂。乌克兰对美国来说战略价值不大，被视为欧洲的边缘地带。对于西方自由主义建制派来说，"保卫乌克兰"是关于捍卫自由世界秩序，即美国在任何地方随心所欲的权利。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胜利将是对美国的沉重打击。这将表明美国的弱点，对欧洲政治建制派造成破坏性影响，并对北约的未来提出质疑。鉴于这些高风险，美国及其盟友不断升级战争，向乌克兰提供越来越多的武器。俄罗斯的回应是号召部分动员，并正在摧毁乌克兰军队。虽然美国一直在推动升级，但它及其盟友尚未承诺通过转向战时经济或直接干预来决定性地击败俄罗斯军队。目前，这场战争仍是对乌克兰控制的区域冲突。

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在各地都将无产阶级引导到其统治阶级的利益上。但战争的社会后果每天都在播下反抗的种子。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干预这一日益加剧的矛盾以建立新的领导层来推进工人阶级在这场冲突中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基本的出发点必须是，帝国主义体系本身——今天被定义为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对乌

Liyanawatte/Reuters

科伦坡，2022年7月9日：群众在抗议斯里兰卡经济崩溃的民众起义中冲入总统府。

克兰冲突负有责任。结束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暴政符合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只有在此基础上，全世界的工人才能团结起来，无论他们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美国人、中国人还是印度人。然而，这一总体观点的应用在各国根据具体考虑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俄罗斯工人必须明白，他们自己政府的胜利不会对帝国主义造成根本打击。它不会进一步使俄罗斯摆脱世界帝国主义，而是会使俄罗斯成为其在乌克兰的阶级兄弟姐妹的压迫者，为俄罗斯寡头的利益服务。无论它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造成什么短期打击，都不值得让俄罗斯成为乌克兰民族的压迫者。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永久冲突只会加强该地区世界帝国主义的力量。通过俄罗斯和乌克兰工人反对各自统治阶级的共同革命战线，北约和欧盟将受到更大的打击，就像伟大的十月革命那样。**把枪口对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寡头！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团结！**

乌克兰工人必须明白，美国、欧盟和北约不是他们的盟友，而是利用乌克兰作为其利益的棋子，被榨干后丢弃。通过与帝国主义结盟，乌克兰的国家独立将无法得到保障，这意味着被华盛顿所奴役，并导致与俄罗斯的永久敌意。乌克兰工人还必须反对他们政府对俄罗斯少数民族的压迫。这样的捍卫俄罗斯少数民族的行为将比泽连斯基的计划更有力地削弱克里姆林宫的战争努力。边界问题和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如果没有寡头和帝国主义者的反动阴谋，原本可以轻松且民主地解决。每天都越来越清楚的是，乌克兰工人在华盛顿的指挥下，为了华尔街的利益，被送往屠宰场。他们必须与俄罗斯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结束这种疯狂；否则将导致进一步的屠杀和压迫。**为了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车臣人和所有其他所有少数民族的自决权而奋斗！**

在西方，工人们被宣传轰炸，要求他们以为了北约在乌克兰的“民主圣战”的名义做出牺牲。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和世界工人的利益，最好的办法是反击那些在国内榨干他们的金融寄生虫和垄断企业。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清除那些忠于这些势力的工会和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的反动帮。这些劳工叛徒在国内的出卖行为与他们呼吁用北约的坦克和炸弹在国外建立“民主”密不可分。如果没有和平主义和中间派的沼泽地，这些叛徒早就消失了，他们嘴里挂着“和平”、“工会斗争”甚至“社会主义”，但却紧紧抓住战争贩子和自称是帝国主义仆从的人不放。一个反战运动只有排除掉工人运动中社会沙文主义的调和者，才有价值。**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打倒欧盟和北约！为欧洲苏维埃合众国而奋斗！**

Boureima/Anadolu

尼亚美，2023年8月3日：尼日尔政变支持者反对法国，高呼支持俄罗斯。真正的反帝力量是全世界工人阶级，而不是普京的俄罗斯。

越来越多的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工人将俄罗斯视为反帝国主义力量。这种错误的信念不会使他们摆脱美国、西欧和日本的枷锁。普京不是反帝国主义者，也不会成为任何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盟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墨西哥的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南非的拉马福萨、印度的莫迪和中国的习近平对他表示同情或不公开敌对。对普京的支持让全球南方的工人产生了可以在**没有**革命斗争的情况下改善生活条件和摆脱帝国主义的幻想。一旦世界被压迫群众的反抗迹象出现，全球南方的反动领导人将会寻求今天他们所谴责的那些帝国主义者的帮助。真正的反帝国主义力量是乌克兰、俄罗斯和西方的工人。他们以及全世界的工人，只有通过反对所有的民族压迫，不论压迫来自于大国还是自身被压迫的国家，才能团结在共同的国际主义旗帜下。**将帝国主义资产收归国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Hnidyi/Reuters

哈尔科夫：在俄乌战争中阵亡的乌克兰人墓地

中国：斯大林的一条缚带还是无产阶级的一路

支撑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实现增长与繁荣的动力迅速瓦解，而中共对全球自由

市场资本主义的信念却仍然没有动摇。习近平在2022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

> "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大江奔腾向海，总会遇到逆流，但任何逆流都阻挡不了大江东去。动力助其前行，阻力促其强大。尽管出现了很多逆流、险滩，但经济全球化方向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世界各国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拆墙而不筑墙、开放而不隔绝、融合而不脱钩，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不幸的是，对中共来说，"多边贸易体系"的未来首先取决于美国的行动，而美国不能允许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它要么迫使世界其他国家作出让步，以支撑其高高在上的地位，要么在倒下时将整个大厦拖垮。

十多年来，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在加剧。美国一直在施加更大的压力，因为已经明确的是：中国并未朝着自由民主迈进，而是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和军事竞争者。压力的增加促使中共加强对经济和政治异议的内部控制（如香港），并加强其军事地位。这反过来又导致美国进一步施压。这种加速发展的态势使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达到了数十年来的最高点，出现了公开军事冲突的威胁。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国际无产阶级有责任无条件地保卫中国。帝国主义者之所以对中国充满敌意，正是因为中国经济的集体化核心促成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这就是工人阶级必须捍卫的东西。然而，工人阶级依据的必须是**自己的**方法和目标，而**不是**寄生的中共官僚机构的方法和目标。

托洛茨基在谈到苏联时解释说，"真正保卫苏联的方法是削弱帝国主义的地位，和巩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地位。"（《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这一战略——完全适用于今天的中国——迥异于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战略。中共首先谋求的是维持现状。首先，它试图通过依靠比尔·盖茨、伊隆·马斯克和杰米·迪蒙等美国资本家来恢复与美国的关系，而这些资本家正是压迫世界并试图主宰中国的那个阶级的代表。这些手法只能让美国工人更敌视中国，疏远中国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最大潜在盟友。至于全球南方的被压迫人民，中国共产党支持的不是他们的解放，而是与这些国家的精英们建立虚幻的联盟。一遇到困难，或者帝国主义提供更好的甜头的话，那些利己的骗子肯定会第一时间放弃中国。

中国官僚机构中有一些更好战的声音，这些声音认为，加强解放军的实力是保卫中国最可靠的方式。解放军技术和作战能力的提高当然是好事。然而，军事问题不能脱离政治，在政治领域，统治阶层的保守利益也会削弱中国。解放军整个防御战略的一个关键支柱是，通过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并争取对中国周边"第一岛链"诸岛的军事控制，来阻止美军进入此岛链。但无论在怎样的冲突中，占有很多无人居住的小石头远远不如获得周边国家无产阶级的支持更具决定性。

真正把美日帝国主义赶出东海和南海的唯一途径是一个涵盖整个地区的工农反帝联盟。但是，中国共产党怀着其民族主义战略，并未尝试争取让菲律宾、日本、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工人加入其事业。相反，它只注重短期的军事优势，无视邻国的民族感情和内部阶级对立，从而迎合了帝国主义者的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

在台湾问题上，中共这一毛病体现得尤为明显。台湾的工人在其资产阶级践踏下遭受了残酷的压迫。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并非鼓励他们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与帝国主义和当地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是说服台湾的资产阶级自愿服从其统治，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中共承诺在其"一国两制"的政策下保持台湾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行政管理。对工人来说，中国共产党带来的不是解放，而是对持续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支持和斯大林式的镇压铁蹄。毫不奇怪，这种"双输"的提议对赢得台湾民众支持统一没有什么作用。

中共的备选方案是直接军事干预，这虽然有可能成功重新统一台湾，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特别是如果招致当地工人阶级敌视的话。如果中共要走这条路，托洛茨基主义者会站在解放军一边，对抗台湾资本家和帝国主义，但斗争的方式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为指导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反对破产的"一国两制"，争取通过**革命手段实现重新统一**，即通过反对台湾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和反对大陆官僚阶层的政治革命实现重新统一。这一战略将把中国的工人团结在一个共同的阶级和民族利益周围。它不仅会动摇美国和台湾资产阶级之间反共联盟的根基，而且会使中国成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反帝斗争的灯塔。

虽然今天中国共产党仍继续自己既忠于社会主义、又忠于资本主义，但我们不能指望这种情况会维持很久。有一些强大的力量，同国内外资本家利益勾结在一起，正推动中国完全废除国家控制、重新打开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大门。我们必须誓死阻止这样的结果！然而，统治阶层内部也有一些派系，在工人阶级不满的压力下，这些派系可以让党急剧左倾，镇压资本家，并从故纸堆中祭出传统毛泽东思想的反帝国主义和平均主义空话。但是，正如邓小平的市场改革一样，毛泽东在狂

Bogu/新华社

2023年6月：在美国经济战的压力下急于稳定外资投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比尔•盖茨。

热群众动员基础上进行的平均主义自给自足尝试，无法克服全世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扼制。事实上，毛泽东政策的灾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带到了崩溃的边缘，直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转向“改革开放”。

中共的种种路线转弯，不过是这个寄生官僚阶层在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框架内，为维护其特权地位所采用的不同手段而已。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共提出了各种说法，与这些说法相反的是：社会主义无法只在一国之内建立，而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更是幻想。中国工人阶级的唯一出路是是团结在一个真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坚持阶级独立、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的政党中，扫除既得利益的中共官僚集团。**粉碎官僚！保卫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

六、为革命领导权而战

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历史危机时期，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被解除武装。各地工人阶级都被官僚和叛徒领导，这些领导人屡战屡败。面对巨大的挑战，锻造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领导层任务迫在眉睫。如何锻造这样的领导层？这是今天革命者面临的核心问题。未来几年不可避免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将使群众反对其现有领导人，并为工人运动中的激进重组提供机会。但如果没有现有的革命干部拒绝过去30年的失败政策并正确提出今天的任务，这些机会就会被浪费。

列宁主义的核心经验

在《不断革命论》（1929年）中，托洛茨基写道：“争取无产阶级独立的政党构成了列宁一生的主要内容。”正是这一列宁主义的核心概念，被每一波新的修正主义浪潮所否认。虽然这些修正主义根据时代的主要压力具有不同的形态，但修正主义在根本上总是将无产阶级的利益从属于外来阶级的利益。

列宁的先锋党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成熟起来，当时第二国际的政党，尽管宣誓反对战争，却绝大多数爱国地支持自己的政府。在战争期间的著作中，列宁展示了这种历史性背叛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由前一时期帝国主义崛起所培育和根植的。少数大国对数百万人的剥削产生了超额利润，这些利润被用来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这一阶层在其习惯、意识形态和目标上与资产阶级结盟，反对工人阶级的利益。大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全面投降表明，工人运动中的亲资本主义趋势不仅变得主导，还使曾经的国际革命派大多数陷入瘫痪或被拉拢。

列宁从这一经验中得出结论，与工人运动中的亲资本主义元素团结意味着在政治上从属于资产阶级本身，并必然背叛社会主义斗争。他的大部分批判针对工人运动中的中派分子，他们并未公开否认社会主义原则，但却不惜一切代价与工人阶级的公开叛徒保持团结。列宁坚持认为，中间派是建立能够引领群众走向革命的党的主要障碍。这一教训对于俄罗斯十月革命的成功至关重要，但在德国未能及时吸取这一教训，导致1919年斯巴达克起义的失败。在战争和革命的废墟中，第三国际成立，它的成立原则是，任何声称为革命而斗争的政党都必须在政治和组织上与工人运动中亲资本主义和中间派决裂。

随着战后革命浪潮的消退，出现了资本主义稳定化时期，使苏联在世界舞台上孤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主义出现，拒绝了列宁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工人阶级的政治独立。斯大林不再依靠国际工人阶级扩大革命来保卫苏联，而是越来越依赖其他阶级力量。无论是富农、中国的国民党、英国工会官僚还是帝国主义者本身，斯大林达成的协议都是牺牲工人阶级的长期利益以换取所谓的短期优势。这不仅没有增强苏联的实力，反而导致一次又一次的血腥灾难，削弱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体地位。

托洛茨基为左翼反对派和新的第四国际的斗争，正是列宁主义的延续，因为它致力于建立一个国际先锋党，以对抗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趋

Favila/AP; R. Perez

如何保卫中国？

中共依赖无人岛屿，而不是与东南亚无产阶级结成反帝同盟。
上图：美济礁上的人工岛
右图：2023年五一游行，马尼拉

势。包括托洛茨基本人在内的许多干部被杀害，导致了在二战浩劫后出现的革命机遇中的政治迷失和失败。结果是斯大林主义和世界帝国主义的加强。这些历史性的失败以及自那时以来重铸第四国际的失败，导致了进一步的灾难性挫折，直至苏联本身的毁灭。

后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向自由主义投降

在苏联反革命时期，自称继承托洛茨基主义衣钵的力量大多袖手旁观，甚至积极欢呼十月革命的剩余成果被摧毁。我们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独自坚守托洛茨基的纲领，捍卫苏联并主张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的政治革命。尽管规模微小且存在政治上的弱点（参见关于不断革命的文件），ICL在这一时代的决定性考验面前坚守战壕。但其弱小和孤立无援，充分反映出革命左翼在新历史时期初期的悲惨状况。

苏联解体的后果对于所有声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世界迅速转向右派——不是走向波拿巴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而是走向自由主义——这对许多组织产生了很大压力，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出现了取消主义的倾向。面对世界局势的这种转变，任务是基于最近无产阶级失败的教训，在政治上反对自由主义，缓慢而耐心地重建革命工人阶级先锋队。虽然ICL能够解释苏联的崩溃，但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左翼一样，它拒绝建立对自由主义的革命替代方案（见《ICL的后苏联修正主义》）。

通过适应自由主义而不是努力开辟一条独立的工人阶级道路，“马克思主义”左翼在面对新时期的稳定和相对繁荣时失去了方向。为了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它诉诸危机炒作和指出帝国主义具体的暴行或反动政策，以“证明”帝国主义仍然具有反动性。这种做法实际上与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不谋而合。自由主义在通过金融资本扩张实现“和平”剥削的背景下，并不觉得对试图遏制战争和种族主义等“过度行为”的批评有任何问题。

后苏联时期的战争、紧缩政策以及民族和种族压迫当然成为工人和青年反抗的理由。但要使这种反抗具有革命性质，就必须揭露主导这些斗争的自由主义领导层是如何成为推进这些斗争的障碍的。必须加剧名正言顺反抗情绪与自由主义者对导致这些祸害的制度忠诚之间的矛盾。任务是将这些运动同自由主义领导层中**决裂**。然而，没有一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将此视为当前的任务。相反，这些“革命者”附和每一波对现状的自由主义反对浪潮，给这些资产阶级运动涂上了一层淡淡的马克思主义色彩。

更右倾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放弃了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的伪装，建立了新自由主义的左翼，无论是绿党、美国民主党、英国工党和巴西劳工党（PT）。法国的曼德尔派——声称是第四国际的继承者——解散了他们的革命共产主义联盟（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取而代之的是模糊不清的新反资本主义党（Nouveau Parti anticapitaliste），其宣称的目标不再是工人阶级革命，而仅仅是创建一个“温和社会自由主义的战略替代品”（丹尼尔·本赛德）。其他一些组织则退回到最糟糕的宗派主义中。诺斯派（以世界社会主义网站闻名）声称，在全球化时代，工会“根本无法认真挑战国际化的公司”，因此已经完全反动。尽管他们的言辞激进，这种反工会的立场实际上只是让工会中的自由主义领导层继续不受挑战。

更为中间的团体，如国际共产主义同盟（ICL）和国际主义团体（Internationalist Group, IG），继续宣称需要革命领导并“与改良主义决裂”，但完全抽象化了与自由主义决裂的需要，这是在新时期中凝聚革命政党的主要政治任务。不可避免的是，ICL和IG对其他左翼（以及彼此）的论战基于永恒的原则和抽象的术语，而不是沿着革命路线指导阶级斗争。

经过30年对自由主义的迷失和屈服，其结果不言自明。如今，随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那些自称为革命奋斗的组织分裂、虚弱且僵化（无论是字面上还是比喻上），几乎对工人阶级斗争的进程没有任何影响。他们依然停留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未能成功的模式中。

为今日的第四国际而战

当今的革命斗争必须建立在对时代关键特征的正确理解之上。美国帝国主义仍然是主导力量，它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继续定义全球政治。挑战它的不是敌对帝国主义强国的积极崛起，而是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和军事权重上的相对减弱，这对中国——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和具有一定自主权但依然依赖并受世界帝国主义压迫的地区强国有利。当前的动态表明，全球经济和政治不稳定性增加，地区冲突（如乌克兰、台湾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全球影响。世界秩序面临的压力迅速上升，各国的内部压力也在增加。

美国帝国主义恢复主动权的最明显方法是对中国造成毁灭性打击。中共官僚通过在世界帝国主义、日益增长的资本家阶级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平衡，滋生了中国内部的巨大矛盾。后苏联秩序平衡的衰落将加剧这些矛盾。特别是在面对内部动荡时（如对中国共产党严酷封控的抗议），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力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牢固。随着经济条件不仅停滞而且开始恶化，工人阶级不会保持被动。中国资本家也不会被动接受被官僚压榨。最终，中国要么像苏联一样沦陷于反革命，要么无产阶级起义，扫除官僚，通过政治革

M.S. Nappelbaum

1919年3月：弗·伊·列宁（左）在莫斯科第一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主席团上

命建立无产阶级民主。何时决定这是无法预测的。任何摊牌必然会由官僚的暴力手段所先导，对反革命分子和工人阶级的不满进行镇压。革命者对中国的任务是捍卫1949年革命的成果，反对反革命和帝国主义侵略，同时揭示官僚是如何在每一个转折点通过背叛国际革命来破坏这些成果的。

美国及其帝国主义盟友为维持对世界秩序的控制，将给自己的人民带来越来越高的社会成本。帝国主义强国的社会结构已经从内部开始腐烂。随着生活水平的下降，通过廉价信贷、垄断利润和投机泡沫维持的平衡不再可持续。许多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法国的情况最为爆炸性，但即便是美国和英国等国家，也出现了工会斗争的上升趋势。

虽然这些斗争的第一波浪潮正在被击败，但工会底层的压力只会上升。越来越清楚的是，工人阶级面临的任何问题都不能通过对现状的姑息性调整来解决。这将更加迫切地需要一个能够领导工人阶级走上革命斗争道路的工会领导层。　阻碍这一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所谓的“革命者”，他们支持稍微偏左但亲资本主义的工会领导人，而不是根据革命纲领建立反对派。 只有与这种中间派作斗争，才有可能使工会脱离目前的亲资本主义领导层。

随着威胁的积累，自由主义变得越来越狂热和歇斯底里。这反映了自由派小资产阶级在绝望地坚持现状，但也反映了在面对日益增长的右翼反动时被压迫者的合理恐惧。西方的革命者必须明白，要对抗日益增长的反动，有必要打破束缚在移民、少数族裔、女性和其他性别被压迫者运动中的自由主义。对其纲领中某些孤立元素（如警察改革或向国家呼吁干预）进行听起来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不够的。只有在实践中展示自由主义如何直接阻碍被压迫者的斗争，其对群众的控制才能被打破。这不能从旁观者的角度完成，必须在斗争中，通过对资本主义暴政的每一次表现提供阶级斗争的回应来完成。

世界秩序的震荡将最严重地打击金字塔底部的国家。不久前，美好生活的前景似乎还有可能，但现在对数亿人来说，这种希望正在消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工人阶级代表了资本主义的最大危险。南方国家的民众越来越多地摆脱了与世隔绝的村庄，走向城市化、识字并与世界相连。他们在世界生产中日益增长的作用赋予了他们巨大的力量，但他们唯一的前景是进一步贫困。正是这种被剥夺权利者的巨大力量推动了民粹主义势力的崛起。这些国家的弱小资本家阶级必须在两个压力之间找到平衡：一是来自下层威胁将他们消灭的压力，二是来自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帝国主义金主的压力。左翼的煽动和宗教的蒙昧主义迄今证明在抑制社会不满方面是有效的。但当这失败时，军事独裁将会到来。

在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中，争取从大国的控制中解放民族并解决其他最基本的民主任务起着决定性作用。随着这些斗争的加剧，每一步都会证明民族资产阶级扮演了背叛的角色，他们在私有财产的祭坛上牺牲了民族解放和工人阶级及农民的解放。革命者必须参与斗争，并在每一步中展示，只有工人阶级站在所有被压迫者的前列，才能实现解放。

在任何情况下，反对专制或蒙昧主义政府的斗争都不能成为做出任何让步或与亲帝国主义的自由现代化替代方案结盟的理由。这只会加强反动势力，同时将民主改革的力量与帝国主义绑在一起。在那些资产阶级以左翼“反帝国主义”色彩自居的国家，有必要通过推进反帝国主义斗争来揭露他们虚伪的谎言。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宣扬革命是最无效和适得其反的行为。必须捍卫任何打击帝国主义利益的改革，但这绝不应成为支持资产阶级民粹主义的理由。工人阶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其独立性，始终明确表示，它是以自己的方法和目标，即革命的阶级斗争，来对抗帝国主义。

今天，为国际革命而战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 基于明确的纲领和前景的重组至关重要。　我们提供当前文件，作为对第四国际重建和重组力量进程的贡献。ICL深陷内部争议和政治迷失的泥潭，但它坚信，其已启动的整合进程将使其在即将到来的社会动荡和冲突时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那样：

> “最初阶段非常困难且充满折磨的结晶过程将在未来呈现出猛烈而迅速的特性……巨大的冲突席卷了半途而废的人为的事物，另一方面为一切可行的事物提供了力量。 战争只为工人阶级运动中的两种趋势留出了余地：不停地背叛社会爱国主义和大胆而有能力走向终结的革命性国际主义。正因为如此， 中间派害怕即将发生的事件，才会对第四国际进行激烈的斗争。他们有自己的道理：在大动乱的后方，只有那个不仅清除了其队伍中的宗派主义者，而且系统地对他们进行了摒除意识形态的摇摆性和自身精神的懦弱性的训练的组织才能生存和发展。”
>
> ——《宗派主义、中派主义和第四国际》（1935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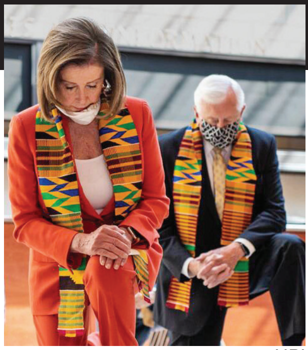
向着重铸第四国际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目标前进！■

特朗普卷土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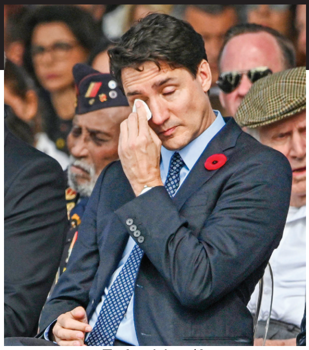
自由主义之死

作者：G. Perrault

译自 Trump's Comeback: The Death of Liberalism （英语）, Spartacist 增刊, 2024年11月7日



UPI



F. Andrieu/Agencepeps

Bernd Von Jutrczenka/DPA

不再为“黑人的命也是命”下跪了，不再出现那些哭哭啼啼的自由派总理，以及他们与难民合影的作秀了。

唐纳德·特朗普的第二次当选对后苏联时期自由主义秩序标志了致命打击。美利坚帝国并未被打败，自由主义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也并未终结。但作为西方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主导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已经死了。

2024年与2016年不同。当时，特朗普的当选被视为一种异常现象。这引发了自由主义者的狂热反应，他们加倍捍卫现状及其所谓代表的进步价值观。2020年，拜登击败了特朗普，而新冠疫情也使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力量遭受了挫折。这些进展让华盛顿、伦敦、布鲁塞尔、柏林和东京集体松了一口气：“特朗普、民粹主义、新冠疫情，这一切都只是场噩梦。”

但事实并非如此。从阿富汗、乌克兰和巴勒斯坦到美国国内局势，拜登总统任内见证了自由主义现状的持续崩溃。这个本应代表全球启蒙主义运动的政党全程监管了加沙的种族灭绝，这是几代人以来最严重的罪行。虽然拜登及其政府中弥漫着一种愚蠢的乐观主义，但军事、经济和政治的基础却在他们脚下逐渐瓦解。

因此，在所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右翼反动势力正在抬头。昨日的胜利者——自由主义者——正被一个接一个地赶下台。卡玛拉狂热（Kamala Mania）——一个非毫毫能够使现状维持更长时间的希望——代表着饱受折磨的自由主义秩序的最后一丝活力。它既虚幻又短暂。而特朗普在11月5日的胜利既象征着又证实了帝国主义建制中的自由派力量的失败。

这不是侥幸。自由主义的衰落有着比唐纳德·特朗普、社交媒体和虚假信息更深层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美国统治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转变反映了美国霸权的衰落。当美国作为无可争议的世界强国时，它有能力在国内外推行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现在，随着各方面压力的增加，自由主义成为了美国全球霸权不必要的阻碍。天鹅绒手套下始终藏着一只铁拳。但现在，这只手套太昂贵了，它要被脱下来了。

在美国大选之前，自由主义者就已经在尽可能快地抛弃自己的“价值观”。开放边界、国际法、跨性别权利、多元文化、反种族主义——统治阶级自己宣称拥护这些崇高原则的时代已经结束。特鲁多、杰辛达·阿登和奥巴马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史塔默爵士（工党党魁）是统治圈子里左翼的代名词。

这一情况是否是绝望的？对于那些寄希望于进步精英开明统治的人而言，情况确实毫无希望。他们只能一边咒骂群众的落后意识，一边准备向反动势力磕头。但希望恰恰存在于劳动群众之中，包括支持特朗普的数百万民众。

击败自由派是民粹主义反动势力能导致的最糟糕的结果。现在，他们必须自己驾驭崩溃的世界秩序中不可

（下续第39页）

斯巴达克派

iclsibadakepai

@sibadakepai

iclfi.org/zh

中国妇女

家庭的奴隶，或是革命的斗士？

作者：Ñico Connelly和启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图片来源： AFP)

中国妇女未来将走向何方？随着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畸形工人国家的压力不断升级，中国共产党愈发加紧巩固家庭制度——以及这个制度对女性带来的一切反动的社会束缚。只需看看所谓的离婚“冷静期”条款（该条款规定在离婚程序开始前必须有30天的等待时间）就可见一斑。官僚机构正在敦促女性生育三个孩子，但经济的市场化已经摧毁了能让妇女腾出时间的社会服务。结果是，女性既需工作，又要承担照料责任，根本无力承担更多生育任务。更可怕的情况发生在广大农村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女性被拐卖、沦为家庭奴隶、作为新娘出售的“铁链女”等骇人听闻的现象屡屡曝光。

通过强化家庭和继续与资产阶级结盟，中共加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部矛盾，并削弱了中国抵御好战美国的能力。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妇女面临两条道路：要么在中共官僚的命令之下退回到家庭奴隶的地位；要么挺身而出，成为国际主义工人运动的先锋力量，与美帝国主义展开正面斗争。

妇女境况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历来是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的反映。中国革命摧毁了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不仅为国家发展的道路奠定了前提，也为妇女解放开辟了现实可能。革命胜利后，妇女首次在土地分配中享有与男性

atiger/Shutterstock

无署名

等量的份额，并取得了自由离婚的法律权利。尽管彼时中国物质条件匮乏，但新政权仍作出了认真的努力，试图通过建立公共食堂与集体家务劳动等方式，将家庭内部劳动社会化。这一政策使得到了1970年代末，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达到70%以上。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女共产党员更是站在最前沿，成为激进先锋的一部分。然而，毛泽东时代中国严重的官僚体制扭曲，使得除了使用强制手段之外，无法提高生产力，最终导致经济陷入孤立和瘫痪般的停滞。正是这一危机，最终为邓小平右翼市场改革路线的抬头铺平了道路。

这一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三十余年之后，妇女已深度嵌入社会化生产过程的核心领域；但与此同时，剥削机制与家庭制度的束缚却在不断侵蚀劳动妇女所获得的新自由。相较于第三世界的广大女性群体，中国妇女在社会地位上的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并且在政治上往往对此具有一定自觉性。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家阶级尚未掌握国家政权，经济命脉仍然保持集体化控制，这使得当局得以将大规模外资引导用于内部的生产性发展。虽然这让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工人得以摆脱贫困，但是，中共对国际资本主义的全面迎合，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社会代价。集体照护体系、农村托育服务、医疗保健与养老服务的解体，构成了一场深刻的社会灾难。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旧垃圾"都卷土重来了：彩礼制度的复兴与飞涨，家庭内部偏向由男孩继承财产的重男轻女社会观念等等现象，造成了多达三千五百万人口的巨大性别失衡。其结果是：古老的社会关系被生硬地掺杂进了现代工业的高峰之中。

中国的社会进步加剧了中共增长模式核心的矛盾：经济发展依赖于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和内部资本主义的增长。农村的贫困阻碍了国家发展，然而，借助接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国得以通过以生产出口来有限地克服这种贫困。然而如今，对中国最具威胁性的力量是美国。美帝国主义正在撕裂原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大举加征关税、竖起一道道民族经济壁垒，企图将中国驱逐出全球市场体系。中共所代表的民族官僚利益决定了其对特朗普政策的回应加剧了中美工人阶级之间的民族分裂，而不是试图动员美国工人反对美帝国主义。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部压力，习近平和官僚集团要求女性遵循所谓"新型婚育文化"。然而，中共并未进一步疏远甚至剥夺资本家阶级，反而通过"鼓励大量生育"来维持依赖密集廉价劳动力的旧发展模式。"三孩政策"的出台，伴随着对传统孝道价值的意识形态宣传，正是该趋势的体现。最终，中共的这一路线将意味着把妇女从劳动力队伍中剥离出去，随之带走的是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力量的巨大潜在来源。无法维持与美国的合作，又受限于其民族官僚利益体系，摇摆不定的中共正试图以牺牲妇女和工人阶级为代价维持社会稳定，而不是以牺牲美帝国主义为代价。中共没有选择剥夺资产阶级、提供优质医疗、教育和全民就业，反而让农村儿童因绦虫感染而丧失基本健康，让学生耗尽青春备战高考，而名校毕业生依然找不到工作。然而，当局却要求年轻人应该生育更多的孩子。人口被分散进一个个孤立的家庭单位，削弱了社会总体生产效率——数以百万计的家庭每天在做饭、打扫和育儿等重复性事务上消耗大量时间与资源。简而言之，中共正依靠那些革命曾为其消灭奠定基础的社会残余来维系自身统治。

在即将到来的历史阶段，革命者必须将妇女解放的斗争同捍卫中国的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尤其是因为中共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崩溃的反动回应，最集中地表现于妇女问题领域。当下的家庭成为各种反动意识形态的温床，反映出妇女社会地位的退化以及她们与社会的隔离状态。而一旦能够让妇女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积极参与政治与经济生活，中国就可能成为亚洲乃至全球妇女争取解放的重要灯塔。今天，家庭被用来填补市场化摧毁的社会服务体系所留下的空洞，而"清零政策"期间，这种体制性缺陷暴露得尤为充分。若能通过提供优质的托育和养老保障来减轻家庭的负担，就可能将广大工人阶级男女团结在一起。然而，要真正将家庭职能社会化、使妇女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每前进一步，都必须打破美帝国主义对全球经济的霸权。

女权主义运动的现状

女权主义运动显示出在缺乏反帝国主义的视角下争取妇女权利所面临的问题。官僚集团助长了一个敌视工人国家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形成，而它成为了西方媒体的宠儿——他们一心利用对妇女状况义愤填膺的活动家作为攻击中国政权的攻城槌。现在中共正将女性重新赶回家庭，女权运动也遭到了日益严厉的打压，从此前在中国社会中具有某种"受控合法性"的地位急剧滑落。革命者必须**捍卫遭受国家镇压的女权主义抗议者**！女权主义者面临的残酷镇压只会把她们进一步推向帝国主义的怀抱。

但女权主义运动未能真正改变女性处境，根源在于其自由主义的视角和策略。这种策略的问题，在女权主义脱口秀演员杨笠引发的文化争议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她关于"普信男"的调侃段子引发了广泛争议。对此，许多男性选择以捍卫现状和官僚集团为由，声称西方资产阶级的性别政治将摧毁中国及工人阶级的团结。这一反应恰恰揭示出：女权主义的策略既不能，也从未打算将中国工人群众真正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社会不平等。相反，它激起的是民族主义的逆流，而这种民族主义宣称：国家若要抵御外来干涉，必须首先保卫家庭制度。如果能够通过揭示中共在妇女问题上的反动政策如何破坏整个工人群众的生活条件，从而将妇女解放的斗争与捍卫中国的斗争联系起来，妇女运动将会变得更加坚实。

面对中共敦促女性生三胎的高压政策，女权主义者的愤怒完全正当。然而，许多人因此诉诸于拒婚拒育等带有分离主义色彩的抗议手段。"躺平"或个体性地拒绝家庭义务，或许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女性而言尚可行，但对工人阶级与农村妇女来说却远非易事——她们往往依赖家庭的资源整合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如果反对官僚政策的斗争仅仅停留在"拒绝成为母亲"这一权利诉求上，女权主义者终将会被引向资产阶级的怀抱。这些资

AP

Hutchins/视觉中国

左图：母亲带着孩子在田间劳作，1942年。右图：妇女在鞍山钢铁厂工作，1956年。1949年革命后，大批妇女被动员加入工人阶级。

产阶级一方面希望广大妇女保持可被剥削的状态，另一方面则鼓吹资产阶级女性所谓的“自由”。女权主义若与中国资产阶级结盟，其结果必将是为摧毁中国尚存的社会化财产关系铺路——而这无疑将使妇女的整体处境进一步倒退。

在前苏联和东欧工人国家资本主义复辟后，妇女不仅没有得到解放，而是首当其冲地承受了随之而来的社会衰退。大规模的去工业化使大量妇女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被重新赶回“子女、厨房、教堂”（Kinder, Küche, Kirche）的传统性别角色中。宗教在新建立的资本主义政权支持下重新蔓延。快速离婚、便捷堕胎、政府补贴住房、免费托育与医疗服务——这一切都随着工人国家的解体而被清算殆尽。尽管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长期将家庭定义为“社会主义的战斗单位”，而工人国家在物质上也远逊于西方，但集体化的经济结构仍使女性有可能在社会和经济上获得独立——而这种潜力，甚至是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女性都未曾真正拥有的。那些与帝国主义结盟、为反革命服务的女权主义者，实际上动员起来推动了对妇女而言最具倒退性的社会变革之一。

如果缺乏将妇女解放与捍卫中国革命联系起来的战略视角，女权主义者面对民族主义时就只能诉诸道德谴责这一笨拙工具，从而进一步加深这种社会分裂：一边是倾向西方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另一边是将中共视为抵御美帝国主义关键力量的工人群众。针对以“谁对女性的看法更进步”来划分敌友的女权主义策略，革命者必须以反帝纲领为基础，重建妇女运动。唯有与有着切身利益的广大工人群众团结起来，争取对抗中共、重建公共服务、并将家庭职能社会化，女性运动才可能真正突破中国民族主义的束缚。

毛主义反对派

面对帝国主义者和一些中国资本家对女权主义的接纳，一股重要的毛主义潮流试图从阶级立场批判女权主义。不少毛派确实看到了当今女权主义运动所具有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也指出了资本家如何通过操弄女权主义话语来吸引女性消费群体的虚伪手段，但他们得出了错误的政治结论——他们认为妇女权利是对阶级斗争的一种干扰，并且可以仅通过进一步的社会发展就可以实现。然而，倘若马克思主义者在推进激进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同时，缺乏一套通过将工人阶级与被压迫群众联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争取妇女解放的纲领，那么，男女对立就将长期存在。正因如此，当下的妇女运动才会被亲西方的自由派女权主义者所主导。毛派所忽视的是：必须将妇女解放的斗争与更广泛的国家发展相结合——这意味着必须反对中共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妥协路线。

对许多毛派而言，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妇女运动应如何与阶级斗争结合推进。然而，文化大革命恰恰证明：制约中国发展与妇女解放的根本障碍，正是工人国家的国际孤立状态，以及中共对国际革命可

Shen/Bloomberg

深圳：腾讯总部。中共推动了资本家阶级的发展。

能性的全面扼杀。在“大跃进”惨败后被排挤出中共统治核心的毛泽东，试图通过号召对“新中国”僵化社会等级制度感到不满的青年群体中反官僚的左翼情绪，重新夺回自己的权力。毛泽东没有选择将中国革命的成果扩展到国际上，而是试图动员全国群众对那些被他称为“新兴资产阶级分子”的党内反对者进行一场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清洗。虽然毛泽东和党内的“右派分子”在具体策略上各有分歧，但二者的共同立场在于：都试图以维护官僚特权为方式保卫新中国。由于受到与毛泽东结盟的限制，红卫兵只能通过对“走资派”进行道德主义式的清洗来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体制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即工人国家的国际孤立。他们对毛泽东的效忠所固有的局限性，最终把红卫兵引向了越来越歇斯底里的道路：最终不仅背离广大工人群众，还将全国撕裂为党内各派系的争斗场，而不是促成工人与学生的联合，并向官僚体制发起政治斗争。文化大革命的唯心主义策略与当今女权主义者如出一辙：二者皆热衷于清算那些他们认为有“反动思想”的人，而不是提出一个能够围绕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把他们团结起来的政治纲领。其结果，便是它们都在事实上加深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

尽管如此，毛确实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群众运动，而这场运动之所以爆发，正是源于“一国社会主义”政策本身的弊端。但当毛认为自己的权力已重新巩固之后，他便调动解放军对这场群众运动进行了血腥镇压。这是因为，无论是毛本人提出的封闭经济模式，还是党内与他对立的其他官僚派系，都建立在维护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基本立场之上。这一点在数年后表现得淋漓尽致——毛泽东在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战争尚未结束之际，竟主动寻求与尼克松和美帝国主义结盟，以对抗苏联。

对于许多妇女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化事件。她们与男红卫兵们并肩作战，一起“破四旧”，誓要荡除一切革命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同时红卫兵和大众媒体不断强调，妇女要投身于政治和军事工作。然而，毛及中共所奉行的斯大林主义纲领，却始终将家庭视为维系社会凝聚力与服从意识的核心工具。即便集体化财产为妇女融入社会生活提供了基础，官僚集团也只能通过依靠压制工人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女性的政治发展来维持权力。

前进的方向

如果不正面挑战压迫中国、使其在全球舞台上长期孤立的帝国主义体系，加剧中共在社会中维持的所有矛盾，就无从谈起妇女的彻底解放；而如果不把妇女解放的事业作为自身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人阶级也不可能从中共手中真正夺取政治权力。

妇女运动必须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争取**全民免费医疗、免费儿童托育服务和老年人的充足退休福利**。这不仅能够将照护的重担从妇女肩上卸下，也将为整个工人阶级与广大农民提供更高水平的生活条件。当妇女正深陷于家庭重负之中时，高失业率也在摧毁数百万年轻人的未来。在争取扩大社会服务体系的斗争中，妇女运动完全可以将失业人群动员起来，争取他们在社会化照护、新工人教育、公共设施建设等领域中的就业权利。

无署名

2012年情人节：遭受迫害的“女权五姐妹”中的三人在抗议家庭暴力。

一个强大的中国妇女运动还将号召国际妇女，特别是亚洲和第三世界的妇女，为工人阶级对其压迫的革命性回应而奋斗。革命者不应效仿中共那种以牺牲工人阶级为代价、同全球南方国家的民族精英结盟的做法，而应当争取以一种能够壮大工人阶级的方式，将中国的生产能力扩展至第三世界。例如，通过**在全面实现工会化的条件下建立工厂，并将女性纳入有组织的劳动力队伍**。这将为女权主义者那套亲西方的策略提供一个具体的替代方案——后者不仅割裂了工人阶级，还无法将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的斗争联系起来。

中共的民族主义战略，本质上意味着扼杀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动性、强化家庭结构，以迎合与世界帝国主义之间那种虚幻的“和平共处”。只有与中共抗衡，中国的妇女运动才能在工人阶级中找到真正坚定的盟友。**向国际反帝妇女运动进军！** ■

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民族压迫：

托洛茨基主义的应对之道

为独立的社会主义新疆而斗争！
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中国！

作者：Ray Bishop

2014年5月，乌鲁木齐：武警出动，对维吾尔人进行“零容忍”镇压。习近平（插图）出席2017年中共十九大，受到热烈欢迎。与此同时，中共政权在新疆实施大规模拘禁。

Ng Han Guan/AP (插图), Zhang Hao/China Photo

不久前，美国及其盟友掀起舆论攻势，指责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对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的大规模拘禁构成种族灭绝。作为回应，习近平政权为镇压行动辩护，称此举是为了国家统一与防范“极端分裂势力”的必要手段，而在这场行动中，仅仅因为留长胡子或过于虔诚地祷告就可能招致当局的打压。

自那以来，帝国主义者对新疆的关注有所降温，转而将反华重心放在军事建设和由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上。与此同时，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宣布他们已经取得“反分裂”斗争的胜利。曾被称为“再教育”和“职业培训”中心的拘禁营已被关闭。新疆表面上似乎恢复了平静，政府甚至开始鼓励游客前往这片地区。中共宣称，1949年革命所诞生的工农中国如今安然无恙，通往“共同富裕”的道路已然铺开。

这场“中国梦”不过是彻头彻尾的幻想。中共在新疆采取的措施，是对其早先在西藏政策的延续和扩大，是其强制汉化纲领整体的一部分。这套纲领不仅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构成严重威胁，也危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从拘留营到学校——在这些学校中，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正被清除——中共高层在那些永远不会接受压迫的民族当中制造出一座由怨恨和仇恨堆积而成的火药桶。而这，正是帝国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礼物”：他们利用维吾尔和藏族解放的诉求，借此转化为削弱乃至摧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左翼在中共划定的界线两边各自站

A.A. Levitsky

Timur Kocaoğlu

左图：列宁，1921年11月。右图：三个月前，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召开，革命斗争在中亚地区蔓延。横幅颂扬共产国际与布哈拉共产党，庆祝其民族家园的建立。

队。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和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虽谴责了新疆的镇压，却把反革命的“民主”当作出路。另一些组织，如美国的工人世界党(WWP)、争取社会主义和解放党（PSL），以及总部在英国的“社会主义中国之友”（“Friends of Socialist China”），则歌颂北京的斯大林主义者打败了“恐怖主义”的威胁。双方立场均未能提出一条能够保卫中国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抵御帝国主义与反革命的出路。

中共将其沙文主义政策包装为对抗帝国主义、维护国内稳定与国家统一的必要手段。然而其效果恰恰相反：中共在汉族与少数民族工农之间筑起敌对之墙，分裂了那些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斗争以反对帝国主义与反革命的人民。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在汉族工人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建立反帝团结，与他们一起为赶走中共寄生虫并以自己的名义夺取政权而斗争。

本文的目的，是着手提出一套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纲领，其中就包括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新疆。我们并非在开辟什么新道路。事实上，我们正在回到列宁时代共产国际（包括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铺就，并由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延续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回到的出发点。

从列宁的国际主义到斯大林的沙文主义

即便是最反共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在沙皇统治下这个“诸民族的监狱”中高举民族自决的旗帜，是1917年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之一。但他们很少提及的是，这一斗争的延续体现在后来确立苏联的宪法中。这部宪法写于1923年，并于次年1月正式通过，其中各加盟共和国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被奉为圭臬，并将这一权利视为世界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加以运用。宪法中明确指出：

> “每一共和国均有自由退出联盟之权；一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不论是现有的，或将来要产生的，均可加入联盟；新的联盟国家将是在1917年10月间即已确立的关于各族人民和平共处与友爱合作的各项原则的宝贵结晶；它将是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可靠堡垒，而作为全世界劳动者结合为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的一步。”

1922年末，列宁曾就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遭受斯大林及其党内领导同伙恶劣打压一事，展开了激烈斗争。正是在这场斗争的推动下，列宁坚持要求在苏联保障加盟共和国的分离权。与此同时，新宪法也确立了高度的中央集权，特别是为了满足苏维埃经济发展的需要。由此，这部宪法体现出一种内在矛盾：一方面是集中制的需要，另一方面是非俄罗斯民族实现自身民族发展的诉求。

对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而言，苏维埃民主与革命国际主义提供了以进步的方式解决这一矛盾所引发的争端的手段。然而，从1923年末，斯大林领导下的党内官僚集团开始篡夺政治权力后，迅速将这两项原则一并埋葬。托洛茨基在他对工人国家堕落所作的分析——《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中，揭示了这对少数民族意味着什么。他指出，尽管“文化自治和经济集中这两种倾向，自然有时会发生冲突”，但这种矛盾“决不是不可调和的”。托洛茨基接着写道：

> “虽然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现成公式来解决问题，但是还可以依靠有利害关系的群众自己有弹性的意志来解决。只有群众自己实际参加有关他们命运的管理工作，才能在每一新的阶段上，在经济集中的正当要求与民族文化的活的吸引力之间，划出必要的分界线。困难在于：苏联各民族区域的人民的意志，现在完全被官僚层的意志代替了，而官僚层处理经济和文化问题，都是从行政的方便和统治层的特殊利益的观点出发的。”

托洛茨基承认，“苏联官僚还继续做着一部分进步的工作，虽然间接成本的耗费很不少”在像中亚这样相对落后的地区，这种情况尤为明显。苏维埃政权的扩

“乌克兰正被波拿巴主义的反动扼杀，而正是这种反动在扼杀整个苏联，并破坏其国防能力……

乌克兰民族革命运动是那一强大革命浪潮的一部分，而这一浪潮，现在正在洋洋得意的反动派的皮囊底下进行着分子式的准备。正因此，我们高呼：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万岁！”

——列夫·托洛茨基《民主主义农奴主与乌克兰独立》1939年8月5日

AP

“要有效介入西藏与新疆的民族不满诉求，迫切需要托洛茨基的纲领性方法，将这些怨怒从反动派的影响中引导出来，汇入无产阶级对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强大反抗洪流之中。必须高举民族自决权的旗帜，把它作为发动政治革命的杠杆，以保卫并扩展1949年革命的成果。”

——《捍卫不断革命论——反帝斗争需要共产主义领导！》，《斯巴达克派》英文版第68期，2023年9月

展促使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等民族的民族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在其著作《维吾尔民族：俄中边境的改革与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2016年）中记录了生活在该地区的维吾尔人如何首次形成民族意识，并有不少人在这一过程中加入共产党。这一发展也加强了苏联境内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与他们的新疆同胞之间的联系。

然而，核心问题始终未能解决。要最终克服民族分裂，实现各民族自愿融合，唯一根本性的先决条件就是消除物质匮乏。而这需要推翻全球资本主义统治，建设一个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但无论是昔日的苏联，还是当今的中国，统治的官僚集团所寻求的并非推翻帝国主义，而是与之妥协——因为真的推翻帝国主义后，将危及他们自身的特权地位。正因如此，这些政权在管理稀缺资源的过程中往往偏袒社会中的主导民族，而把最好的资源留给自己及其家族。

在斯大林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苏联宪法所保证的民族自决权形同虚设。再加上其他社会不满情绪，官僚集团所体现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一步激起了民族间的怨恨，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地区。而在冷战期间，这些怨恨被帝国主义势力所利用。与此同时，到1980年代末，不少顽固的俄罗斯斯大林主义者开始与赤裸裸的法西斯分子结盟，形成所谓的“红褐联盟”。

要击败各方的民族主义者，就必须有一支革命先锋队，能够赢得被压迫民族少数群体的领导权，将他们与苏联工人群众联合起来，共同为夺取政治权力而战，并展开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斗争。国际共产主义同盟（ICL）在2023年第八次国际代表大会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我们重申了托洛茨基关于建立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的号召——他在二战前夕提出这一口号，旨在争取对苏联政治革命的支持，同时推动在拥有乌克兰少数民族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ICL在大会上通过的一份文件中，将这一理论框架应用于当今中国，它指出：

这份文件是对我们这一派长期以来对不断革命论所产生的歪曲的一次纠正。同样地，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中国，也是对我们过去一些文章的纠正，比如《新疆的族群暴力》（《工人先锋报》第941期，2009年8月28日）以及《“自由西藏”：中国反革命的战斗口号》（《工人先锋报》第695期，1998年8月28日）。这两篇文章都否认了一点：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斗争是中国政治革命纲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维吾尔民族：事实与虚构

中国与前苏联不同，其人口中超过90%是汉族，而在苏联，俄罗斯人甚至不足总人口的一半。此外，中国在革命前并不是一个衰弱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被英、美、日等列强瓜分与奴役的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统一与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任务，是推动中国历次革命的重要动力，这一任务直到1949年资本主义统治被推翻后才得以完成。尽管如此，有一条关键的历史教训同样适用于中国，就像它适用于苏联一样：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那这面旗帜就会落入帝国主义者与反动派之手。

要为新疆制定一套马克思主义纲领，首先必须以唯物主义的方法理解维吾尔问题。2019年7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名为《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的白皮书，为其镇压政策辩护。该文件宣称，“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并声称“维吾尔族是经过长期迁徙融合形成的，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这完全是虚假宣传。

维吾尔族作为一个民族，受中原王朝统治的时间还不到其存在时间的一半。他们的文化根植于历史上被称为突厥斯坦的地区，这个地区曾在汉、唐、元（蒙古）、清（满洲）王朝的疆域极盛时期被纳入它们统治版图，但这些统治之间间隔极长。即便在名义统治时期，中原王朝对该地区的实际掌控也极为有限。自唐朝在公元八世纪失去对该地的控制后，“近一千年内，来自中国本部的政权再未直接统治新疆”（詹姆斯·米尔沃德（James Millward），《欧亚十字路口：新疆的历史》，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7年）。清朝赋予该地区的名称——“新疆”，意为“新边疆”——本身就说明了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有多么“非中华”。

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腐朽的清朝统治以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便一再宣称：中国的统一以及抵抗帝国主义的能力，取决于少数民族是否服从由“更先进”的汉族主导的单一国家。这一观点在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中也被继承了下来，虽有些许变体，其核心逻辑并无二

RGASPI

Dictionary of Mongolian History

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左图）因支持蒙古独立而激怒了孙中山，蒙古独立是苏联与蒙古军队在1921年胜利后实现的（右图）。

致。支撑这种观点的是一套虚构的神话：所谓汉、满、蒙、藏、回（最初用以泛指所有穆斯林）这五个民族，共享着数千年的历史，并最终注定融合为一个民族。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拒绝接受对清朝所划定疆域的任何重新划分。他虽然支持给予少数民族自治权，但当蒙古人（与藏人一样）在1912年借满清垮台之机宣布独立时，孙中山立即发出武装讨伐的号召，镇压所谓“叛乱”。不久之后，他便将中华民族主义纲领进一步强化为一种强制同化的政策。

中共是如何沦为汉族沙文主义者的

正是十月革命教会了中国革命者：被压迫少数群体的自由并不与中国自身的解放相对立。相反，这些斗争必须作为世界反帝革命的一部分加以联合。这一理念曾深刻影响了由陈独秀领导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在1922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呼吁：“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引自《中共历史文献选编》，哈佛大学出版社，1966年）。宣言还指出，这些以及其他民主诉求“是对于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有利益的，是解放他们脱出现下压迫的必要条件”。

1921年，苏联红军为追击流窜至蒙古的反革命白匪军进入蒙古，中国共产党由此首次面临民族问题的严峻考验。红军与蒙古民族主义者组织——蒙古人民党结成联盟，击溃白军，最终促成了蒙古的民族独立。中国共产党坚定支持苏联的干预行动，并支持蒙古脱离中国统治，这与孙中山坚决反对蒙古独立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后来，国民党指责中共“叛国”，理由正是其支持蒙古独立。

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自决的主张，直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的背景，是1927年第二次中国革命惨遭蒋介石军队镇压之后。而酿成这场悲剧的原因，正是共产党被解散并入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在这场历史性失败之后，中共转变为一支以农民为基础的游击队，并在一小块江西建立了名为“江西苏维埃”的根据地。但到了1935年，形势再次发生根本变化：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国际转向“人民阵线”政策，要求各国共产党寻求与那些被认为“进步”、且所谓对苏联友好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联盟。在中国，中共便听命于这一路线，积极寻求与蒋介石的合作，以抵抗日本对中国的占领。

共产党确实有必要建立抗日反侵略统一战线，并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从国民党手中争取领导权。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政策，恰恰否认了真正的反帝统一战线。为了争取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中共对“爱国的”地主实行豁免征收土地的政策，背叛了其农民阶级基础。同时，党也抛弃了此前对民族自决权的主张，认为那已成为自身发展的“包袱”。

尽管表面上偶尔仍提及民族自治的口号，中共此时已与国民党民族主义者共同反对任何民族的分离倾向。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中对此表述得极为明确，文件提出的纲领性要求之一是：“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正如学者詹姆斯·雷博德（James Leibold）在其著作《重构中国民族主义：清朝边疆及其原住民如何成为中国人》（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2007年）中指出的那样：对毛泽东、孙中山与蒋介石而言，“民族自决的原则只适用于那些被视为进化较好、历史上具有活力的汉族主体。”

新疆的革命与压迫

然而，蒋介石对抗日的兴趣远远不及他打击共产党的热情。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之后，中国内战随即重燃，其结果便是国民党的彻底溃败，被迫逃往台湾。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掌权后，依然坚持其沙文主义立场，在仅仅致力于本国“社会主义”的框架下，建立起一个斯大林式的官僚统治。

下面这个轶事便一语道破其中要害。该故事记载于阿迪布·哈立德（Adeeb Khalid）所著的《中亚：从帝国征服到当代的新历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1

年）。背景是一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举行的会议，参与者为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特使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哈立德引述自米高扬本人的备忘录，写道：

> "米高扬建议中共不应'在民族问题上过度热衷，允许少数民族独立，因而缩减中国领土'。他是在传达斯大林的优先顺序，更广泛的政治目标先于解决'民族问题'。毛泽东不需要有人提醒他这一点。'毛泽东很高兴听到这个建议，'米高扬指出，'但你可以从他的表情看出来，他原本就没有打算让任何人独立。'"

在人民解放军进驻北京不到一年后，中共便控制了新疆和西藏。这为深刻的社会革命变革奠定了基础，但这一切都被限定在斯大林主义民族主义的框架之内。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藏人及其他民族的确获得了巨大的社会进步——从扫盲与基础医疗到土地革命。中共也鼓励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出版和教育，其中许多语言是首次被书写记录下来。然而，这一切成就都由中央政府指定的党委书记所监管，他们镇压一切来自群众的独立意志表达。

与此同时，新政权推动大规模汉族人口迁入新疆，以削弱少数民族的主导地位。这一人口转移主要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完成——这是一支直属中央政府的准军事组织。最初由复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组成，该兵团的产值占新疆地区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如今其成员构成仍以汉族为绝对多数。

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少数民族的从属地位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它规定，内蒙古、西藏和新疆是自治区，而非像苏联那样设立的联邦加盟共和国。宪法虽然禁止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并宣称他们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保留风俗习惯，但也明文写道："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作为其汉族沙文主义的掩饰手段，中国政府将全国人口划分为56个"民族"。斯大林主义者把能找到（或凭空造出）的所有少数群体都与汉族"并列"在一起，乍看之下似乎颇具包容精神。但实际上，这正是为了反对民族自决权所设的意识形态障碍。"民族"这一标签，被一律贴在各类群体身上——既有数千年来就处于中国统治之下的山地族群，也有新疆、内蒙古和西藏等地那些拥有独立文化与社会政治制度、具备民族自决基础的人民。可一旦被归入"民族"这个范畴，他们所获得的"权利"，就只剩一条：在通往汉族主导的中华民族这一同化道路上继续进军。

中国共产党诉诸于群众深层的敏感情绪，宣称任何形式的分裂主义都会推翻1949年革命所取得的国家统一这一历史性成果，并为帝国主义敌人打开大门。但真正分裂群众、削弱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斗争能力、并不断威胁国家统一的，恰恰是斯大林主义的纲领。而这，正是在新疆上演的现实。

危机的引线在被点燃

自1949年以来，所谓的民族自治被证明始终是一纸空文，而官僚的铁拳却真实存在。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派干部将对少数民族的汉化政策包装为扫除"封建主义"障碍的革命举措。这场运动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遭受了难以估量的倒退。

文革平息、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有所放松，目的是诱使他们拥抱市场改革，但这不过是北京式波拿巴主义统治下的一个阶段。深层的矛盾始终存在，并随时可能在下一轮历史动荡中被引爆。

这一时刻到来于苏联的解体。中共领导层认定，只要牢牢掌控群众的政治生活，并在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通过提高生活水平来安抚大众，就能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中国的确经历了爆炸式的经济增长。但这场发展同样加剧了诸多社会问题。在新疆，经济成就并未解决当地原住民族群与汉族居民之间的隔离状态，也未改变南疆地区——主要是穆斯林人口居住地——根深蒂固的贫困。同时，伴随着沿海地区的繁荣，来自贫困地区的流动工人被拒绝发放户口，也无法享受随之而来的社会福利。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早在1980年代，北京就曾通过支持阿富汗圣战者反对苏联军队，为帝国主义效劳。而此时，中共则加入了"全球反恐战争"，在新疆撒下了一张镇压之网，导致镇压与反击的循环不断上演。少量维吾尔人加入了中东的武装伊斯兰主义组织，而数千人为了生存逃往欧洲、土耳其和美国。其中包括富商热比娅·卡德尔，她后来成为由中情局支持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领导人。

在此期间，新疆发生了多起针对警务哨所及其他中央政权控制机构的袭击。中国当局主要将这些行动归咎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这一神秘组织，该组织据称与基地组织或塔利班存在关联。肖恩·罗伯茨（Sean Roberts）在其著作《向维族宣战：中国打击新疆穆斯林的运动》（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20年）中提供了大量证据，指出这些袭击并无统一协调。但不论真相如何，正如这类局势中一贯所见，一些袭击也无差别地针对来自统治民族的工人群众。一起重大暴力事件发生

Bettmann

1946年1月，毛泽东与蒋介石在一起。中共寻求与"民族资产阶级"结盟，反对少数民族自决，并在1949年掌权后继续推行这一路线。

Andy Wong/AP

Kyodo

你是相信中共，还是相信你亲眼所见？左图：2023年全国人大召开期间，北京会场外的少数民族代表。右图：2009年7月，乌鲁木齐，维吾尔人抗议时与警方对峙。民族压迫使汉族与少数民族群众之间产生分裂，削弱工人国家的根基。

在2014年3月，一些持刀的维吾尔人袭击了昆明的火车站，造成约30人死亡。

解放维吾尔人民的道路，不在于攻击工人国家的机构，也不在于对汉族民众实施无差别的恐怖袭击。真正的任务是将维吾尔人的正义斗争与中国工人群众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像昆明事件这样的袭击，只会让被压迫者彼此内斗，从而进一步巩固中共政权的统治基础。

事实上，"打击境内伊斯兰敌人"正成为习近平为在新疆推行大规模拘留营政策所提供的主要正当性依据。2014年，习近平上任国家主席后前往新疆，宣布将对"恐怖分子"展开"毫不留情"的镇压，由此拉开了镇压的序幕。对中共政权而言，维稳新疆是压倒一切的战略任务。尽管人口相对稀少，新疆却占中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是石油、石化和农业的重要基地。更关键的是，新疆被规划为习近平标志性政策——"一带一路"计划中的核心物流枢纽。

面对这场"反恐"运动，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反应远非顺从。更多的袭击引来了更多的反制，到2014年底，又造成了数十人死亡。2017年，中共发动了镇压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终极行动。其核心就是将超过一百万名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及其他族群集中关押于拘留营中。与此同时，数以不详的人以"极端主义"名义被捕入狱，甚至包括中共党员、著名人类学家热依拉·达吾提——她因长期研究新疆文化历史而广受尊重，如今却因所谓"分裂主义"被判处无期徒刑。

为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而斗争！

众所周知，西方的宣传机器曾大肆炒作所谓新疆"种族灭绝"。直到今天，亲中共的左翼仍将此类说法斥为帝国主义反华攻势的谎言。这不是一个文字游戏。当然，资本主义列强为了推进他们的政治图谋只会睁眼说瞎话，但大规模集中关押的确是中国政府的官方政策。中共辩护士真正否认的，是这项政策的核心目的：**消灭维吾尔族的民族认同**。

而且，受到打压的并不只有维吾尔人。正如在新疆那样，中共政权也在西藏将普通话强制推行为小学教学语言，蒙古语同样遭到打压。成千上万的儿童被强制送往偏远的寄宿学校，在那里他们听不到父母的语言。甚至连回族穆斯林也未能幸免：清真寺被关闭，或者被强迫拆除圆顶与宣礼塔，换上更加"中华化"的外观。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遍布着宣传千年民族大团结的宣传牌、横幅和展览馆，还有旅游景点让游客观赏身着漂亮民族服饰的歌舞表演。"社会主义中国之友"那群人竟然以这些场景为依据，声称中国正在如习近平所说的那样，走在繁荣与和谐的道路上。事实上，这一切不过是掩盖现实的薄纱——真正发生的，是强制同化，且步伐急迫如军令行进。

即便是中共政权中那些看似温和的政策，也在加深中国社会的分裂。比如，在高考中给予少数民族加分，这被一些人当作维吾尔人和藏人没有受到压迫的证据。但实际上，这项政策与再教育营是同一个逻辑——中共将大学视为将少数民族同化进汉族民族的工具。然而，该政策却在汉族青年中激起了巨大的怨恨。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大量大学毕业生面临失业，名校文凭几乎成了获得体面工作的唯一希望。于是，在资源日益稀缺的情况下，维吾尔人和藏人被当作教育资源紧张的替罪羊，而真正的罪魁祸首——政府官僚和投机商人——反倒被掩盖了。

斯大林主义者认为，他们在新疆的镇压换来了社会稳定的资本。但他们换来的，只是一场镜花水月。正如托洛茨基在《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1933年10月）中对斯大林政权的评价那样，它"用它自己的方法卫护着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种方法却有利于**明天**敌人的胜利。"他进一步解释说：

> "社会矛盾不是从政治上加以克服，而是从行政上进行镇压。这些矛盾在压力下集聚起来，达到在正常地解决它们的政治手段已不存在的情况下同样的程度。第一个社会冲击（外来的或是内部的），就可以把已经分解了的苏维埃社会投入内战的漩涡。"

当下中国存在诸多可能引爆这种冲击的因素。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危机、全球局势日益动荡以及美方发动的贸易战，都威胁着中共用以维稳的经济增长基础。而更严重的是，美帝国主义主导的对华军事施压也在持续加剧。

斯大林主义者的回应并非革命性的武装号召，而是进一步在国内加强“维稳”，在国际上积极拉拢贸易伙伴。这只会埋下更多危机的种子，其中也包括那些被中共高压手段暂时压制的民族怨恨。真正的革命方案，是以一个将民族少数群体的权利捍卫与中国工农群众迫切需求相结合的纲领，来动员无产阶级斗争——包括青年就业、体面且可负担的住房、优质的社会福利等基本要求。

这绝非空想。工人自己的亲身经历早已证明：针对少数民族的镇压，最终也会反噬到他们自己头上。正如疫情期间所暴露的那样，那种起初在西藏和新疆实施的全民监控，如今已覆盖整个中国社会。而这一控制手段如何反过来打击官僚体制，则体现在2022年11月席卷全国的反封控抗议浪潮中。那场抗议始于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由于严苛的封控措施，一栋居民楼起火酿成十人死亡的惨剧。乌鲁木齐的抗议者主要是汉族群众，因为维吾尔人早已在重压下不敢走上街头。但如果抗议持续下去，它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两个群体团结起来，一道反抗官僚政权。

面对中共企图抹杀维吾尔民族认同的攻势，仅仅捍卫他们的民族**自决权**——也就是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是不够的。我们提出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新疆**的诉求，作为一项过渡纲领的一部分，旨在团结各民族的劳苦大众，共同为政治革命而斗争。以下是这一纲领的若干核心内容：

- 释放热依拉·达吾提！释放所有被以“分裂主义”罪名迫害的人！
- 拆掉监控摄像头！
- 恢复各地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权利！
- 不许因宗教活动而被定罪！
- 给予农民工完整的居住权！打倒户口制度！
- 建立由民族融合的工人和居民委员会，以及由其控制的民兵组织！
- 工人掌控生产——从工厂和油田到番茄地与棉田！
- 保卫国有财产制！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不论在香港还是在中国内地！保卫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与反革命！
- 争取社会主义新疆独立！要工农委员会掌权的中国，不要中共官僚寄生虫的统治！共产主义者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保卫中国，反对中共统治！

一个革命性的新疆纲领，必须以捍卫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果为前提，反对一切旨在瓦解工人国家的独立主义势力。国际马克思主义左翼的大多数派在这一问题上彻底失败，纷纷向自由派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投降，接受“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谬论。

释放热依拉•达吾提！

人类学家、中共党员因“分裂国家”罪被判处终身监禁

Lisa Ross

（关于这一问题的完整分析，参见第56页。）

一些左翼组织，如英国的“争取工人自由联盟”（Alliance for Workers’ Liberty，常被称为“外交部社会主义者”），主张以“民主”帝国主义作为解决维吾尔人和藏人压迫的方案。然而，这一纲领的胜利并不会消除他们的压迫，反而可能导致社会灾难，破坏数十年的物质进步，引发血腥的民族冲突，并使中国被外国势力瓜分掠夺。

相对更为细致的是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和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MT，现为革命共产国际，RCI）。这两个组织在新疆镇压最严重时期发表文章，警告美国的阴谋，反对对中国的制裁，并呼吁汉族工人捍卫并与少数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中共。（参见：“中国、维吾尔人和左翼”，《国际社会主义》，2021年10月23日发布；“新疆维吾尔族：民族压迫与帝国主义伪善”，《捍卫马克思主义》，2020年10月20日。）

这些任务是必要的。然而，社会主义工人党（SWP）、革命共产国际（RCI）、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等组织却将中国定性为帝国主义国家，反对中国抵御真正帝国主义势力的行为，支持旨在推翻工人国家的“民主”运动。他们因此背叛了团结汉族和少数民族工人群众的唯一基础，即捍卫并推进1949年革命成果，以对抗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

左翼阵营的另一个极端是那些被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批判为“苏联之友”的政治继承者。他们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阴谋所采取的回应，是在社会民主党人加号的地方打上减号，反之亦然。工人世界党（Workers World Party）尤为无耻，不仅赞扬中共设立的“职业培训中心”，还断言：“新疆的政治和宗教暴力如今几乎已被消除，新疆正在稳步实现经济赶超全国的目标。”（《工人世界》，2024年1月16日）

唱着同样令人作呕的调子、只是音量稍低一些的，是争取第四国际联盟（LFI）。它唯一一份关于维吾尔问题的正式声明，着重强调“在一系列由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有关的伊斯兰势力发动的致命袭击之后，官方采取了应对措施”，并指出“就连欧盟、联合国和美国都将该组织列为恐怖组织”（“U.S. Anti-China War Provocations over Taiwan,” The Internationalist, 2022年9月）。LFI宽容地承认汉族沙文主义“在新疆确实有表现”，但随后却雷霆万钧地宣称，“‘维吾尔种族灭绝’的谎言”不过是帝国主义的战斗口号，是“煽动新疆分裂主

Reuters

Thomas Peter/Reuters

2022年11月：乌鲁木齐居民在一场火灾因防疫封控致十人丧生后走上街头抗议（左图）。抗议活动蔓延至北京（右图）和其他城市后，政权被迫结束封控。

义、破坏该地区经济”的借口。

当然，我们可以轻松地谴责LFI把头埋进新疆的沙子里装聋作哑，但这并不是它真正的罪过所在。从新冠封控到反中美军建设，LFI始终主张依靠斯大林主义者来保卫工人国家、抵御帝国主义，而不是号召无产阶级独立起来承担这些任务。这正是它为何拥护中国的封控政策、又拒绝为维吾尔人和藏人的民族自决权辩护的根本原因——它害怕任何可能动摇“在中共统治下的国家统一”的主张。

这类“中国之友”，加固了斯大林主义政权灌输的意识——即新疆一旦独立，就只会为那些渴望肢解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服务。可以合理推测，这种看法为中国工人群众广泛接受：他们虽然痛恨官僚，但认为中共官僚集团是阻挡反革命与社会混乱的唯一屏障。托洛茨基在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时，提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案：

> “‘但这难道不会削弱苏联的军事力量吗？’——‘克林姆林宫之友’们又要惊恐地大叫了。我们的回答是：苏联的削弱，是由于不断增长的离心倾向造成的，而这离心倾向又是由波拿巴主义专政造成的。一旦发生战争，人民群众对统治集团的仇恨将会导致十月革命所取得的社会方面的胜利果实的崩溃。失败主义情绪的源头在克林姆林宫里。而另一方面，一个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如果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就会成为保护苏联西南部的强大堡垒。不久，当权的波拿巴主义阶层遭到侵蚀、士气消沉、最后被打垮、被赶走得越快，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防就更坚固，也就更能保证它将来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
>
> ——《乌克兰问题》，1939年4月

UlyssePixel; Ignacio Martinez

云南省沙甸大清真寺是中共推行伊斯兰教“中国化”运动中被关闭或被迫重新设计的数百座清真寺之一。

西藏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框架

这种纲领性方针对西藏和新疆都至关重要，即便两者的历史和社会结构截然不同。和新疆的穆斯林一样，西藏人也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获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尽管在解放军进入西藏之后，中共实际上保留了封建僧侣统治（喇嘛政权）达九

（下续第54页）

美军基地滚出菲律宾!

建立反帝阵线!

把亲美的走狗赶出工人运动!

随着其霸权衰落和自由主义秩序逐渐分崩离散，美国的反应是加大了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压力，同时加强对菲律宾等国家的控制。帝国主义危机正在驱使美国发动战争，从东海到马六甲海峡集结的军事力量，是与中国血腥对抗的导火索。

菲律宾位于南海，守护着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线，中国相当多的石油供应都经过该航线。这些有争议的水域拥有丰富的渔场以及未开发的海底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从菲律宾，美国可以进入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洋——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活跃的沿海地区。

几十年来，菲律宾左翼一直支持资产阶级在南海的领土野心。资产阶级在海牙仲裁法庭针对中国的海洋主张提起诉讼，获得菲律宾共产党及全国民主阵线影响的各种势力、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工会官僚的踊跃声援。他们与资本主义势力配合，频繁在南沙群岛问题上进行歇斯底里的反中民族主义运动，为美帝国主义加强在该地区的存在提供了掩护，最终在小费迪南德·马科斯总统统治期间，通过《强化防务合作协议》(EDCA)获得了九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

根据EDCA恢复美国在菲律宾的驻军权是帝国主义霸权国在该地区发动战争驱动的一个里程碑。2月4日是美菲战争125周年。对纪念这个日子的菲律宾人民来说，EDCA是帝国主义加在菲律宾民众身上的最新负担—赤裸裸地提醒人们：菲律宾仅仅是名义上独立，它是美国的新殖民地。同样，对于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来说，此类美军基地对他们的生存构成了而明确且现实的威胁。

视觉中国

2024年3月，菲律宾马尼拉，抗议美军基地的示威。

美国获得使用菲律宾各基地的权力使该地区更接近战争边缘。对该地区和全世界的工人及被压迫群众来说，EDCA预示着可怕的苦难。在菲律宾的各基地将成为目标，随之而来的武装冲突将对中国作为主要贸易伙伴的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的经济造成严重破坏。

对于菲律宾青年来说，以美国为首的战争进军意味着通过强制性预备役军官训练营进一步管制，意味着沦为战争贩子炮灰的残酷未来。对此，我们要说：**粉碎*EDCA*！美军基地滚出去！*Imperyalismo Ibagsak*！打倒资产阶级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强制参加预备役军官训练营！不给资产阶级军队一个人、一分钱！**

粉碎EDCA需要大规模的国际无产阶级斗争，包括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斗争，以将美国匪徒赶出菲律宾和整个环西太平洋地区。阿克巴扬党、玛卡巴扬集团一类拒绝支持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的左派和工人领袖，是站在我们剥削者的阵营中，他们永远不会赢得中国工农的支持。与此同时，坚持"一国社会主义论"纲领的执政中国共产党只醉心于在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和平崛起"，并且将菲律宾和其他地方的社会革命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威胁。中国是资本主义曾经被推翻的现存最大的国家，一个反帝国主义联盟将激励亿万中国无产阶级扫除寄生官僚机构，夺取该国的领导权。

激进的工人和青年对阿克巴扬、玛卡巴扬、团结一心劳工联盟和菲律宾工会大会的领导越来越失望，后者没有提出任何解决方案来对抗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帝国主义者强加的新举措，例如公共服务法、公用事业车辆现代化计划以及宪章修改。相反，这些劳工官僚和自称的左派领导人鼓吹：在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中，菲

律宾资产阶级可以成为工人和被压迫者的朋友和盟友。

反帝国主义的工人和激进青年们：要警惕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这类资产阶级政客，他们伪装成被压迫者的朋友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对者！达沃市的杜特尔特们和他们的北方同行，伊罗戈区的参议员伊梅·马科斯和卡加延省的曼巴家族，将会最先放弃和背叛我们反对EDCA的斗争。这是因为，作为新殖民主义有产阶级的成员，他们的本性是把自身的商业利益和狭隘的家族利益置于被压迫民族之上。任何工人和贫苦群众的激进动员，只要资产阶级无法加以控制，就必然被视为对菲律宾社会“和平与稳定”的威胁——而这种“和平与稳定”，正是建立在人民苦难与种植园及出口加工区工人被极度剥削的基础之上的。

在左翼和工人运动内部，高举反对亲帝分子的革命国际主义旗帜，将成为团结工人以及城乡贫苦群众中反帝力量的号召点。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农民解放并使国家摆脱外国军事基地，我们斗争的领导者必须不受可恶的菲律宾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的束缚。

对于激进的工人和反帝学生，我们明确地说：今天的重要任务是建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能够推动我们的民族解放斗争走向社会主义革命。这第一步意味着我们必须内部清理：**从左派和工人运动中把改良主义调停者和亲美走狗——比如桑尼·马图拉(*FFW*)、约书亚·马塔(*SENTRO*)、迈克·*C*·门多萨(*TUCP*)、埃尔默·拉博格(*KMU*)和拉乌尔·曼努埃尔(*Kabataan*)——赶出去！**

菲律宾和中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与中国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士兵结成反帝国主义结盟，符合菲律宾被压迫群众、菲律宾群岛劳苦大众的利益。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建立这一战斗同盟所面临的障碍。第一，帝国主义利用了由于北京斯大林主义政权在南海推行的海洋政策而激起的反华情绪。中国当局在南海骚扰邻国渔民，而这些渔民世世代代在这一传统渔场和避风港中生存。第二，中国对深受民众厌恶的资产阶级派别（如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威权政权）的支持，并未使北京在劳动人民中赢得任何好感。

对中国人民和菲律宾群众来说，结成这个反帝国主义联盟，意味着拒绝北京斯大林主义者和菲律宾左翼分子（例如革命工人党和群众斗争党）兜售的“和平区”、“互不干涉”以及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主张。这些都不能推进我们反帝和反战的斗争。我们需要的是革命性的国际主义纲领。至少包括：

- **拆除反钓鱼屏障！共享水域！**
- **共同保卫南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
- **菲律宾渔民们，将此传单交给中国解放军海军/海上民兵！**

如果您同意本传单中的革命反帝立场并愿意讨论如何实现这些立场，请写信至：

——菲律宾斯巴达克集团(SGPil)
海外通讯委员会
spartacist@spartacist.org

自由主义之死…

(上接第25页)

控制的洪流。引导民众对精英阶层深恶痛绝是一回事，解决这种愤怒的根源又是另一回事。特朗普及其国际同伙别无选择，只能压制和压榨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最终，群众将转而反对他们。而这股力量将被引向何方？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

30多年前，共产主义被宣告死亡，自由民主对苏联的胜利被预言为“历史的终结”。今天，每个人都知道历史并没有终结。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或感觉到自由民主主义已经彻底破产。至于共产主义，它并没有死，但也不能算是活的。四分五裂、僵化且与工人阶级隔绝的共产主义者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新一轮反动时期的到来，我们的任务是弥补失去的时间，让工人阶级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好准备。

如果左翼革命力量继续徒劳地紧抓自由主义者的衣角不放，它们将继续疏远工人阶级，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因素。未来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左翼等待自由主义者领导“抵抗运动”。同样危险的是一些人脱离群众，以抽象的革命口号寻求庇护的冲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两种趋势一直占主导地位。两者都必须被抛弃。马克思主义者要想成为有生命力的因素，唯一的办法是从过去30年的失败中吸取适当的教训，并为工人阶级提供一条前进的道路，彻底与自由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决裂。

在近期，毫无疑问，防御性的斗争将是当务之急。当自由主义者抛弃他们声称拥护的被压迫群体——黑人、穆斯林、跨性别者、移民、妇女——时，共产主义者必须取而代之成为他们斗争的先锋。但同时他们必须寻求将这些运动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远离自由主义者的道德主义和情感主义，并与所有劳动者的物质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归根结底，工人阶级才是决定性因素。为了赢得工人的支持，共产主义者必须在阶级斗争中证明，他们与那些领导工人的叛徒不同，他们制定的纲领能够切实促进工人阶级的利益，并最终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和“革命共产国际”的小册子，其中论述中国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

中国的阶级性质...

(上接第56页)

主义及其盟友。而且他们使用的论据拒绝了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机器以及帝国主义的基本原则。首先，我们将解释为什么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然后，我们将论证尽管资本主义在中国严重渗透，但中国仍保留着畸形工人国家的基本特征。贯穿始终的基本论点是：推进工人阶级的利益必须从反对美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开始。这不仅要求捍卫1949年中国革命的剩余成果，还需要为反对中共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的政治革命而斗争。这是因为中共的战略和政策正在将中国引向灾难。

第一部分：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

1）马克思主义与经验主义

“帝国主义”一词被各种人在各种场合抛来抛去。如果想客观地评价“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说法就必须抛弃自由主义的狗哨，而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困难并不在于如何定义帝国主义。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列宁的观点，即帝国主义是：

> “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
>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

相反，是在定义当今哪些国家是帝国主义国家时，却出现了争议。一些人将中国、巴西甚至希腊与美国相提并论，而另一些人则否认日本和德国是列强。

这种广泛的意见分歧既是方法论问题，也是纲领问题。至关重要的是，帝国主义问题不能从道德或抽象的理念出发而要从具体的历史发展看待。这就意味着需要用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这个问题。例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着眼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作为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从之前封建体制的阶级斗争中诞生的。帝国主义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作为上世纪阶级斗争中演变而来的一个活生生的体系，单个国家的地位只是整体的一部分。

而当今左派并**没有**采用这种方法。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的一篇文章《中国是帝国主义吗？》（chinaworker.info，2022年1月14日）就是他们如何思考这问题的一个庸俗而又有代表性的例子。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文章探讨了中国是否符合列宁定义中的各个要点。它有很多垄断企业吗？它输出金融资本吗？是否拥有庞大的军队？一旦这一清单上的每一个方框都被勾上，中国就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国家。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经验主义。ISA并不着眼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发展，而是通过将经验性的证据（军队规模、资本输出数量等）与抽象规范（列宁的定义）进行比较来判断中国的国家性质。将这种方法类比到生物学中，就好比只看物理特征而忽略物种的进化来对物种进行分类。而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它几乎完全是主观的，无法客观地决定哪一组特征在确定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这种方法可以选择任一组事实来“证明”某个国家是帝国主义国家，而不同的选择则可以证明相反的结论。

如果要打破这种关于谁是帝国主义俱乐部成员的吹毛求疵的争论，就必须从帝国主义在历史上是如何具体演变的角度来看待整个问题。而要判断中国在这一体系中的具体位置，就必须将中国自身的演变置于整个世界体系的演变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答案。

2）美帝的世界秩序与中国

任何对当代帝国主义体系的分析都必须以1945年为起点。在人类最惨烈的相互屠杀中，美国崛起成为主导的帝国主义强国。当前世界秩序的主要支柱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建立起来的。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和欧洲煤钢共同体（欧盟的前身）都是为了对抗苏联而创建的，并为美国带来了极大的特权。其他资本主义强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别无选择，只能跟随美国。旧殖民帝国迅速不再在世界政治中发挥独立作用，其地位和特权反而取决于与美国的关系。

至于中国，百年的帝国主义掠夺已使其沦为半殖民地，其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得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只是反映了其作为美国抗日盟友的地位。然而，1949年毛泽东的

Hirarchivum Press/Alamy; 台北时报

毛泽东的农民军在内战中击败了中国资产阶级，迫使其溃逃台湾。

农民军打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导致中国资产阶级逃往台湾，中国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并建立了工人国家，从而彻底改变了这种关系。中国革命是对美国来说是一次耻辱性的打击，并直接导致了冷战升级。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避免出现“另一个中国”，美国发动了麦卡锡式的猎巫行动，并对朝鲜半岛以及后来的越南进行了军事干预。在此期间，中美两国处于世界秩序的两极对立面，世界秩序由共产主义斗争、殖民斗争和苏联问题决定。

1972年，尼克松和毛泽东签订了反苏条约让局势再次发生了急剧变化。由于美国正在越南战败，它试图利用中苏之间出现的冲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邓小平接替毛泽东走上“改革开放”经济自由化道路后，中美关系又进一步改善。尽管如此，双边关系仍具有非常特殊的性质。两国共同致力于削弱苏联，但两国的社会制度仍然存在根本对立。

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世界局势的戏剧性转折，也预示着中西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强国。美帝的主导地位和中国市场的开放为外国投资和贸易的大规模扩张（即全球化）创造了条件。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而它的廉价劳动力、国家规划和中共保证的稳定劳资环境则可为外国公司保驾护航。

从美帝的角度来看，中国市场自由化代表着巨大的机遇。此外，由于自由民主已经“赢得了冷战”，中国共产主义不再被视为威胁，而仅仅被视为一种过时的东西，只需要通过与西方的经济融合就能克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不仅仅是同意进口更多我们的产品，而是同意进口民主最珍视的价值观之一：自由市场。……当个人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梦想时，他们就会要求更大的发言权”（2000年3月9日）。

在中共眼中，新时代充满了危险。苏联的解体就是一个警示。它提醒着一旦党放松对国家的政治控制，将会发生什么。与此同时，1989年的天安门起义表明群众也躁动不安，要求改善生活状况。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运动打破了僵局。这场运动旨在让全党坚定地支持他的市场化进程，他认为充分的经济增长将抑制政治不满情绪，巩固政权。

事实证明这是成功的。与美帝的期望相反，中国经济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并没有导致中共的垮台或国家垄断企业的解体。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00年代初，中共和外国资本家的利益趋于一致，缓解了政权面临的整体压力，通过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与自由化的资本流动和贸易扩张相结合，并使中国经济得以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理解这一动态至关重要。中国经济的爆炸性增长是通过**融入**美帝国主义经济体系实现的，而**不是**与之对立。与所有斯大林主义政权一样，中国的外交政策始终以实现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为目标。事实上，时至

Reuters

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

今日，中国仍未挑战美帝霸权的任何基本支柱。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并且仍然以美元为主进行贸易和投资。至关重要的是，中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取代美帝国主义成为“世界警察”。

3）美国霸权的衰落

当今世界局势的核心矛盾是，美国霸权体系为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大幅增长创造了条件，但这反过来也削弱了美国的地位。美国统治阶级深知这正在日益削弱其自由民主世界体系的主要支柱。这一转变的象征是唐纳德·特朗普，他在2015年首次竞选总统时曾表示：

> “现在，想想这个： 我们欠中国1.3万亿美元。我们欠日本的比这还多。所以他们进来，抢走我们的工作，拿走我们的钱，然后把钱借给我们。我们付给他们利息，然后美元升值，这样他们对我们的贸易就更有利了。
>
> “我们的领导人有多么愚蠢？这些政客有多么愚蠢，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他们有多么愚蠢？”

华盛顿威胁要对调查以色列的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考虑消减联合国资金，有时甚至公开谴责北约和欧盟，这一系列行为象征着自由主义秩序正在成为美帝自身的障碍。而中共仍然认为全球化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力量，中国可以在美国制定的规则内继续发展。我们现在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怪异的局面：中国鼓吹自由贸易和国际法，而美国和欧盟却鼓吹贸易保护主义，无视自己制定的国际规则。

总体而言，当前时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帝国主义相互竞争的典型时期大不相同。当时，法国、英国和沙俄等老牌帝国面临着新兴帝国主义列强（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威胁，而这些新列强都在积极扩张自己的殖民帝国。20世纪初，帝国主义体系**四分五裂**，不稳定因素来自于新生但已建立的**帝国**的扩张欲望。

自1945年以来，帝国主义体系实现了**统一**。如今，由于各种**地区性大国**的出现，以美国为主导的高度一体化的帝国主义卡特尔正在日益瓦解。这些国家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围困，但现在却开始要求西方尊重它们的地区和国内利益。鉴于世界体系的稳定有赖于美国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这些相对温和的野心代表着一种生存性的威胁，也是当前时代动荡的根源。

把中国的发展置于后苏联时期的帝国主义体系中，显然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如果中国要走向帝国主义强国，就至少必须与美国的经济秩序决裂。事实上我们看到，尽管中国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苏联，但它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却十分低调，多以维持现状为主。但即使我们看俄罗斯。俄罗斯采取了更加对抗性的战略，可是它并不是在积极扩张，而是对美国在其周边和盟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叙利亚）的图谋做出反应。俄罗斯是有挑战美帝国主义，但并没有争夺世界领导权。世界政治的底色是零和博弈，如果1945年以来统治世界的帝国主义联盟没有遭到重大挫败或解体，就不可能出现新的帝国主义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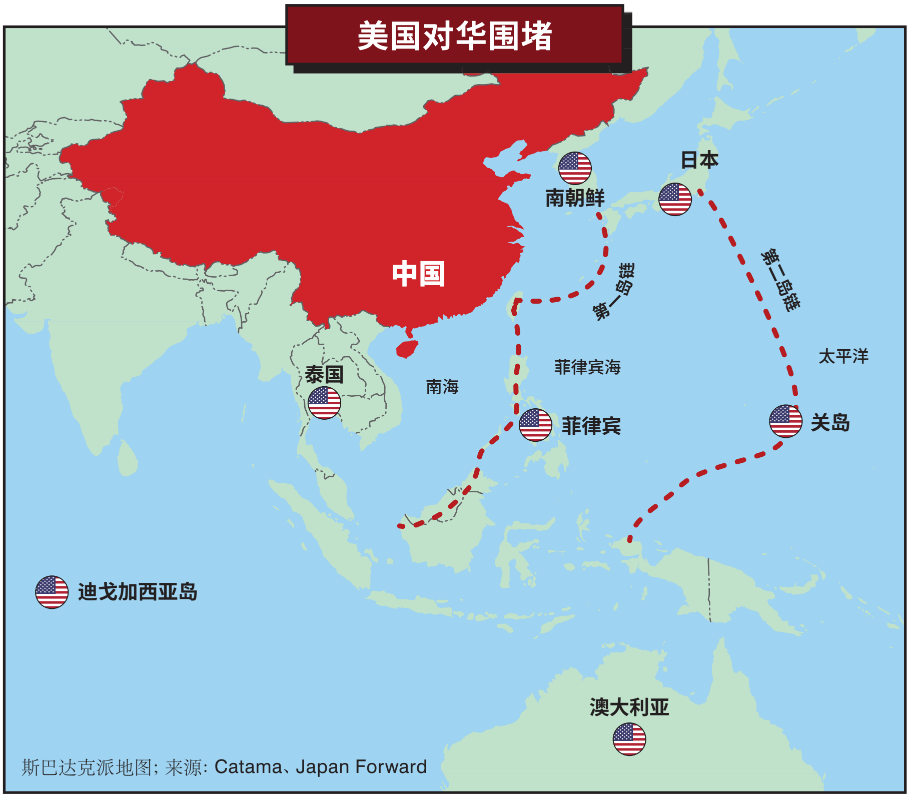
4）和平的帝国主义？

那些主张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所犯的第一个错误是，他们主张一个新的世界性帝国主义强国可以通过完全和平的方式出现。无论是古代的罗马帝国，还是列宁所描述的现代帝国主义体系，帝国主义都需要军事强权。军国主义是经济关系的产物，但这绝不意味着军国主义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特征。剥削只能通过武力来施行。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美国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军事力量的决定性作用。美国无可争议的实力为高度统一的世界经济创造了条件，使世界经济从表面上看似乎主要通过和平手段运转。来自沙特阿拉伯、德国或印度的亿万富翁可以将资金投向海外，而不必担心他们的财产会被没收或贷款会被取消。这是因为美军充当了整个现代帝国主义体系的执行者。美国通过

全球范围内部分美军基地分布图（2021年）

资料来源：《Drawdown: Improving U.S. and Global Security Through Military Base Closures Abroad》，
作者：David Vine、Patterson Deppen和Leah Bolger，发表于2021年9月20日，QI Briefs #16。



斯巴达克派地图；来源：Catama、Japan Forward

美元和对世界金融资本各主要中心和机构的控制，攫取了大量的剩余价值份额，以换取保护全世界资本家私有财产权的服务。

至关重要的是要了解，时至今日，世界经济的稳定仍然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力量。它在80个国家拥有至少750个军事基地；美国及其盟国控制着所有重要的海上咽喉要道：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中国的海上力量正在增长，但太平洋基本上仍是美国内湖，就像大西洋、印度洋和地中海一样。自1945年以来，美军已在海外干预了200多场冲突。单独来看，其中许多干预行动似乎没有什么经济或战略意义，但它们必须被视为美国力量的展显，其目的是维护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完全在美国帝国主义体系的关键机构内进行的。即使假设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要想成为新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必须与美国体系决裂，并通过自己的军事力量和机构来确保其全球经济利益。纵观世界局势，中国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采取任何认真的步骤。事实上，中国在过去40年来是唯一没有进行过海外干预的重要军事大国（联合国维和人员不算）。

直到今天，中国在海外进行投资和贷款时，仍然首先依赖于美国的统治体制，而非自身的军事实力。没有这一基本特征，中国就不能被视为帝国主义强国。与此相反的论点无异于给帝国主义涂上和平主义的色彩：这意味着世界各国接受纯粹以商业为由的超级剥削，世界已经被大国以完全和平的方式重新瓜分。

那么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呢？它们也依赖美国的军事力量。这是否意味着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不，并非如此。德国和日本都曾试图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自战败以来，他们一直是美国体系中的重要伙伴。由于与美国的联盟，它们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着特权地位。这一点与中国不同，尽管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与美国进行了深度经济融合，但中国始终是局外人。

5）中国压迫了哪些国家？

如果没有对外国的压迫，显然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成立。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压迫了哪些国家？毫无疑问，中国政权压迫本国人民，中国压迫其境内的少数民族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这就是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伊拉克和斯里兰卡也符合这一条件。大多数国家都压迫本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所有国家的统治都损害本国人民的利益，但这并不能使它们成为帝国主义国家。

“那你们又怎么解释‘一带一路’呢”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等组织高声质问道，“这难道不是帝国主义的剥削吗？”诚然，中国已在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投资数十亿美元，并让这些国家背负债务。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并不是从工人的利益出发进行这些投资的。它侵犯工会权利，贿赂官员，无视当地民情，支持各种反动政权。然而，问题不在于中国的行为是否仁慈，而在于一带一路等项目是否将中国变成了帝国主义霸主。也就是说，中国是否使用武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它进行了大量投资的国家？

让我们看看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典型代表,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曾因无力支付中国为其建设新港口所提供贷款的利息而将港口租给中国99年。但中国统治斯里兰卡了吗？不。2022年，当斯里兰卡无力偿还给外国债权人（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时，并不是中国出面规定了各种条件。一如既往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且与债权人的关键谈判是在华盛顿而不是北京举行的。就连西方观察家也不得不承认，斯里兰卡的债务危机并非中国贷款所致。

那么巴基斯坦呢？2017年，革命共产主义的国际趋势（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endency / RCIT）发表声明宣称：“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帝国主义殖民巴基斯坦的项目！”国际社会主义道路则声称巴基斯坦是中国帝国主义反美集团的一部分（“中国崛起”论已经过时，chinaworker.info，2024年4月24日）。任何对巴基斯坦有最基本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虽然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密切，但巴基斯坦的一切还

Yves Herman/Reuters
2016年，布鲁塞尔爆发反对中国钢铁的保护主义抗议活动。

是由美国做主。这一点在2022年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当时，美国与巴基斯坦军方精英合谋，将伊姆兰.汗总统赶下台并投入监狱。对此，中国采取了什么行动呢？什么都没有。

说到非洲，“中国帝国主义”的说法可能最为怪诞。西方列强压迫非洲几个世纪，使非洲大陆处于贫困和冲突状态。覆盖非洲大陆的是法国和美国的军事基地，而不是中国的前哨基地（中国唯一的外国基地在吉布提）。法国拥有十几个非洲国家的一半外汇储备，并控制这些国家的货币。与其他所有的地方一样，债务危机发生在美元和欧元支付上，而不是人民币支付上。

再次强调这并不是说中国在非洲扮演着仁慈的角色。远非如此。重点是，中国并没有通过胁迫的方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非洲的任何国家。利比亚、索马里、马里、尼日尔、乍得以及其他许多国家被摧毁的现状都不是中国造成的。在所有这些情况中，西方帝国主义都应负责。

这就引出了南海和东海问题。中国想把太平洋变成中国的内湖吗？我们认为不是。但即便如此，这也不能说明它是帝国主义。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目前的形势如何？自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以来，美国一直是太平洋的霸主。只要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中国完全被美帝盟国包围，其中大多数国家都欢迎美军驻扎在其领土上。菲律宾、韩国、印度尼西亚、台湾—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受到中国的压迫，全都被美帝国主义统治着。

这个局势的发展不是一个和平渐进的过程。它是在东京的火力轰炸、广岛和长崎的核爆大屠杀、朝鲜战争、对印尼共产党人的屠杀以及无数其他罪行中建立起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辩护者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集结狂热谴责，但中国侵略了谁？只要客观地看待事实，就会发现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帝国主义叫嚣不过是对美国统治现状的粗暴屈服。

至于台湾，它的情况相当特殊。台湾在历史上曾是中国的一部分。1949年革命后，它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避难所。从那时起，美帝就有意识地将台湾建设成为将中国再次置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的桥头堡。如今，岛上大多数人确实不希望与中国重新统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在那里只会承诺镇压和维持台湾资本主义秩序（一国两制）。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台湾问题的冲突是关于美日帝国主义同盟对亚洲的统治。正是这种统治解释了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的原因。台海战争将是一场完成1949年革命的战争，而不是一场中国的帝国主义征服战争。

6）政治含义

大肆宣扬中国和俄罗斯“帝国主义”只是为了掩盖以美帝领导下的一小撮大国压迫着整个地球的事实。中国和俄罗斯都没有压迫其边界或周边以外的国家。事实上，它们才是被西方帝国主义围困了几十年的国家。

东亚或东欧革命战略和无产阶级统一的起点必须是将美帝国主义驱逐出该地区。这是否意味着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或克里姆林宫？当然不是。他们的反动政策处处破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例如，俄罗斯和中国政府对乌克兰人和维吾尔人的压迫阻碍了工人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及其盟友。承认他们的民族权利将**加强**反抗压迫东亚、东欧和全世界的列强的斗争。

但是，如果俄罗斯或中国在对美战争中取得胜利，不就意味着它们将取代美国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吗？这完全取决于取得胜利的具体情况。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正是为确保美帝国主义秩序在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国际主义条件下崩溃而奋斗。而要塑造这场斗争，就必须积极参与其中的每一个阶段。美国才是**当今**压迫世界的强权，如果因为担心**明天**另一个强权**可能**会成为新的压迫者而不为打倒美帝国主义而斗争，那将是最严重的罪行。

归根结底，谴责“中国帝国主义”只是拒绝反对美帝及其盟国统治的一张薄薄的遮羞布。这一立场在左翼的力量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在与西方结盟的国家中，保卫中国免遭帝国主义的侵害是不可能被工会官僚机构或自由主义圈子视为值得尊敬的行为。虽然将美国和中

Patrick Piel/Gamma Rapho
资本主义反革命后，柏林的列宁雕像被推倒。

国相提并论可能听起来很激进，但事实是，前者自1945年以来就主宰了整个帝国主义体系，而后者在其国界之外并不主宰世界的任何部分。当然，你也不能一边干革命，一边又捍卫中共的政策。但通过扬起“中国帝国主义”这个恶魔来拒绝反对美帝霸权的斗争，则是粗暴的社会沙文主义。

第二部分：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

1）马克思主义与国家

在讨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工人国家时，必须确定基本的方法论。如同他们证明中国是帝国主义时一样，大多数左派在问题开始的地方就结束了。对于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阵营来说，只要指出亿万富翁和跨国公司的数量就能解决问题。而反方则认为，国家对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足以证明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再次，这个问题不能从个别的特征来理解，而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发展中看待。

资本家数量的激增和工业高度的国有化都是理解中国的关键，但它们本身并不能证明什么。正如托洛茨基在《苏联与第四国际（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1933）中指出的那样，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的第一年并没有将工业国有化，工业仍在工人控制下的私人手中。1921年，布尔什维克通过新经济政策在农业中重新引入了市场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回归。此外，资产阶级本身也可以在应对某些危机时将大片工业国有化（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葡萄牙）。这些例子只能说明，财产形式作为一个孤立的因素**不足以**决定一个国家的阶级性质。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本身，即武装部队和官僚机构。它们捍卫的是哪个阶级的专政？尽管国家的政治形式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民主主义、波拿巴主义、法西斯等），但它始终代表着一个特定阶级的统治。列宁在总结恩格斯的话时解释道：

>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
> ——《国家与革命》（191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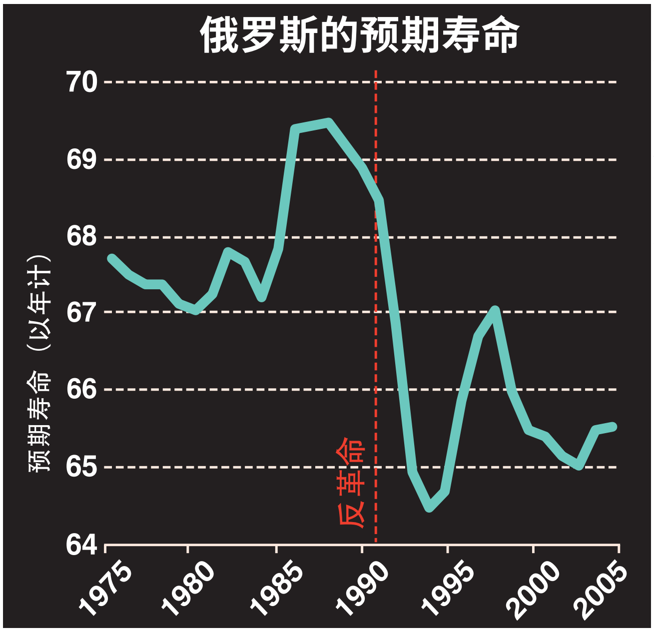
列宁坚持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永远不会理解“至于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这个阶级**不可能**与同它对立的一方（同它对抗的阶级）调和。”时至今日，情况依然如此。关于中国阶级性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前景的每一个错误，都是建立在否定列宁概述的这些基本国家概念的基础之上的。

在这个问题上的修正主义始于中共本身。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中提出的自己的概念即：中国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其中应该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一种幻想。当毛泽东的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的民族资产阶级军队后，就不存在“联合专政”了。绝大多数资产阶级逃往台湾，没有逃往台湾的则被没收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与其对立面和解，这清楚的证实了马克思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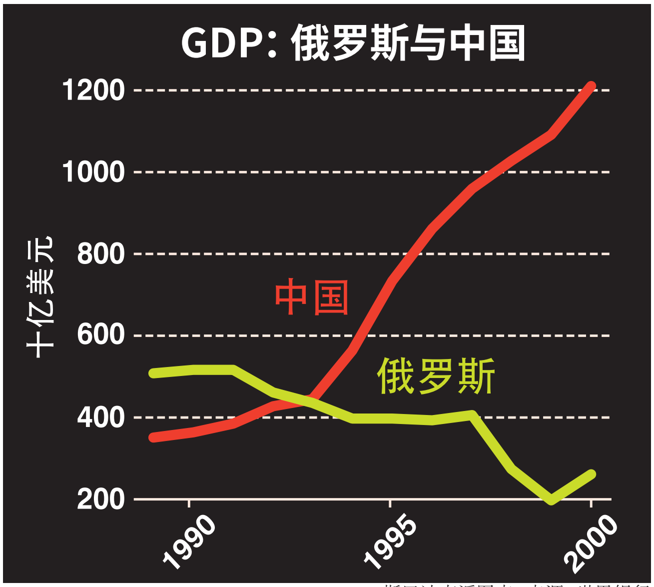
Henriette/AFP
工人介入天安门起义，使中共官僚体制陷入危机，点燃了政治革命的火种。

义的理论。然而，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背后也存在着同样的幻想，而且中共仍然坚持这种幻想。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都建立在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的神话之上。这种幻想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致命威胁。

以不同的方式，声称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各路社会主义者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不是像中共那样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共存，而是认为中国从1949年后的工人国家逐步无缝过渡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据他们的观点，这一过渡时期没有发生中华



斯巴达克派图表；来源：世界银行



斯巴达克派图表；来源：世界银行

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结构被新的国家结构**瓦解**和取代的严重危机。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同一个国家机器、同一个官僚机构和同一个政权可以维护两个对立阶级的专政。这只是试图抹杀国家存在本身所体现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另一种方式。托洛茨基在回答与20世纪30年代苏联有关的这些论点时解释道：

> "马克思关于政权从一个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的灾变性质的论点，不仅适用于历史飞速前进的革命时期，并且也适用于社会倒退的反革命时期。说苏联政府已经从无产阶级性质**逐渐地**变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人，可以说只是把改良主义的胶卷倒转来放映罢了。"
>
> ——《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

要确定中国的阶级性质，关键的标准不是市场关系或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程度，尽管这些无疑是重要因素。相反，关键在于国家机器的性质和功能是否发生了质的变化。那些证明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要么认为托洛茨基错了，一个国家确实有可能逐渐改变其阶级性质；要么就必须解释中国的反革命是何时以及如何发生的。

2）东欧和苏联的反革命

托洛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的理论论证与今日现实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系列清晰的反革命的历史实例。欧洲的前工人国家和前苏联地区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毋庸置疑。波兰、民主德国（东德）、南斯拉夫和苏联本身的过程各不相同，但其中的每一个例子都清楚的证实了"从一个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的灾变性质的论点。"

我们无需详述反革命是如何在每一个事例中取得胜利的，但可以从中找出几个共同的基本特征。在每一个案例中，严重的政治危机都导致了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垮台。虽然在某些国家，前斯大林主义者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保持显赫的甚至领导地位，但前共产党都没能继续掌权。此外，在所有案例中，国家结构都进行了彻底重组。在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苏联，国家机器被解体或清算。但即使情况并非如此，国家也重组了武装力量，改变了名称、宪法和法律制度。

欧洲不再有红军或人民军。国旗上再也没有锤子和镰刀（德涅斯特河左岸共和国不算）也没有社会主义或人民共和国。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些名称和标志毫无意义。但这是错误的。作为一支征服大军，资本主义带来了它的旗帜、符号、价值观和语言。这些变化表达了国家权力的决定性**断裂**。它们代表着资本主义对斯大林主义的决定性胜利。

让我们看看问题的经济面。在反革命爆发之前，东方集团的许多国家采取经济自由化措施已有多年时间。然而，向资本主义的回归并不是渐进式的经济转型，而是以灾难性冲击的形式出现的。旧的经济模式突然崩溃，新的模式被引入，通常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进行的。其直接后果是去工业化、大规模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

根据世界银行199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国家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按实际价值计算至少下降了四分之一。在大多数情况下，国有企业被清算并低价出售。白俄罗斯是证明规则的例外，那里的国有企业没有被清算，但经济冲击同样残酷，人均GDP萎缩了34%。

资本主义复辟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巨大的。大多数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都缩短了。俄罗斯的死亡率上升幅度超过了任何工业化国家和平时期的水平。南斯拉夫在内战中解体。所有前共产主义国家的贫困率急剧上升。世界银行关于这些国家（不包括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的研究报告指出 "据估计，1989年每天生活费不足4美元（按国际价格计算）的人数为1 400万（在约为3.6亿的总人口中），而现在估计有超过1.4亿人生活在同一贫困线以下"。

结论显而易见：各处的反革命都是一个残酷的过程。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层面，从工人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都是突然的，代表着与过去的明显决裂。

3）中国的改革开放

东欧和苏联的反革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比如何？如果只关注一些孤立的因素，如私有化的数量和市场关系的扩散，就有可能认为两者的相似之处。但是，如果我们退一步，从全局来观察，那么两者显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在政治层面，两者的差异最为明显。80年代末，欧洲和中亚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政治动荡，中国也未能幸免。然而，这场动荡的结果却恰恰相反。1989天安门抗议活动引发的学生和工人广泛起义使中共政权陷入危机。但与民主德国、波兰和苏联的斯大林官僚体制不同，中共没有崩溃，而是在血腥的镇压浪潮中粉碎了这场运动。其结果是，中共加强了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天安门事件的结果是政治的**延续**，而不是断裂。

如今，所有重要的国家机构在运作和外观上都没有

1991年8月19日，莫斯科：鲍里斯·叶利钦领导了亲资本主义的政变，标志着反革命的胜利。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由于其修正主义理论，站到了这些街垒一边。

根本改变。中国仍然由共产党统治，武装力量仍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继承自毛泽东的农民军。人民共和国依然存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依然（在官方上）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有威望的职位依然是共产党总书记。没有人质疑这些事实—只是那些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认为它们无关紧要。

那么经济和社会领域呢？托洛茨基曾预言，苏联持续的官僚统治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崩溃，将导致“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停滞，导致可怕的社会危机和整个社会的急剧下降”《苏联与第四国际（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我们已经看到这正是在东欧和苏联发生的的情况。然而，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情况却完全相反。在20世纪90年代，生产力得到了历史上最惊人的**发展**，贫困率空前下降，社会经济指标普遍改善。

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市场自由化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大量工人阶级在新兴资本主义企业和外资企业中面临恶劣的工作条件，因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而遭受巨大苦难。但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并没有经历反革命国家所经历的那种毁灭性冲击。改革的过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它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的，并保持了社会的整体结构。

事实上，“改革开放”的根本意义不在于恢复资本主义，而在于为中共创造经济条件，以避免与其他斯大林主义政权相同的命运。许多人认为1992年的南巡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转折点，我们不妨引用邓小平南巡时的话，看看官僚机构本身是如何阐述这一转变的：

> “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
>
> ——《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邓小平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承诺。而是，这些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表明了对**延续性**的明确渴望。这不是叶利钦要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言论，而是右翼斯大林主义改革者（如布哈林或戈尔巴乔夫）的言论。

那怎么解释中国的不平等现象呢？难道它们没有像俄罗斯和其他前工人国家那样爆发吗？不平等现象确实非常严重，这表明了中共政策的反动本质。然而，我们只需看看毛泽东时代饿死的数千万人，就会发现这并不新鲜。再次强调，重要的是要比简单的统计数据看得更深。

在俄罗斯，在社会普遍**衰落**的背景下，不平等现象

1917年，冬宫。革命并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宣传海报展示了解放军保卫中国，抵御乘坐美国军舰入侵的台湾资本家。右图：中国士兵宣誓效忠中国共产党。

Jia Fangwen/视觉中国

激增，亿万富翁涌现。在中国，这一过程发生在社会**全面进步**的背景下。在前一种情况下，一个腐烂的社会被外国资本和寡头掠夺。而后一种情况是，资本家和官僚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占有不成比例的财富。在这两种情况下，基尼系数都会上升，但这是通过根本不同的社会进程发生的——一方是反革命，另一方是基于外国资本与国家经济控制融合的高速增长。

4）改良主义电影的倒放版

面对中国的国家和政权基本保持不变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中资论的各种支持者要么无视这一问题，要么从理论上"解释"这一问题。让我们来看两个至少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例子。

战斗倾向的政治传统

战斗倾向（Militant tendency）以主张社会主义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者的议会多数以和平夺取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权来实现而著称。它的各种后继者也是"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这一观点的最有力支持者，这并非巧合。

在东欧的斯大林主义崩溃之前，工人国际委员会（CWI）以特德-格兰特（Ted Grant）的理论为基础，将其改良主义的纲领扩展到了畸形的工人国家。工人国际委员会国际执行委员会1992年的一份文件认为，这一时期出现了"奇特的混合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反革命政府在工人国家遗留下来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总是能够应用固定的社会类别：资本主义国家或工人国家"（《斯大林主义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Stalinism）》）。列宁的"阶级对立的不可调和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漏洞百出"混合国家。"

这种修正主义理论的具体结果是，CWI 积极参与了叶利钦为搞垮苏联而设置的街垒。在否认反革命的发生对于资本主义复辟是必要的同时，他们最终参与了反革命。毕竟，如果俄罗斯在1991年之前就不再是一个工人国家，那么就没有什么可捍卫的了。苏联毁灭的灾难性后果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观点的彻底破产及其所代表的历史性的背叛。

CWI及其后继者非但没有从这一失败中吸取教训，反而将同样的方法延伸到了今天的中国。在小册子《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吗》(2000年5月）中，国际社会主义道路的劳伦斯·科茨（Laurence Coates）使用了"混合国家"的概念来论证中国逐渐向资本主义过渡：

>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1991-92年，中国是一个混合体。从一种制度到另一种制度的转变尚未完成—在这一时期，有两条道路或视角是可能的。现在情况已不再如此。主要原因是国际事件—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尽管天安门广场运动的镇压及其对意识的影响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天安门事件的结果是政治延续，而不是断裂。至于国际背景，这一点当然至关重要。但**一个国家的性质**不会因为另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而改变。俄国内战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事件决定的，但当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国家的性质已经改变。科茨恰恰抹去了这些决定性的转折点。与其说国家是不可调和的阶级利益的证明，不如说我们发现了国家形式的滑动尺度，可以从一个阶段逐渐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整个政权和国家结构保持不变，没有发生决定性的阶级利益冲突。这不过是将战斗倾向的旧议会改良主义应用到了中国。

RCIT

革命共产主义的国际倾向来自不同的政治传统，至少对政治权力问题进行一些思考。根据他们的观点，"当斯大林主义官僚工人政府被资产阶级复辟政府取代或转变为资产阶级复辟政府，"而资产阶级复辟政府"在言行上都坚定地决心重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资本主义反革命就发生了（《古巴革命被出卖了？》，2013）。

我们已经看到，习近平和邓小平都从未"下定决心"重建资本主义。但更重要的是，RCIT声称"斯大林官僚工人政府"可以转变为"资产阶级复辟政府"，这怎么可能呢？对于RCIT来说，原因是他们认为在畸形的工人国家中，国家镇压的工具实际上已经是资产阶级性的了。他们认为：

> "虽然托洛茨基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点，但从他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预计工人阶级反对斯大林官僚机构的革命要比可能出现的推翻无产阶级财产关系的资本主义复辟更加猛烈。原因在于**'资产阶级-官僚'国家机器（即警察、常备军、官僚机构）不是无产阶级的工具**，而是小资产阶级斯大林官僚机构的工具，它更接近资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黑体部分由作者标明）

鞠鹏/新华社

2022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这看上去像一个资本主义政党吗？

虽然斯大林官僚机构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是正确的，但说它指挥的国家机器“不是无产阶级工具”是绝对错误的。这种修正主义观点等于否定了工人国家的定义。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解释道：

> “同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样，恩格斯也竭力促使有觉悟的工人去注意被流行的庸俗观念认为最不值得注意、最习以为常的东西，被根深蒂固的甚至可说是顽固不化的偏见奉为神圣的东西。**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但是，难道能够不是这样吗？”（黑体部分由作者标明）

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是“常备军和警察”，这与其他任何阶级专政——奴隶制、封建制或资本主义专政——一样。在官僚畸形的工人国家中，这些“武装人员机构”被官僚集团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利益，但它们仍然是工人国家的机关。

在中国，解放军自内战时期起就被用来镇压左翼异议人士——1989年的事实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解放军**摧毁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解放军那时是小资产阶级的机关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是小资产阶级国家吗？不，自1949年以来，解放军一直是**无产阶级政权**反对内外反革命的重要机关。正是因为有了解放军，台湾的中国资产阶级才始终无法重回大陆。

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在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中，官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亲资本主义官僚与工会之间的关系。尽管前者可以利用工会机器镇压基层员工的不满情绪，并且“更接近资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但工会本身仍然是工人阶级的机构，其存在本身就是抵御资本家的屏障。一个工会官僚要想完全成为资

沙特皇家法院

Grigory Sysoev/Sputnik

这儿，你看到红旗了吗？

Chinatopix

Thibault Camus/AP

在蚂蚁集团老板马云批评中共后，党对蚂蚁集团进行了重组，将马云的股份降至6%。

本家的无异议的代表，他就必须与工会决裂。同样，如果不切断与革命国家机关的联系，斯大林主义政府就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政府”。

苏联正是在1991年断绝了这种联系。叶利钦摧毁了工人国家，同时也摧毁了官僚机构的权力来源—以及作为统治阶层的官僚机构本身。在中国，官僚集团有意识地避开了这条道路，并通过牢牢控制国家镇压机关来维持自己作为一个统一集团的地位。RCIT国家“理论”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消除这两个案例之间的质的区别。按照他们的说法，你可以无缝地从一个阶级专政过渡到另一个阶级专政——斯大林官僚机构依然完好无损——因为警察和军队充其量始终是小资产阶级的机关。这不仅是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否定，也是对列宁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的否定。

按照他们的理论逻辑，RCIT不仅宣称中国和越南是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还宣称古巴和朝鲜也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消除资本主义复辟中反革命的必要性，他们发现资本主义无处不在，甚至在那些经济和政权显然是基于典型的斯大林模式的国家也是如此。

5）谁统治中国？

毫无疑问，重申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基本原理并不能说服我们的批评者。他们会回答说，这些理论观点与事实相矛盾。毕竟，中国有814位亿万富翁和许多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公司，甚至其国有企业也是按照市场原则运作的。

这些当然都是重要的事实，但要正确理解这些事实，就必须正确认识指导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人类已经掌握了飞行技术，但这并不能否定万有引力定律。事实上，只有理解了万有引力定律，才有可能解释飞机是如何升空的。中国是一个拥有资本家的畸形工人国家。这是一个极度矛盾的发展过程，但它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失效。相反，只有**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才能正确理解经验证据，回答谁真正统治中国的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阶级性质渐变理论的价值。但大多数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并不关注理论问题，而更关注对经验事实的印象主义解释。例如，在最近一场针对两名中共社会主义捍卫者的论战中，RCI声称：

> “很明显，国家并没有‘主宰’经济，尽管与西方竞争对手的经济相比，它确实发挥着更大的影响力。但这里的问题是，即使银行‘**主要**对政府而不是私人股东负责’，银行和政府在市场需要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市场并非‘为社会主义服务’。”
>
> ——丹尼尔·莫利，《“东方依然红吗？”对否认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的回答》（2024年7月 4 日）

为了支持这一立场，RCI指出，中共在2008年大金融危机后采取的经济措施助长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失衡。这是事实，但这虽然说明了中共的政策是错误的，但并不能证明中共被市场所统治，用RCI的话来说，就是“失去了对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控制”。事实上，2008年的证明恰恰相反。在《党：中共统治者的神秘世界》（The Party：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2012 年）一书中，理查德·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解释道：

> “党的权力在2008年底和2009年初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央银行、银行监管机构甚至银行本身都建议在制定危机应对措施时谨慎行事。在过去的十年中，三方都在为建立一个可靠的商业银行体系而努力奋斗。然而，在面临经济急剧放缓的深渊时，政治局下达了打开资金阀门的命令。一旦命令下达，各银行别无选择，只能争先恐后放贷……家庭消费者和私营企业获得的贷款仅占15%，而2007年的峰值达到三分之一。大部分贷款流向了国有企业。”

作者继续解释说，中国银行的行为方式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在西方国家，尽管政府在这一时期有效控制了银行，但却没有办法迫使银行放贷。从根本上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了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反应。在市场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出面拯救金融体系，确保其盈利性和稳定性。而在中国，中共控制着经济，国家的干预是为了确保政权的稳定。在此过程中，国家的行为违背了银行花费十年时间建立的盈利原则。

RCI没有提到这一点。他们观察到2008年后投机泡沫的存在，并得出结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共“失去了……控制”。但是，让我们再仔细看看这个问题。中共是如何应对这一投机泡沫的呢？2020年，它出台了 “三条红线 ”规定，专门用于刺破房地产泡沫。这导致房地产巨头恒大破产，整个行业进入萧条。中共行动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是毁灭性的，尤其是对中国公民而言，他们永远也无法得到自己花钱买的房子。这个例子表明，中共以典型的斯大林主义方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但这当然**不能**说明中共在市场面前无能为力。

这些行动再次表明了中共与美国政府的**区别**。在第一个例子中，国家自己刺破了投机泡沫，以避免可能导致政治动荡的急剧危机。在美国的案例中，政府尽其所能让房地产泡沫持续尽可能长的时间，今天它又在股市上做着同样的事情。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如果不了解每个国家都根据根本不同的规律行事，就不可能正确理

解这些事实。

理解中国经济的部分困难在于，中共数十年来一直在努力为其披上市场经济的外衣，以吸引外资并压制本国劳动力。它将国有企业部分私有化，让它们拥有"独立"的董事会，让私人资本家发展市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等等。但在这种自由化的背后，中共对公营和私营企业都实行了铁腕控制。有鉴于此，只关注公司在形式上是私营还是公营是一种误导。底线是它们都必须符合中共的政治要求。中央组织部等机构确保了这种政治控制，几乎所有重要职位都由中央组织部直接任命。马利德作了如下比较：

> "这就好比说假设在美国有一个类似的部门，一个类似的部门将监督整个美国内阁、各州州长及其副手、各大城市市长、所有联邦监管机构负责人、通用电气、埃克森美孚、沃尔玛和其余约50家美国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任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编辑，电视网络和有线电视台的老板，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其他重点大学的校长，以及布鲁金斯学会和传统基金会等智囊团的负责人。"

中共的控制并非受利润驱动的支配。事实上，这与其最基本的原则直接冲突。例如，2004年，中组部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决定对中国三大电信公司的高层进行交换，而这三家公司是相互竞争的，并应该遵循西方股票市场的规则。在相互竞争的公司之间轮换高管违反了最基本的资本主义竞争法则。这就好比美国政府决定让扎克伯格负责特斯拉，让马斯克负责Meta。中共这样做是为了遏制价格战，维护自己的权威。在哪个资本主义国家会发生这种事情？这真的是市场在向国家发号施令吗？

尽管有各种统计数字表明中国普遍存在资本主义关系，但基本事实是，资本家阶级并不掌握国家权力，一切由中共说了算。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巨大发展是中共在过去几十年中与资本家**结盟**合作的产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共的利益与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相同，也不意味着中共的政策主要以资本家的利益为指导。恰恰相反。共产党的官僚机构继续处于中间地位，在（国内外）资本和工人阶级的压力之间游走。因此，它必须利用国家机器来对抗这**两极**的压力，以维持自己的地位。

6）波拿巴主义

一般的论点是，无论中共对中国的资本家施加何种胁迫，这与任何其他波拿巴主义政权的胁迫并没有什么不同。2017年，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BS）扣押了数百名沙特资本家（大多是其亲属），并向他们勒索数十亿美元。2003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使他的竞争对手、时任俄罗斯首富的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因欺诈和挪用公款而被关押在西伯利亚。这些案例与中共经常性地让资本家失踪，或上述一些例子有何不同？要了解它们有何不同，有必要具体研究一下每个政权及其与国内资本家阶级的关系。

沙特阿拉伯是一个绝对君主制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一直依靠与美国的军事同盟来维持自己作为中东反动堡垒的地位。在沙特，王室基本上也是资本阶级。著名的2017年事件就是一场不亚于从中世纪移植到现代世界的王朝恩怨。MBS敲诈自己家族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王朝主张，这是沙特资本家阶级封建性所衍生出的"正常"功能。在俄罗斯，普京是在黑帮寡头之间权力真空的暴力争斗中上台的。普京政府的波拿巴主义特征反映了俄罗斯在反革命后需要一个能够控制紧张局势的仲裁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对某些越轨的寡头个人行使权力。

在这两种情况下，波拿巴主义的镇压措施都起到了维护资本主义政权稳定的作用。在中国，政权的波拿巴主义特征则截然不同。1949年后，中共的权力建立在对工人国家的官僚控制之上，工人国家**粉碎了**资本家阶级。中共反对革命国际主义纲领。它发现自己不断地被夹在经济的落后性，工农的经济与政治诉求以及世界帝国主义的敌对压力的挤压。90年代，随着斯大林主义的全面崩溃，中共选择了更有力地向风向靠拢，也就是与资本家合作。全球和国内环境变了，但政权本身没有变。

视觉中国/Getty

新冠疫情期间大规模兴建的医院。由于资本家并不控制经济，中共能够迅速调动大量资源应对危机。

从根本上说，中共的波拿巴主义还是来自于同样的阶级力量。与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不同，中国的资本家阶级不是政权的基础，而是对手。即使许多资本家进入了中共或与高层官僚有关系，情况仍然不会有根本的变化。阶级对立不能通过婚姻和封衔来缓和，这是法国贵族的惨痛教训。

尽管他们的政权都具有波拿巴主义的特点，但无论是穆罕默德-班加西王朝、普京还是习近平，都无法超越其权力所依靠的社会利益：沙特君主制是王朝利益，普京是寡头利益，习近平是官僚利益。就前两者而言，统治阶层的权力依赖于资本家阶级。攻击资本家的根本利益将违背政权的本质。中共的情况并非如此。在足够的外部和内部压力下，它可以剥夺资本家阶级。当然，这会造成巨大的动荡，这不是中共想要的。但我们不要忘记，它以前也这样做过，而且1949年之前毛泽东也不想清算资本家。

Vincent Thian/AP

2019-2020年，左翼绝大多数支持香港的亲帝国主义“民主”运动。

从资本家对这三个政权的行为可以进一步看出它们不同的阶级基础。尽管MBS实行暴政，但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还是像飞蛾扑火一样涌向沙特阿拉伯。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爆发和西方的制裁导致大量富豪离开。然而，作为一个整体，寡头们团结在政权周围。自2022年以来，亿万富翁已将至少5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汇回俄罗斯。这是因为面对西方的敌意，俄罗斯政权是一个可靠的支柱。

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资本家对中国政权的恐惧远甚于对西方的恐惧。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成群结队地移民西方。尽管中国政权严格限制资本家移民，但每年中国都是资本家出逃国家的榜首。根据 Henley & Partners 咨询公司的数据，自新冠疫情结束以来，离开中国的高净值人士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到2024 年为止已达到创纪录的1.52万人。在《毛泽东与市场（Mao and Markets）》（2022 年）一书中，克里斯托弗.马奎斯和乔坤元声称，“超过四分之一的中国企业家在致富后离开了中国，有报告显示，剩下的企业家中几乎有一半正在考虑也这样做”。如果中共从根本上致力于维护中国资本家的利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其他独裁国家的资本家不会如此惧怕他们的政府？

7）产权

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托派”使用的最终论据是，官僚机构已经把自己变成了资本主义阶级。他们引用了《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中的一段话，得意地指出托洛茨基曾说过：

> “特权若不能传给自己的儿孙，那只有一半价值。而遗产权又是与财产权不可分离的。所以仅仅做一个托拉斯的经理还是不够的，必须做一个股票持有者才行。如果官僚在这紧要的方面得到了胜利，那就是表示他们变成一个新的占有阶级了”（第九章，“苏联国内社会关系”）。

由于中共官员及其亲属拥有股权，我们的批评者得出结论说，官僚阶层已经转变为资本家阶级。虽然表面上看似如此，但这些财产权的实际意义并不那么简单。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在1936年1月1日的一封信中，托洛茨基谈到了区分 “真正的财产形式与假定的财产形式，即与法律上的虚构”的重要性。尽管中国在形式上尊重私有财产，但正如中国的其他一切事物一样，这个问题在进一步考察后变得更加模糊。

首先，宪法还规定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这如何与捍卫私有财产相容，我们将留给斯大林主义学者去研究。但对于任何有自尊心的资本家来说，“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及私人不可能在城市或农村拥有任何土地等说法同样令人扬起眉毛。如果这就是资本主义，那肯定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资本主义。

但是，让我们遵循托洛茨基的告诫，超越正式的法律条文。私有产权的一个基本标准是能够自由处置自己拥有的财产。这就是财产私有的整个本质。问题是，中国的资本家能控制自己的资产吗？是的……但前提是他们的使用方式必须符合中共的意愿。

个别资本家拥有公司股份（包括国有公司的股份），但他们并不拥有对企业的最终控制权。我们已经看到中共是如何有效监督高层CEO的任命的。但党的控制还不止于此。中共直接或间接地介入，以表明纸面上的私有财产并非完全私有，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中国效仿西方，用股票期权奖励国有企业的高级CEO。但是，当这些CEO决定出售这些股票时，他们被告知不应该这样做。他们拥有公司的方式就像你拥有一小片热带雨林——你可以把证书挂在墙上，但也仅此而已。

最有名的例子当然是蚂蚁金服集团老板马云批评中共后，中共停止了蚂蚁金服集团的公开募股。蚂蚁金服的母公司损失数十亿美元，马云也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多年。丑闻发生后，蚂蚁金服集团进行了“重组”，马云的

控股权从53.46%降至6.2%。他的律师肯定忘了坚持强调私有财产在中国是不可侵犯的！

而这种财产关系的突然变化无独有偶：2004年，海尔高管曾试图增持公司股份。此事引发丑闻后，政府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宣布海尔不再是私营企业，而是国有企业。海尔顷刻间被收归国有，然后在多年的争议之后，又突然被变回了私营企业。

中国私有财产的“灵活性”在危机时期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共能够以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方式和规模调集资源。疫情肆虐各地，各国政府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但资本主义国家无论采取多么严厉的措施，都受到财产私有性质的限制。它们只能以非常有限的方式引导商品和服务的生产。相比之下，中国可以动员全社会实现政府决定的目标。这本身并不是因为中国有一个专制政府——在疫情期间，所有政府都是专制的——而是因为它可以无视私人资本家的利益，按照计划运作。

新华社

江苏省造船厂工人。经济增长造就了一支强大的无产阶级。赢得工人参与政治革命的斗争，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

毫无疑问，中国目前的情况与苏联不同。中国确实存在一个拥有私有财产的资本家阶级。然而，这种私有制的现实是高度矛盾的。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还没有完全确保他们的主张。他们没有完全的经济或政治控制权，因为国家的武装力量并不效忠于他们，而是效忠于中共官僚集团。资本家阶级要想在中国建立自己的专政，就必须改变这一现实——必须摧毁中共的政权。

8）反革命还是政治革命？

如果中国发生反革命，会是什么样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的例子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内战将是一个明显的可能性。总体而言，资本家将肆无忌惮地控制经济，国有企业将在更加全面的私有化。政府将失去对银行业的控制，资本流动将自由化，使中国市场更加依赖帝国主义金融。毫无疑问，数百万人将在经济重组计划中失去工作。这一次，不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而是在社会解体的背景下。中国和台湾也极有可能在反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现重新统一，而这正是国民党的战略目标。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事态发展会带来民主权利或公民自由的改善。

中国反革命的国际影响同样是灾难性的。就像苏联解体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灭亡将巩固美国及其盟国的地位，使他们能够再次肆无忌惮地在全世界施展其武力。此外，资本主义复辟对生产力的大规模破坏将降低全球的生活水平。

声称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否认当今中国有任何值得捍卫的东西，从而积极地致力于这些灾难性的结果。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走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多数左派所走过的背叛之路。从波兰到民主德国再到苏联，左派为反革命欢呼雀跃。如今，他们没有吸取任何教训，对中国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支持香港民主抗议等明确的亲帝国主义运动。这些组织非但没有让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摆脱自由民主的幻想，把他们培养成共产主义革命者，反而加强了中国社会的反革命潮流。

幸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尚未注定。决定性因素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行动。但要战胜反革命，工人阶级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政治任务。首先，这意味着只有通过革命推翻中共，才能确保1949年革命的成果。这将是一场**政治革命**。与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不同，国家机器并不需要被完全打碎，而是需要从头到脚进行清洗，并将其置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控制之下。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堕落程度和资本主义的广泛影响，政治革命将是一场彻底的、令人震惊的变革。一项中心任务将是没收资本主义工业。毫无疑问，资本家将进行反抗。然而，他们的行动将受制，因为国家权力不在他们手中。

天安门事件表明，在无产阶级的推动下，国家机器本身开始动摇，包括最高指挥官在内的一整个军的解放军部队（比如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拒绝执行命令。在强烈的社会冲突面前，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悬而未决，开始瓦解。无论是在中国、民主德国还是匈牙利，各种政治革命的爆发都表明，在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中，工人阶级的起义确实有可能将大部分国家机器拉到自己一边。在中国，这种结果将会使没收资本家的资产变成简单的行政事务。这种国家机器中的分裂在任何资本主义

国家都是不可能的，也是区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一个关键因素。

结论

我们已经说明了中国既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尽管如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的显然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结合国家控制和资本主义，中国得以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资产阶级理论家将此解释为美国自由贸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胜利。中共的支持者则将其解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至于那些认为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惊人成就被淡化或否认，但无法解释。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来分析中国，有必要从二战后和冷战结束后非常不寻常的条件出发。列宁和托洛茨基所面对的情况并不是主要帝国主义由于一个大国的压倒性统治而联合起来，更何况他们所处的世界更不是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仅仅引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观点是不够的，必须将他们的分析和纲领延伸到这种独特的现实中去。归根结底，正是后苏联时代的独特性诠释了当前世界局势和中国发展的独特性。

中国的巨大发展既不是帝国主义的胜利，也不是斯大林主义的胜利，而是特定和独特条件下的产物。1989年粉碎天安门运动一度关闭了政治革命和反革命的大门。因此，中国在90年代初作为一个工人国家完好无损地保留，并面临着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

从表面上看，中共似乎通过与魔鬼的交易取得了胜利。但高增长和与资本主义共存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政权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处于低谷。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国对中国的冲突，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内部矛盾日益加剧；尽管中共竭力抹杀阶级斗争，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终将会再次在政治舞台的最前沿爆发。到那时，我们将看到中国的斯大林主义对工人国家的腐化有多深。

能否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反革命中拯救出来，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所跟随的政治领导层。如果让亲资本主义势力占据领导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定要亡国。如果对斯大林主义（无论其形式如何）安抚，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将灭亡。通往胜利的唯一道路就是第四国际的道路：无情地反对帝国主义，捍卫1949年革命的社会成果，推翻斯大林官僚集团，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国际工人阶级联盟。正如中国的独特发展是国际阶级斗争的产物一样，中国未来的命运也将取决于与全世界工人的团结。以上就是我们手头的任务。■

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民族压迫…

(上接第37页)

年之久。即使这种极其温和的改革，也在1959年引发了一场反动叛乱。这场叛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和支持的，最终被镇压，达赖喇嘛及其集团逃往印度。此后，中共政权废除了达赖的政权体制，同时废除了奴隶制以及藏人被迫向寺院缴纳的苛税。

然而，正如本文前文所提，藏人和新疆的穆斯林一样，也饱受中共强加的大汉族主义之苦。正如对新疆的态度一样，中共对西藏的任何分离主张都坚决反对，并借此强化这样一种偏见：民族少数群体若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具备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太落后了”。

这正是中共反国际主义立场的最典型体现。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认为西藏在脱离更先进经济体的情况下还能拥有任何进步的未来。但剥夺藏民族的民族权利，只会激化其与中国汉族群众之间的矛盾，并让帝国主义势力在反华宣传中赢得“人心”。真正的出路，是为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西藏而斗争，并使其与中国工人国家结成反帝联盟。这一要求必须成为当代中国的革命纲领的一部分。

中国的民族问题还包括其他方面，也需要被认真对待。其中之一是蒙古族问题。在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仅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但近年来，他们就母语教育权利发起了顽强的抗议斗争。除了捍卫这类基本权利之外，还有蒙古国被分裂为两个国家的问题。托洛茨基主义者应当提出一个展望：通过中国的政治革命和外蒙古的社会革命，实现蒙古的重新统一。这一问题当然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根本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分析框架应用于所有此类问题。

国际主义的旗帜

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关头。在当下世界危机四伏之际，中共一方面试图维持其阶层统治地位和等级特权，另一方面则试图以“民族团结”的名义强加社会纪律，同时向国际金融资本呼吁“共赢”合作，并寄希望于全球南方那些靠不住的资产阶级盟友。这一路线威胁着整个工人国家的生死存亡。

在中共的汉族沙文主义面前，捍卫民族自决的斗争只是迈向更大目标的一步——即凝聚起一支托洛茨基主义干部队伍，为斯大林主义的统治提供一个真正的革命替代方案。我们所继承的，是早期共产国际的路线，是最初的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那些在塔什干建立突厥斯坦局、将十月革命推向东方的布尔什维克干部的使命。

一支能够动员中国无产阶级，为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群众的解放而斗争的列宁主义先锋队的出现，势必将在尼泊尔及整个印度次大陆、在前苏联的中亚各国、在蒙古乃至俄罗斯西伯利亚产生深远影响。为了动员真正的反帝战士，反对中共那套民族主义与全球阶级协作的投降主义路线，我们提出的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战略展望：建立一条通往社会主义欧亚大陆的工人国家之带！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号召一切工人阶级革命者，加入我们的行列，踏上这条斗争之路。■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

iclfi.org • spartacist@spartacist.org • 𝕏sibadakepai • iclsibadakepai • Box 7429 GPO, New York, NY 10116, 美国

Spartacist League of Australia

redbattler@exemail.com.au • (03) 9329 0275
RedBattlerSLA
Spartacist ANZ Publishing Co.
PO Box 967, North Melbourne Vic 3051, 澳大利亚

RED BATTLER

A$10 / 4 issues • International rate: A$15

Spartacist League/Britain

workershammer@btconnect.com • 07301 003174
WorkersHammer
Spartacist Publications
PO Box 42886, London N19 5WY, 英格兰

WORKERS HAMMER

£5 / 4 issues
Europe outside Britain and Ireland £7 • Other countries £9

Spartakist-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spartakist@online.de • (0 30) 4 43 94 00 • +49 174 466 5332
spartakist_IKL
SpAD, c/o Verlag Avantgarde
Postfach 2 35 55, 10127 Berlin, 德国

SPARTAKIST

Abo (3 Ausgaben): 5€ • Auslandsabo: 10€

Ligue trotskyste de France

ltfparis@hotmail.fr • 01 42 08 01 49 • leBolchevik_LTF
Le Bolchévik, BP 135-10, 75463 Paris Cedex 10, 法国

LE BOLCHEVIK

4 numéros : 5 € • Hors de France : 7 €
Chèques à l'ordre de : Société d'édition 3L

Τροτσκιστική Ομάδα της Ελλάδας

spartacist@hotmail.com • 693 069 4112 • toe_icl
Τ.Θ. 8274, Τ.Κ. 10210, Αθήνα, 希腊

Ο ΜΠΟΛΣΕΒΙΚΟΣ

Συνδρομή Ελλάδα & Κύπρος 5 € ή 150 TL / 4 τεύχη
Ευρώπη 7 € • Υπόλοιπες χώρες 9 €

Lega trotskista d'Italia

red_sp@tin.it • spartaco_ltdi
Spartaco, Ufficio San Donato Milanese, Casella Postale 47,
20097 San Donato Milanese (MI), 意大利

SPARTACO

Abbonamento a 3 numeri: € 5
Europa: € 6 • Paesi extraeuropei: € 8

Grupo Espartaquista de México

elantiimperialista@protonmail.com
ElAntiimperialista-x6t • GEM_LCI
gem.lci2 • 55 8818 0086
Escribe sólo: Ángel Briseño, Apdo. Postal 006
Admón. Postal 13, CP 03501, Ciudad de México, 墨西哥

EL ANTIIMPERIALISTA

México: Méx. $40 / 4 números
América Latina: Méx. $80
EE.UU. y Puerto Rico: US$4 • Otros países: US$6 o 6 €

Spartakistang Grupo Pilipinas

(Komite ng mga Korespondente sa Ultramar)

spartacist@spartacist.org
SpartacistGroupPilipinas • SpartacistPH
Box 1377 GPO, New York, NY 10116, 美国

Talibang Anakpawis

₱100/4 issues (includes English *Spartacist*) • Overseas: ₱200

Ligue trotskyste au Québec et au Canada/ Trotskyist League in Quebec and Canada

republique.ouvriere@gmail.com
tl.workerstribune@gmail.com
(514) 728-7578
republiqueouvriere • Rep_Ouvriere
workerstribune • Workers_Tribune
Les Éditions collectives, C.P. 583 Succ. Place d'Armes
Montréal QC H2Y 3H8, 加拿大

RÉPUBLIQUE OUVRIÈRE

3 numéros : 7 $Cdn • Prix international : 10 $Cdn

WORKERS TRIBUNE

3 issues: Cdn$7 • International price: Cdn$10
Chèques à l'ordre de / Pay to: Les Éditions collectives

Spartacist/South Africa

spartacist_sa@yahoo.com • Voicemail: 088-130-1035
AmaBolsheviki Amnyama • AmaBolsheviki
079 171 5793 • amabolshevikiamnyama
Spartacist, P.O. Box 61574
Marshalltown, Johannesburg 2107, 南非

AMABOLSHEVIKI AMNYAMA

R10 / 4 issues • Rest of Africa: R20 • International rate: R100

Spartacist League/U.S.

vanguard@tiac.net • (212) 732-7860
WorkersVanguard
Box 1377 GPO, New York, NY 10116, 美国

WORKERS VANGUARD

US$10 / 6 issues • International: US$25 / 6 issues

既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国家

中国的阶级性质

中国日报

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中国”究竟是什么？从各国统治阶级到极左派，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引来众说纷纭。美国资本家雷蒙德 · 达里奥（Ray Dalio）认为，中国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政权—“资本主义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可能在几年之内在中国比在美国更受拥护”。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直接驳斥了这种观点：

> “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
> ——《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2013年1月5日）

这两种观点反映了不同群体的利益：达里奥代表了外国资本投资者的利益；而习近平代表了中共政权的利益。但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呢？从这个起点我们该如何理解中国的性质？

这是当今左派面临的最重要也是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有些人对中共的罪行视而不见并认为中国是值得效仿的社会主义典范。但在国际马克思主义运动中这种观点仍然是少数；大多数组织都声称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一个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强国。在自称为托派的党派中，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nternational Socialist Alternative/ISA）、革命共产国际（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RCI——前身为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Trotskyist Fraction）等许多组织都持这种观点。希腊共产党等老派斯大林主义者以及中国以外的大多数毛派（例如德国的MLPD【德国马列主义党】 和西松的菲律宾共产党）也都是如此看待。

本章正是针对这一趋势。我们将指出那些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并不能提出针对中共官僚的一条可行的政治替代方案，他们只是在讨好美帝国

（下续第40页）